

威爾基著

陳堯  
錢能欣  
合譯

四海一

家

時 代 生 活 叢 書  
第 三 種

# 四 海 一 家

威 錢 陳  
爾 能 堯  
基 欣 聖  
著 合 著  
譯

**ONE WORLD**

By

Wendell L. Willkie

時 代 生 活 出 版 社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3. 書 叢 活 生 代 時

家 一 海 四

基 爾 威 : 者 著

聖 堯 陳 : 者 譯  
欣 能 錢

新 周 : 者 編 主

社 版 出 活 生 代 時 : 者 行 發

號 二 路 白 滄 : 慶 重

號 四 廿 路 涇 泗 : 處 事 辦 海 上

一 四 〇 七 一 : 話 電

元

幣 國 冊 每 價 定

版 一 滬 月 二 十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 目錄

譯者序

導言

第一章 愛爾·阿拉敏

第二章 中東

第三章 土耳其——一個新的國家

第四章 我們的盟國——蘇聯

第五章 雅庫次克共和國

第六章 中國已打了五年

第七章 中國西部的開發

第八章 自由中國用什麼作戰

第九章 對於中國貨幣問題的幾點意見

第十章 我們的友誼蓄水池

第十一章 我們爲什麼而戰

第十二章 這是一個解放的戰爭

第十三章 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

第十四章 四海一家

## 譯者序

威爾基先生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乘了改爲運輸用的「解放」式轟炸機，即是大家所知道的「格利佛」號，離開密希爾機場經南美飛渡大西洋至北非，在愛爾·阿拉敏參觀前線，然後至中東及土耳其，在那里停留了幾天，即飛往蘇聯。在古比雪夫和莫斯科會見了許多蘇聯的要人，參觀了許多工廠和農場，巡視了塞夫前線，訪問了西伯利亞的雅庫次克共和國，然後沿着中亞細亞到中國運輸絲綢的古道，從伊犁河上流下飛，經過空曠的沙漠上空一直飛入中國的新疆。在中國境內第一次降落的地點是迪化，然後經蘭州，成都而到重慶。回程時會去潼關前線參觀，然後經華北逕飛西伯利亞，飛渡白令海，穿過加拿大國境折返美國，在明尼亞波里降落，歷時共四十九天，旅程三萬一千英里。訪問了十幾個國家，參觀了若干圖書館，工廠，農場以及作戰前線；和若干君主，總統，首相，將領，士兵，教員，學生，圖書館員，工人，農民等談過話。世界上從來沒有像他那樣一個著名的人物，代表像美國那樣一個重要的國家（祇因他不是一國的元首，尤能代表民意）在這樣生死存亡的決鬥之中，帶着熱烈的友情和冷清的頭腦，週遊世界，給各國很大的鼓勵和建議，同時也帶回給美國人民寶貴的見聞。

「四海一家」(One World)不僅是一個公正動人的報告，而且也是一部民主國家的政治哲學，不但要加強民主國家作戰的力量，更要保障戰後的和平。威爾基先生說：「我說和平必須建築於一個世界基礎上，我的意思是必須包括整個地球上的人，海洋和大陸，如我從空中所見，祇不過是地球的一部分。英國和美國都是地球的一部分，蘇聯，中國，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也都是地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除非和平的基礎在全世界各處都已確定存在，世界上任何一處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這種普遍性的和平的成功，決不祇是靠我們領袖們的宣言，如同大西洋憲章所包括的一樣。它的成功，主要是依賴全世界人民的一致接受。上次大戰後尋求國際諒解的失敗，給我們一些教訓；即使作戰的領袖們在戰時都明顯地同意共同確定的原則和口號，但等他們坐到和平會議的席上，他們對於以前的宣言，就會有他們自己不同的解釋。所以除非現在戰爭正在進行中，美國，英國，蘇聯，中國和其他同盟國家的人民對於他們的作戰目的，須能基本的一致同意。那些娓娓動聽的詞句如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不過是像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一樣來欺騙我們而已。」（見第十四章）

因此，和平必須在戰爭中爭取，經濟問題，尤應預先籌劃，隨時解決，不能等待戰後，威爾基先生說：「要想等戰爭停止以後，再去創造一個防止經濟戰爭推進國際和平的機構，這全是理想；除

非這機構的若干部分能在尋求擊敗敵人的整齊協力與共同目標之下結合起來，如說一切事要依賴國際貿易和戰後的發展，全是夢想……：……一般的說任何重要的事情在戰爭中未曾解決的，在和平中，更不可能解決。」（見第十一章）

全書共十四章，其中有四章是關於中國的，可見威爾基先生對於中國的關心。雖然其中有若干地方不十分滿意我國的設施，可是完全出之善意和摯誠。我們抗戰已經六年，勝利雖已在望，建國前途困難尚多，我們固然需要人家在物質上的幫助，尤其寶貴善意的建議，我們對於威爾基先生的意見是十分虛心地接受的。

威爾基先生對於蘇聯問題也感到很大興趣。他完全以客觀的態度去研究蘇維埃制度的是否應該存在，或有無存在的價值。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認為蘇聯是一個有效能的社會，俄國人受希特勒的蹂躪最大，所以他們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制度的仇恨也最大；民主國家戰後必須和蘇聯合作，否則不會有久長的和平。

雖然威爾基先生自己承認他是最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可是他這一種見解並不引用以反對蘇聯，國家的主義和制度盡可以各異，彼此還是很好的朋友，爲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和平。

威爾基先生對於 蔣委員長，斯大林，蒙哥梅利，陳納德等的描述，非常頌揚，對於戰爭的前



途非常樂觀。其他對於中東各國及土耳其也有着獨到的見地。第十三章威爾基先生對美國人民的提示，第十一，十三和十四章是威爾基先生對戰爭與和平的哲學上的理論，為未來的新世界指示了一條光明之路。

本書由陳堯聖先生與錢能欣合譯。一至三及九至十四各章由陳堯聖譯成，四至八各章及導言由能欣譯成。

譯者誌

三二·七，七、

今天，由於軍事和其他的檢查，美國像是一個圍城，四周圍着高高的城牆，祇准偶爾的信差通過告訴我們外面發生了什麼。我到過了牆外。我發現了外面的事情沒有一件和牆內所知道的完全一樣。

我在戰爭期間有機會飛行全球，訪問一打多國家中的成百人物，和他們談話，並且親密地和許多世界的領袖會晤。這一種經驗很少有私人經歷過，在那些領袖中，一個也沒有。它給了我一些新穎而急迫的信願，並加強了我原有的信願。這些信願不祇是人道主義的希望；也不是過於理想和含糊不清，而是根據我親自所見所聞以及多少重要的與無名的男子與婦女的意見，他們的英勇和犧牲的精神使他們的信願賦有意義和生氣。

本書中所記述的觀察，我盡力避免感情用事，而所得的結論，也許還不夠心平氣和。

和我同行的有著名出版家加特納（密克）考來斯，以及經驗豐富的外國通訊員兼編輯約瑟·拜納斯，兩人都是我全程的旅伴，也是我的朋友。他們對於本書材料的搜集有着很大的幫助。雖然他們同意我大部分的結論，但他們並不負任何文責。

美國海軍保爾·壁爾上尉和美國陸軍格爾特·曼遜各以海軍和陸軍代表的名義和我同行，在旅程中給我很有價值的關於海陸軍方面的報告和意見。每一團員，駕駛員在內，覺得相互有助，不感寂寞。但是我特別要歸功於我們的駕駛員理查·（狄克）開脫的驚人的飛行技術。我知道我這樣說一定會滿足大家的心願的。

威爾基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於紐約

## 第一章 愛爾·阿拉敏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我搭上一架由美國陸軍軍官駕駛，以四引擎統一式轟炸機改做運輸用的飛機，從紐約密希爾機場出發，去訪問我所能看到的世界和戰爭，以及戰爭的前線，領袖和人民。正好四十九天之後，十月十六日，復在寇尼梭打的明尼波里降落。我已環遊了世界一週，不但到了北緯度一帶狹窄的地面，而且還兩次經過了赤道一帶。

總共我旅行了三萬一千哩，這數目給我以深刻的印象，甚至使我有些迷惘。因為我從這次旅行所得的實際印象和感覺，並不是和別國人民遠離，而是與他們接近。如果我對世界是很渺小而且完全相互依賴的事實，有所懷疑，那麼，這次的旅行完全使我消滅了這種觀念。

這確是一個驚人的事實，我們雖飛航了如此遼遠的路程，但實際上我們在空中祇有化了一百六十小時。我們在這四十九天旅程中，每天祇飛八小時至十小時。約有三十天功夫，我都在地面上進行當時我所要做的工作。從一個國家飛到另一個國家，或是從這一洲飛到那一洲的往來移動，決不比美國商人在他日常生活中，經營商務，更為繁重和辛苦。事實上，在世界上來往，似乎很容易。因此，我會和一個西伯利亞中部共和國的主席約定，在一九四五年，我將再飛到那裏度幾個週末，

每次去狩獵一整天。我希望我能實踐這個預約。

世界上已沒有相隔遙遠的地點了。在此次旅程中，我明白了遠東的許多萬人和我們處得很近，如同最快的火車貫通着洛杉磯和紐約一樣。我不能不如此深信，將來有關於他們的事情，與我們都息息相關，恰如奧加里佛尼亞人有關的問題，亦與紐約人有關一樣。

我們將來的想法，必須是普遍於全世界的。

八月將終時，在赴開羅的航程中，我們聽見不少壞消息。在尼日里亞的卡諾，那邊正在公開地計算着，隆美爾將軍在多少天內便可佔領他的先鋒部隊與亞歷山大之間的數哩地帶。當我們到達喀土穆時，這消息似乎已見千真萬確，於是在埃及所稱的挫折，竟變成了一種情勢較輕的驚惶。在開羅，許多歐洲人都在收拾汽車，準備向東方或南方逃難。於是使我想起，在我離開華盛頓時，總統所曾對我說的一句話，即在我未到開羅之前，也許開羅已經陷入了德軍之手。我們聽到不少關於納粹降降傘部隊在尼羅河流域降落破壞最後防線的傳說。一般人普遍相信，英國第八軍業已準備自埃及完全撤退到巴勒斯丁，向南退入蘇丹和坎尼亞了。

自然我要檢討這些報告，不過開羅本身是世界上察訪任何消息的最壞地方。那裏有不少善良人物。如英國駐埃及公使亞歷山大·卡克，他對於未來局面並不絕望。我從他談話之中，知道他在用

他的灰色的，諷諭的悲觀主義作爲煙幕，來掩藏他所知道關於實際情形的充分情報，並以此爲極大的技巧，來設法保持當時的維妙局面。此外開羅尙有不少消息靈通的人士，其中如那位身胖臉圓，常露笑容且充滿着幽默趣味的首相納夏斯。我告訴他如果他去美國參加競選，無疑的，他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候選者。

然而這城市充滿了謠言和驚恐。街上充滿了熙攘往來的軍官和士兵。新聞檢查的嚴密，使在開羅的美國訪員，對於一切自前線拍來的英國消息，全部感到懷疑。如果你在牧人旅館逗留半小時，關於在百餘哩外沙漠中所發生的事件，你便可以得到十幾種不同的報告。

因此，我渴望地接受了伯納德·蒙哥梅利將軍的邀請，親赴愛爾·阿拉敏前線視察。我同密克·考爾斯和當時美國駐埃及軍隊的指揮官羅斯爾，麥克斯威少將，便從開羅乘車出發，直向沙漠前線的路上駛去。在開羅一家法國百貨公司裏，我買了一套卡瓊襖衫和短褲，尺寸都比我小，但這已是那家公司所有最好的東西了。我們每一個人又各借到一張在沙漠中作戰用的簡單的行軍床。

蒙哥梅利將軍在地中海畔，掩蔽在風沙吹積的沙崗後面的司令部裏接見我們。事實上，司令部離海灘很近，第二天清早，我和蒙哥梅利將軍便在那美麗的碧海之中沐浴。司令部備有四輛美國汽車拖車，每輛相隔沙崗數十碼，藉資掩藏。其中一輛備有蒙哥梅利將軍的地圖和作戰計劃，他給我

一輛作爲臥室。另一輛是他的侍從用的，第四輛是在他不去前線時留給他自己用的。

出乎意外的，當我在埃及時，這位博羅廣思，富有宗教信仰，強壯精悍而有學者風度的蒙哥梅利將軍的個性，便已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但他一切特殊的性格，却並不如他積極愛好工作的熱忱來得顯著。他幾乎從不住在開羅，平常總和他的士兵們在前線。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他竟不認識這位幾星期來，統率着所有駐在中東的美國軍隊的麥克斯威爾將軍。當我們的汽車開到他的司令部時，他將我拉在一邊，問我：「這位軍官是誰？」我回答說：「他是麥克斯威爾將軍。」他接着再問：「誰是麥克斯威爾將軍？」正在我解釋完畢時，麥克斯威爾將軍自己走了過來，我便爲他們正式介紹。

在我們外出乘車之前，蒙哥梅利將軍詳細說明，數月以來，第一次阻止隆美爾軍隊前進的最後階段的作戰情形。這次戰爭的實際情形，並沒有傳到開羅，也沒有發送到新聞界。蒙哥梅利將軍一步步反復敘述着過去的經過情形，以及雖然他的軍隊，並沒有長距離的推進，而他爲什麼以爲這是勝利的主要原因，過去的戰爭祇是一種大規模的實力測驗，要是英國失敗，隆美爾或許就在幾天內到達開羅。

這是我對沙漠要塞作戰技術所得到的第一課教訓。在沙漠戰爭中，距離決不算一回事，而運動

戰和火力却最重要。最初，我對於這位將軍鎮靜地反覆重述「埃及已經得救」，覺得難於明瞭。因為敵人在埃及為數甚多，並未退却。我記起我在開羅所發現的懷疑主義，是由於英國早些時的報導所引起。但當我離開那掛有蒙哥梅利將軍的地圖的拖車時，我更學到了不少沙漠作戰的技術，他並且使我相信，許多比英國軍官和紳士們普遍的自信心更加重要的東西，都已有了保證。所以埃及的危機確是早已消失了。

蒙哥梅利將軍講到美國製造的希門將軍式坦克車，特別有興趣，許多這樣的坦克車正陸續運到亞歷山大和塞特港各碼頭。他並且非常讚許美國出品的一〇五耗口徑的自動平射鋼砲，那時已開始證明牠是的確能夠抵住坦克車的。

蒙哥梅利將軍的中心理論認為，早些時日，英軍在沙漠前線的困難，乃是因為坦克大砲和空軍力量沒有適當聯繫的結果。蒙哥梅利將軍告訴我，在他司令部裏住着的空軍軍官，這幾天來所以能對隆美爾施以決定性的牽制，主要原因，就因飛機，坦克和大砲已能取得充分的配合。他估計在最近結束的一次戰役中，德軍的損失已達一百四十輛坦克車，約計德軍所有精良的坦克車的半數，而英軍的損失不過三十七輛，他又預言英軍可在空中佔優勢，如同在地面上一樣。

那天晚上，我們在蒙哥梅利將軍的營帳裏和他的高級將領一同閒談：英國駐中東陸軍司令亞歷



山大將軍，美國駐中東空軍司令貝爾登少將，和他的英國同僚空軍上將台得兒爵士。我曾在開羅見過台得兒上將，並且和他講過話。他是一個有趣的令人感動的軍人，有着寧靜而溫柔的容貌和聲音。他每一次給派到前線服務時，總是帶着一付水彩畫具。他是一個飛行英雄，而且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那天晚上，貝爾登和台得兒講到作戰的前途。他們的談話，看來有些大胆和誇張，而事後也無任何行動來表現。他們都深信地中海將有爲同盟國船隻重行開放的可能，當時他們都同意，這必須在隆美爾被擊退到班加齊尖角以西，方可實現。那時候，他們說，我們在埃及可以駐屯并培養我們的軍力，依着通航的小道，或憑藉斷續的馬爾他，直布羅陀，班加齊，以及巴勒斯坦的美國空軍根據地，圍繞着非洲海岸。他們并且談到如果他們可以據守着班加齊這一區域，大規模的轟炸意大利，必有現實可能。

他們的談話包括各種題目，有一個軍官甚至向我解釋說英國陸軍廁所，是不恭敬地被稱爲「上議院」的。但是蒙哥梅利將軍除了縱談前線外，并不涉及其他。他或許會靜聽別人的談話，然後在一二分鐘後，將談鋒轉到沙漠作戰上去。後來，他和我從他的休息帳幕走到我的住處。他察看了一下我的床架是否整備齊全，然後我們便在拖車的踏板上坐下。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月光下的白浪在

海面起伏，聽到我們背後遠處，他的砲隊正在轟擊隆美爾的敗軍。他在一種懷舊的沉思和凝想中，聽到他在唐南格爾鄉間的童年時代，和加入英國軍隊後，在世界各地所會度過的悠長歲月，以及戰爭發生時，他勸告在朝的宦臣和陸軍軍官們，必須以肯定來代替防禦觀念的不斷的奮鬥等。

「告訴你，威爾基，這是我們擊敗「布忽斯」的唯一辦法」——他老稱德國人爲「布忽斯」。「不要給我任何休息的時間，亦不要讓他們有一點休息。他們是優秀的軍人。他們是專門的士兵。」當我問到隆美爾時，他說：「他是一個受過訓練的，有技巧的將軍。但他有一個弱點，就是他老愛重演他同一的技巧，而這便是我要擊敗他的點處。」

他站起來要走，祝我晚安後說：「我常在我入睡之前看一些書。」此後，他帶着些悲哀地告訴我，他身邊祇剩了幾本書，事實上，那晚上他有整個世界和他在一起。當他離開英國前不久，他把他一生成集的傢具和書籍存放在多佛爾棧房中，他說：「德軍來轟炸時，把那座庫棧完全炸燬了。」

第二天我們巡視前線，我親眼看到密集的坦克車，大砲，和士兵。臨時應用的戰鬥機場，以及不可輕視的供應站，流動的，棋盤式的在沙漠中遊行的前線。蒙哥梅利將軍對於他所担任的工作有着豐富而澈底的智識。使我十分爲奇，無論是在一師一團，一連或一營的司令部裏，對於軍隊進展

的詳情，他比值職軍官知道得更清楚。聽來似乎說得太過份。但這是真事。這個人注意細節的性癖確是令人驚異的。

我們看到數十輛損毀的德國坦克車，散放在沙漠裏，他們爲英軍奪獲後，奉蒙哥梅利將軍之命加以摧毀。當我們正要爬上這些殘毀的坦克車時，他打開食物盒，拿給了我一些乾燥的剩餘的英國食糧和供應品。這大概是德軍佔領多布洛克時劫掠來的。「你看：威爾基，這些魔鬼依靠我們生活，但是他們已無法再這樣做了。至少他們決不會再用這些坦克車來攻擊我們了。」

我們在巡視前線的時候，英軍砲隊不漸地轟擊敗退的隆美爾軍隊，英美空軍也作同樣的攻擊。德軍爲報復計，派了不少史多加脫飛機式來轟炸英軍的大砲陣地。在我們頭上，我們到處可以看到被擊命中的飛機，冒着烟火向地面上直衝，有時也許還能看到倖倖逃出飛機的駕駛員，背着降落傘在空中飄蕩，看去好像都受着南風的飄動一直向地中海去了。

我們在前線所看到的士兵中，有英格蘭人，澳洲人，新西蘭人，加拿大人，南非人，和一隊美國人，大約有三十個。這些美國人都屬於坦克車隊，由美國乘飛機來此觀察真實作戰情況的。我每一個美國人講話，知道他們來自美國的十八州。他們看來很康健，並且很坦白地希望回到美國去。他們問了我許多關於道奇兒和卡定奈兒競賽的問題，那時候他們正在爭奪錦標。這些人剛上前線

，都希望一小時內即可回去。他們中間並沒有英雄，也沒有誇大的人，他們祇是一羣身體健康，輕鬆活潑的美國孩子，他們都在思念着誰能先回去看塔克斯州，百老匯以及衣阿華州的農場。

中午，們在一位團長的司令部用午餐，司令部也就是一隊帶有拖車的汽車。午餐是三明治和蒼蠅。在前線，蒼蠅和德軍一樣的引起士兵的憤慨，它們會叮到你的嘴裏，耳朵裏和鼻孔裏。我的批評是它們正像法國壕溝裏的爛泥一樣，在沙漠作戰中令人討厭激怒。許多軍官更怨訴說，細小的沙土，時常吹到他們的眼睛裏，這些細沙更大量地損壞機械的機件。一位航空員告訴我，一架普通式的飛機引擎，在沙漠地帶祇能得到通常的效率的四分之一。我在埃及，到處發現英美工程師在談論濾水器的淤塞。

在回到蒙哥梅利將軍司令部的途中，他把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作一結論。他描寫他的有利的處境和一次有關決定性戰爭的勝利，但他並沒有矜持過一字。

「具有優勢的坦克車或飛機，使我造就了這次戰爭的結果。隆美爾不能自東地中海獲得後援和軍火，因為他們的運輸艦有五分之四遭了我方空軍的破壞。現在在數學的計算上已確定我們必能擊退隆美爾，這次的作戰乃是一個緊要的試驗。」

我會看到他的士兵，和敵人坦克車的損失。許多敵人的失敗是我親眼看見的。他證實了我所獲

得的關於給養的情報，即是美國船隻運來的給養已在亞歷山大東面卸下了。

他說在埃及、北非和中東，有一種普遍的失敗主義的意識，英軍迭次的失敗，使許多人以為德軍會征服埃及，因此，英國便會失去它的威望。這種失敗主義妨害了他的祕密工作人員，幫助了敵軍的祕密工作者。他雖已攔阻了隆美爾，但仙渴望着在塞特港卸下的三百輛美國希門將軍式坦克車參加作戰之前，隆美爾不會即刻退到沙漠地帶去。他計算還需等待大約三個星期的時間，他如果果把作戰的結果公開報告出來，結果會使隆美爾加緊撤退他的軍隊。因此他和我商量，若能由我發出一個非正式的消息，使隆美爾不致想到這是他開始採取積極進攻的預兆，同時，由我發佈的消息，對於堅定埃及、北非和中東的作戰信念，會比英軍的公告有着更大的效果。

從我所看到和聽到的，我相信他並沒有過份估計了他所已完成的重要成就，因此我很願意照他所希望的去。

於是，他便召集各報記者到他的司令部裏，我按照我事先和他商量好的話，告訴他們這次作戰的結果，說：「埃及是得救了，隆美爾已被阻止，肅清和驅逐北非德軍的工作，正在開始了。」

這是許久以來，記者們第一次所獲得英方發佈的好消息。他們曾經多少次被欺騙而變成冷漠。在他們眼中，前線是在逐漸動搖，隆美爾離尼羅河僅有數哩。自我們所在的地方看來，去的黎波里

之路，是遼遠而且渺茫，可是到開羅之路卻是不幸很近。

那天下午，許多記者的臉上，全部流露着有禮貌的懷疑的神色，他們已經習慣於軍官們的預測，但關於他們的實際的成就却從未聽過。

從蒙哥梅利將軍的司令部，我乘坐一架德國巡邏機飛越前線，到英美空軍根據地去。機身幾乎完全是玻璃造成，可以看到週圍四方，這飛機是由空軍上將台得兒駕駛的。

在某一根據地，我看到幾百個英美飛行員，有的剛從作戰歸來，有的正要出發。其餘的安靜地坐着，彼此交換飛行的經驗，討論天氣和風向。我問他們，我在早上所看到的那些背着降落傘向地中海飄去的航空員，結果究竟會遇到什麼可能的遭遇？他們無法置答，但值日軍官說：「令人驚奇的是許多人都飄了回來，有的落在敵人後方，有的落在海中，有的落在遼遠的沙漠裏，但是憑藉他們的聰明和自持力，跑回司令部來的卻很不少。」

和美國航空員談話以後，我發現他們有着和我在沙漠中所看見的美國士兵一樣的氣質。以後我和那位空軍上將便一同飛往亞歷山大，這是臨時決定的，爲了要知道這個戰爭，並不像我們所看見的風，沙，坦克車或長而清潔的大砲的那樣的直接和簡單。

今天，亞歷山大留給我兩個回憶。第一是我和留駐在該港的一部份法蘭西艦隊的司令海軍少將高得勿雷的談話。在城中可以望見他的船隻。船上的砲座已被卸移到岸上，船身長滿了青苔之類的東

西。船上僅有的油量，祇夠航行很短的路程。然而那些船隻仍代表着一種重要的潛勢力。這些巨大的殺人機器，法國的農民傾獻他們的積蓄，法國的工程師和水手供獻了他們熟練的技術，可是當法國尚在納粹的奴役之下，這些軍艦永遠是殘廢無用，停泊在亞歷山大祇留下一個悲慘的紀念，使人們知道這次戰爭仍然是一個混亂污穢的勾當，還有那末多的人民和羣衆未曾選擇應走的路線。

高得勿雷少將說得很好的英語，他給我的印像是一個優美能幹的法國軍官。介紹我認識他的那位美國軍官證實了我的意見。他因法國情勢轉變而感到憂慮，他除了軍官應有的紀律外，對於戰爭和其他方面的智識幾乎全不甚瞭解。他對於英國海軍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攻擊法國海軍的行動，表示忿慨不滿。他對於美國却有很深的友誼，希望美國得到勝利，雖然他仍然聽從貝當上將的命令。從他告訴我的說話中，顯著地流露出了他自己的，以及他士兵的感覺，希望美國軍隊開到，他並且給我許多暗示，如果一旦美國軍隊真的開到，他的艦隊的抵抗，將祇是一個形式而已。

自從我在北菲和他以及其他法國軍官士兵談話以後，我對於許多人所說的，假使美國不和達爾朗來往，而直接和法國軍隊衝突，必將遭受相當損失的說法，不再輕信。我一直懷疑着那些不能證實或否認，或太偏向于某一種政策的傳聞。

我對於亞歷山大的第二個回憶是：一個晚上，在海爾烏特將軍家中的晚宴。海爾烏特將軍是英

艦愛克斯德號與德艦斯比上將號，在南美海面作有歷史意義海戰中的英雄，他現在是東地中海英國海軍的司令，我們討論戰爭是用一種超然獨立的方式，而不像世界各處參加作戰的軍官們那樣討論的態度。之後我們又談到政治，我試探這些經驗豐富，能力強大的英帝國行政的官員，對於大英帝國的將來，尤其是未來的殖民制度，以及英美對於東方民族的共同關係，究作如何看法。

我對於這些人所獲得的印象是全像吉卜林那樣的富於帝國主義的色彩，連魯特斯那樣的自由思想都沒有。我早知道，在倫敦及英帝國各處的英國有識人士，有不少人對於這些問題，正在熱心努力工作。舉例來說，在他們中有不少在設法尋求一個公式來將舊的委任統治制度，改變趨向自治政府的形式，而這些執行倫敦決定政策的人們，卻不知道世界已在變遷之中。照我看來，在他們心目中，英國殖民制度並不是完全的，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會想到這制度或可加以修正，或改變成別一個方式。他們大多數人都讀着大西洋憲章，卻從未想到這或許會影響到他們的思想 and 前途。從那一晚起，我腦中便開始發生一種信願。此後，經過中東一帶後，便更日益堅定，即是現在世界各處進行着的戰爭，決非為我們而得勝，唯有在我們與東方人民關係的機構中產生新的人物和新的理想，我們才能獲得光榮的勝利。缺乏這個條件，任何和平將不過是另一個休戰協定而已。

第二天，我們乘車回到開羅，準備與埃及國王法勞及首相長談，然後再與實際上統治埃及的英



國駐埃及大使藍浦森爵士會晤。一路上我們看見古代的和現代的強烈對照。土人騎着一羣駱駝，載着尼羅河流域的物產，像流水般的經過。同時成行的現代卡車，運着最有力的戰鬥機，駛向開羅現代的修理廠去修理——遠遠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埃及的光榮的遺跡，人頭獅身像和金字塔。

## 第二章 中東

我們沿着通商的路線從開羅飛往德黑蘭，經過許多和我們文化一樣古老的城市。這些城市保存了數千年歷史的對照和變化，在尼羅河畔灑灑農田的水車旁，蔽着眼睛的水牛，繞着無窮盡的圈子，似乎和我在埃及看到的美國機器修理庫，沒有什麼關係。面色憔悴的饑饉的孩子們，在耶路撒冷古城的骯髒的街上遊玩；年青的法國空軍在貝魯特的機場待命出發，在巴格達毛氈工廠裏做工的十歲左右的阿拉伯男女孩子；德黑蘭城外大兵營裏住着的波爾羅民——我從這個稱為中東的區域中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即是混亂。

飛機在飛行之時，給與一個現代旅行者在圖中描畫出一個他所經過地方印象的機會。從貝魯脫立亞達，到巴格達，到德黑蘭，其間的航程較長，我們趁此來校閱筆記和整理我們所得的印象。在我離開伊朗到蘇聯之前，自己已經解答了若干關於中東最迫急的問題。

第一，我深信知道在中東的人民都傾向我們，並不反對我們，一部份祇是因為美國和他們離得很遠，並沒有對他們實施任何統治，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因為德國在那裏仍頗得人望，伊朗即是一例。此外美國的參加戰爭，使大多數人相信同盟國家目前也許有着很多危機，但是必會得到最後的勝利。換一句話說，這些在亞歷山大帝國時代以前屢被征服的中東人民，其中大部份的思想和生

存的本能，是非常實際的，因此，使他們在結局尚未明顯以前，挑選可以獲得勝利的一邊。

第二，我相信在我所遊歷過的地方有着一種發酵作用，即使最嚴格的中立，也不能使在這區域裏居住的人民，並不受到戰爭的影響而發生強烈的變動。在未來的十年內，他們將會有比過去世紀更大的變化。

第三，我發現沒有自動的保證，可以證明這些變化是有助於我們的。我們西方政治理論的玄妙，在許多回教徒，阿拉伯人，猶太人和伊朗人的頭腦中有着強烈的衝突。他們現在觀察我們非常地近，差不多已有一代了，我們却爲着我們信仰的中心組織而彼此攻擊着。我到處都遇到態度很有禮貌而內心却在感到懷疑的人。他們都很誠懇地的接受我們關於他們的困難的問題，但是他們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卻帶着許多諷刺我們的問題，並且時常提到美國對於種族的歧視。我相信和他們談過話的每一個政府官吏，對於我們和雜琪間的關係非常詫異。很多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好奇地要知道我們所講的自由，是否是指一種委任統治制度的擴大與方式的變更。在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無論正確與否，委任統治制度已逐漸被認爲一種外國暴虐政治的形式了。

最後，我所經過的中東，到處發現一種與貧窮污穢共同存在的落後的工業。我感覺到任何一個作這樣的批評美國人，他也會受一般人的批評，在耶路撒冷時，我第一次明白，爲什麼許多美國人

到那裏去過之後，都會帶有一種似乎是回到聖經時代的感覺。這原因是他們的確回返到聖經時代去了。因爲三千年來，一切很少有變動。現代飛機。輸油管，碎石路，甚至平均的鉛管，都已構成一種生活表面的細微裝飾，在本質上，和任何西方從前一樣的簡單與堅實。祇有在世界猶太民族主義運動所指導和管理之下，以及阿拉伯人在巴格達所主持的自治政府區域，才有些特殊例外，那些地方，工業，農業和文化有些發展。

照我看來，這些人民在不同的程度與不同方式中需要四種東西，他們需要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公共衛生設備，大量的現代工業，以及更多的在自由和自治中所應有的自尊與自信。

我相信在尼羅河旅行的人，沒有一人，會不認清教育可以幫助埃及人民，恢復他們歷史所昭示于他們的民族的元氣。在埃及已經有英美人士幫助設立的學校。我所遇到的埃及人，從洪勞國王，和納夏斯首相到醫生和工程師，這些人到處都被人稱頌爲受過教育的人。然而走遍埃及或中東各地，除了土耳其外，沒有人曾向我表示過一所他們自己辦的學校，乃是他們國家的光榮。每一個人希望我去參觀美國人所創辦的女校，這位美國人在艱難波折之中教育埃及的孤兒已經三十餘年。

在我所參加的許多招待會中，每次總遇到許多「帕夏」，他們有許多娶外國人爲妻，她們善于交際，令人注意而且彬彬有禮，在公衆場所，列滿了他們的人像。「帕夏」這名號在阿托門時代就會

存在於埃及。當初原是一種授予有勳功于帝國的軍事領袖或各省長官的階級。現在這不過是國王恩賜的禮儀的稱號而已，埃及人自動的在帕夏所到之處鋪上紅地毯，因為帕夏們有錢來僱他們去侍奉。

我問一個年青的埃及記者：「一個人寫一本偉大的著作能否成爲帕夏？」他回答說，「我相信也可以的，不過在埃及幾乎沒有一個人能著述寫書。」

「他能否以繪畫成爲一個帕夏呢？」我再問他。

「沒有理由說不可以，祇是在此地沒有一個人會繪畫。」

「過去有沒有一個偉大的發明家封爲帕夏？」

他又回答說，「我知道自法勞王時代起，直到如今，我們從未有過偉大的發明家。」

我在埃及時間不長，因此無暇去研究許多文化不發達的原因。不過外國人在埃及的最大的國際都市——開羅，操縱着文化和教育的事實，或許與此有關。正如同少數帕夏之握有大多數埃及肥他的土地的主權與此有關一樣。這許多帕夏之能取得爵位，並不是由于他們的政治活動，而是由于沃們運用他們的財富力量。

但是在我看來，主要的原因，是在中產階級的缺乏。在中東各處，一部份是有錢的地主。他們的財產大半是世襲的。我發現他們對於政治動態大半毫無興趣，除非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地位時，才

來顧問。一般民衆，除了漂泊的民族外都是赤貧如洗，一無恆產，受着古代教士愚民惡俗的可怕的統治，生活在困苦之中。一個能策動創造精神的力量，向來不是從極富和極窮的人中發生。不幸中東很少有這兩種人的中間階層。

然而奇怪的是誰都感覺到，在這些國家內，有一種發酵的作用。一羣久無生氣的民衆，逐漸地不甘心受宗教儀式和舊俗的拘束和限制。在每一個城市裏，我發現一羣——時常是很小的一羣——活潑，有力量，有智識年青人。他們知道，並且討論着，造成蘇俄革命成功的民衆運動的技術與作用，同時他們對於我們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頗清楚。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看出在他們的頭腦中正思考着應該採取那種方式方能實現他們熱烈的願望。同樣，我在世界的這一部份，如同我在蘇聯和中國所發現的一樣，到處都生長着一種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在那些相信世界前途的希望必須依靠反動方式的人看來，這是一種搗亂的東西。

我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伊朗發現相同的饑饉，不滿和不可容忍。雖然這許多國家的首相和外交部長都是詭辯知名之士，但官方對此問題忽略不顧，都大致相同。

在貝魯特，德黑蘭和開羅，美國人已經創設並維持若干所學校，爲大衆服務。在貝魯特時，我曾在一美國大學校長道奇博士的花園裏用茶。那天我曾見戰鬥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將軍，戰鬥法國總

代表賈德魯將軍和英國公使斯比而斯少將，并且逐一和他們討論關於敘利亞與黎巴嫩的前途。我並不過於誇張，道奇博士給我講述關於這許多地方的將來的希望和信心，比他們三位所講的爲多。

不過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和戴高樂將軍會晤的經過，在貝魯特飛機場下機時，一羣穿着整潔制服的土著衛兵和軍樂隊歡迎我。隨後便乘車疾馳到戴高樂將軍的住所。白色的房屋很寬大，四周繞着整齊的花園。在每一個轉灣處衛兵均舉手致敬。我們在將軍的私室中談話數小時。私室的每一角落里，每一牆壁上，都掛着或擺着拿破侖的照片，半身銅像或人像。我和戴高樂將軍的談話在很精緻的晚飯中又繼續舉行，我們並在星光照耀着的花園中，坐着長談到深夜。

當戴高樂將軍描寫他和英國間的爭執，提到究應該由他或由英國來統治黎巴嫩和敘利亞時，他常常作動人的聲明說：「我不能犧牲或妥協我的主義。」他的隨從在旁補充說：「正像法國的女英雄貞德一樣。」當我提到我對於戰鬥法國運動有極大興趣時，他嚴正地糾正我說：「戰鬥法國不是一種運動，戰鬥法國乃是法國的本身。我們是整個法國和其屬地約合法繼承人。」當我提醒他敘利亞不過是是國聯委任代管的統治地時，他說：「是的，我知道，但我憑着法定代理人的資格掌有敘利亞，我不能取消這委任統治的權力或者允許別人來這樣做。這必須要等到法國另一個新的政府在法國成立時，方可實行，我不能在世界任何一部份放棄一點法國的利益。雖然我十分願意和邱吉爾

，羅斯福坐下來晤談，共同研究用什麼方法可短期利用法國的權利和領土，驅逐德國和其合作者，使法國獲得自由。」威爾基先生，「他繼續說：「有些人忘記了我和我的同僚是代表着法國，顯然在他們腦中沒有法國光榮的歷史。他們祇想到法國祇是在短時期內消沉了去的名詞而已。」

後來我又和一位黎巴嫩高級長官談起法國和美國正在爭取敘利亞和中東統治權的鬥爭。我問他同情於那一方面，他回答說：「結果定是兩敗俱傷，」事實上在中東潛伏着的知識份子，對於殖民地 and 委任統治制度，不問那一國來統治，都不贊同。

從貝魯特飛到耶路撒冷，我從來沒有看到新舊的對照是那樣的富於戲劇性，從我們的現代式的平穩而迅速的飛機窗口望去，從碧空中俯視黎巴嫩生着松樹的叢山，黑海，加利亞海，約坦河，橄欖山和格德生末花園。

在耶路撒冷，那位愛好運動，抽煙斗，精幹而十分英國人氣派的英國駐巴勒斯坦和約旦的高級長官哈羅特克密爾爵士招待我。他帶我參觀了耶路撒冷的舊城，並且十分耐心地解釋給我聽，關於一個美國人無從區別何者為殖民地，何者為委任統治地的幽默故事。

但是這還是耶路撒冷美國總領事畢克敦替我安排好一次機會，使我可以直接看到巴勒斯坦的真正複雜的問題。在他招待我的屋子裏，他有次序地招待了正在鬧黨派衝突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代



表，我和拜納斯及考爾斯三個人一同接見他們，和他們談話。這一天我非常忙，另外來會晤的還有當地美國軍司令麥克康納爾少將；哈羅特克爵士公署的代理秘書長勞勃脫。斯各脫；能幹而精緻的頭腦清醒的猶太事務所的警察司長摩雪，薛而脫克；哈羅特爵士的阿拉伯秘書羅希，貝，阿伯特，哈地；聲稱巴勒斯坦土地完全屬於猶太人民族主義革新派的領袖阿雷，阿爾泰門博士，和聲稱巴力斯坦土地全屬於阿拉伯人的阿拉伯律師，民族主義派領袖奧尼，貝，阿伯特，哈地，他們都把他們自己的意見告訴了我們。

那天時光已晚，我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引誘力使我下一結論，認為這種錯綜複雜的問題的解決，必須要像所羅門王那樣激烈。但是後來我到「哈特沙」的創辦人海琳黛，施瑞德小姐的小巧簡單的公寓中看她，我告訴她那一天和哈羅特爵士見面談話的事，我所有的混亂的心情，和我想獲得一個答案的渴念。我問她是否也想到真有若干外國政府會故意的鼓動阿拉伯和猶太人間的衝突，來操縱他們自己的統治權。

她說：「我帶着悲哀的心境告訴你說，這是真的。」她後來又對我說：「威爾基先生，我注意這問題已有好幾年了，這問題至今尚未解決，因此我不能舒服地住在美國。世界上沒有其他適當的處所能容納在歐洲被虐待的猶太人，但無論我們怎麼想，這種虐待在你我活着的時候一定能夠停止的。」

，猶太人必須有一個祖國。我是十二分的猶太民族主義者，但是我並不以為猶太人的希望與阿拉伯人的權利之間有一種不可避免的，敵對的衝突存在着。我正在使在此地的猶太同胞們，做些簡單的事情，來消除成見和兩種民族的不和之處。我要他們每一個人與阿拉伯人做朋友，用他們生活方式來表現出他們到此地來，並不是一個征服者，也不是一個破壞者，而是這個國家傳統生活的一部份，因為巴勒斯坦是我們宗教和情感的故土。」

她告訴我，她相信教育方式來改造這局勢是可能的，雖然她是一個年老的小姐，差不多八十歲了，但是當她講述對於猶太民族主義者曾經指導農工業殖民者如何工作的故事時，却仍充滿了青年的生氣。我們如果相信，這個歷史和宗教區，並且包括着國際政策和政治鬥爭意義的複雜的阿拉伯與猶太人間的問題，可以用感情、友誼和簡單的誠意來獲得解決，也許這是不合實際的。但是那天下午，當我坐在那公寓裏，看着陽光從窗外透進來，照耀在她智慧而富有感覺的面容上，至少在那一刻我懷疑着在她的成熟不自私的聰明中，是否還有一些事情不及野心的政客們所知道的那末多。

在中東，到處與教育相連的問題是醫藥和公衆衛生的問題。在這些區域任何地方旅行時，隨時會想到時疫與微生物的不愉快的心境，同時也可以明白看出，這些人將來決不會沒有改善他們衛生和生機的決心。

正如同教育一樣，有少數當地的居民和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已經表現出什麼都能夠做。我在巴勒斯坦，埃及和伊朗看到美國陸軍分遣隊的瘧疾紀錄，在戰後可引為令人激動的文件之一。有簾子的窗子，雙重門戶，仔細檢驗過的僕人，死水溝渠的暢通，蚊蟲鞋，和蚊帳，我相信這些東西都可為中東一般人民值得回憶的一個紀念。總而言之，誰也不喜歡瘧疾。

這些國家內公共衛生的改進，可以使我們得到在任何醫藥書中所找不到的有趣味的結果。公共衛生的設施，必須普遍才能有效，病菌決不偏袒於那一個人的。一般人既然都有分享一個低的死亡率

的利益，和有生機的生活，除非我是猜錯了，否則他是願意與人共同分享的。

給外來的旅客，像我們這樣一羣人準備臥具，原是一件平常的事。可是在耶路撒冷，當我做着哈羅特爵士的貴賓時，我發現床上沒有蚊帳，祇有一盤綠色蚊香放在桌上。我沒有動它，但是我的一位同伴把他的一盤點着了，他告訴我，這蚊香整夜熏着烟，至少給他一種極安全的感覺。在巴格達，我們所住的一所特別招待所內，天花板上的大風扇終夜在轉動，這招待所是在幾年前專為招待瑞典皇太子貝爾的爾建造的。在貝魯特，幾個敘利亞小孩在我們未入睡前謹慎地在買德魯將軍的松樹別墅的房間中趕着蚊蟲。當你看到這些為特殊階級所準備的難得的預防，你尚不會覺得這問題的重要，但當你看到這些看來有像蜻蜓大的蚊蟲，逃出了一切謀害它的危機，在你正不快地

懷念着從紐約到巴格達中途停留時所作的演講和警告時，却猛不提防的盯住了你的臂膀的時候，你就會明白這問題的嚴重。

所謂真正的公衆衛生問題，當然是貧窮。在埃及，因在血虫病死的人數之多實令人驚奇。這種毒菌寄生在尼羅河的蝸牛身上，埃及人喝着尼羅河及其普通的支流的水，因此便會嚴重地傳染到在水裏面分佈着的微菌而發生致命的危險。這問題并非是怎麼消滅這些蝸牛，而是如何使埃及人有沙濾水可用，但這却是所費太大了。

在氣候炎熱的國家裏，許多小孩因患沙眼瞎了眼睛，我們在開羅，耶路撒冷和巴格達的街上都會看到害沙眼的小孩。雖然有醫藥的診治和預防，仍不能減少這種病症，除非當地居民自動的講究衛生，使蒼蠅無法生存，這需要適當的房屋，清涼方法和簾子等。

我們所看到各地的衛生設備中，最糟的恐怕要算在伊朗的京城德黑蘭。這城市所用的水，在街道兩旁的明溝中流過，居民在溝中浣衣洗澡。再用抽水機吸水到樓上，用來吃喝和煮飯。他們有一句諺語說，水轉七個灣，自然會清潔，他們似乎很信任這句話。可是這並不能使他們避免傳染到痢疾，霍亂，瘧疾和其他各種從水裏帶來的微生物的病症。在德黑蘭，每五個小孩中，祇有一個可以活到六歲。

說來也許很容易，正如在開羅和耶路撒冷有人和我講過的一樣，「這些土人並不要什麼比他們所有的一切更好的東西。」幾世紀來，那些滿足現狀的人到處都用這句話來反對改善被壓迫人民的生活的論斷。然而文化的歷史指示我們，要造成一種經濟環境，使那些沒有或者僅有一些資產的人改進他們的生活，不是分歧式的方法而必須是重複式，才能使整個社會的福利增進。在我看來，中東的教育與公衆衛生是依賴着良好生活程度的實現，如果這樣做，必需先要介紹現代技術和生產的工業方法。

從這種生活程度的改善，可以增加世界的市場是毫無問題的。因為中東是一片廣大未曾充分開闢的土地，準備吸收無限量或不同種類的貨物。因此鼓勵這些人民改善生活，是有着固定性的實際利益。此外，討論這個問題，另有一個更嚴重而迫切的理由，那就是目前這些人民和外界缺少一種平衡，這種不均衡是一個永久潛伏着的衝突，也即是可能發生另一次戰爭的因素。

如果我們不理會這一區域內的棉，油，橄欖樹林，和油井，事實便很簡單，我們無須擔心這平衡勢力——至少不在目前，可是我們並沒有忽略他們。我們派送了我們的理想，電影片，和我們的無線電節目，我們的工程師，商人，我們的飛行員，我們的士兵到中東去，我們不能避免這結果。就效果而言，這種結果已使舊式的生活方式無效和陳舊。離開開羅幾哩外，我看見不滿十歲的埃及

小孩用輪子一類原始的抽水機，把水抽到灌溉用的溝渠內，這些小孩看來很聽話，但恐怕活得不長。整個埃及，從它和英國的奇特的「非戰鬥同盟」的地位來看，很明白的表現在戰爭期中，對那一邊能得勝利，始終採取一種根本無關緊要的態度。這並不完全是英國的錯誤，但在我看來，這與我們和英國忽略了我們自己的義務，有着密切的關係。

照我看來，這個使中東人民進步到技術和工業化的二十世紀的問題，實與政治和自治的問題，有着密切相關。

在這幾國家中，我所遇到並且談過話的許多西方人士，他們曾告訴我一些在他們認為合理正確的原因，是因爲大多數阿拉伯人，全都過着極端原始落後的生活。相同的理由很多，從說阿拉伯人的確願意在年輕天拆一直說到他們的宗教是妨礙積蓄資產，以致使他們無法改進他們所需要的生活。在我看來，這些理由大半都是廢話，如果使阿拉伯人有一個機會能感覺到他是在替自己做事，他們或許會着手改造他們所生活着的世界的。

在中東所談的自由或自治觀念過于絕端，對於美國人殊無用處。一方面，據反對的人指出，如果這些人立刻讓他們獲得解放來治理自己，必定會產生混亂紛爭的結果。從另一方面來說，贊成這種辦法的人，把西方國家在中東的勢力形容得太過份，描寫成簡直是一種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忘

記了英國法國和美國在此地商業發展的真正的收穫。

現實的真理，是在二者之間。我發現祇有很少數的猶太人或阿拉伯人或伊朗人或埃及人在希望西方人立刻解除對於他們的壓迫和束縛。他們所希望的，是一個有秩序，有規律的計劃，使英法二國，在把他們管理自己政治的責任，逐步轉讓給他們。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願望。像伊拉克這樣的國家，我看他可以滿足了。伊拉克是世界各國中從殖民地進為委任統治地，又從委任統治地變成一個技術上自由獨立的國家少有的例子。目前我常看到伊拉克的主權仍不時依英國的需要而在改變，至少在目前爲了要取得戰事的勝利，這的確有關軍事上的需要。

我喜歡我在伊拉克遇見的那位伊拉克攝政，阿伯特，伊拉王子，他在巴格達的星光下招待我的一次國宴，使我一生都會記住。他站在舖在草場上的美麗的地氈上，歡迎他的賓客。政府要員站在其他的地氈上。他們有許多人穿着長袍，帶着頭巾，其中有很有趣的經濟部長和被當地外人稱爲上帝的議會議長，因爲他穿着美麗的沙漠制服，留着有一拂長鬚。其餘的人穿着西式衣服，我聽說差不多每一位部長都會擔任過不管部部長的職位。

「手裏祇有少數幾張牌，」一位伊拉克朋友告訴我：「你就得時時換換位置。」

過了幾晚，又有一次宴會，這次是伊拉克首相納里阿沙特做主人，他是一個矮子，有一個銳敏的相貌，並且還有着非常伶俐的頭腦。

他在一九四一年英國軍隊趕走了德國所扶立的前任攝政雷希特，阿列、阿爾格蘭後，才重掌政權，納里把伊拉克統治得成爲英國「非戰鬥性同盟國」；十分希望參加戰爭，他開始即打算那樣做。

英國駐伊公使，康而蒂立斯爵士長得很高，愛抽烟斗，精幹、沉靜，是我在中東所遇見的英國殖民地裏面最守舊而矢忠于大英帝國的人。這個人，無疑地是納里所聽命服從的人，說得和緩些，納里對他有相當敬意。不過我猜想納里是個實事求是，不像想在英國統制下取得名義上的自由的人爵，要努力建設一個真正現代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他知道時間是對他有利的。

納里的盛宴是一幅天方夜譚中的中東圖畫。那天我們參觀了巴格達，城內有巍然直聳在空中的偉大的沙阿回教堂的黃金尖塔，佈滿灰塵的磚砌成的牆壁和房屋，金銀匠人製造飲酒杯和釘子的市場，以及祇賣紐約和利物浦機器製造的小刀鋪子，一個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院陳列了與我們最早歷史同時的烏夏來特發掘物，一家阿拉伯咖啡店，有許多人在談話，看報，以及在我們旁邊玩「雙陸」棋的。即使在這些背境下，那一次的晚宴是神話式的。



在幾個正式講演之後，接着晚宴是一個音樂會，音樂會又變成了阿拉伯舞女的展覽會，然後又變成西方式的跳舞會。不少英國和從波斯巴士拉來的美國士兵以及伊拉克的軍官們：都在阿拉伯的天空下跳舞。那晚上沒有一個在那里保守着西方與東方永遠不會見面，或者上帝會決定把阿拉伯人注定为沙漠民族，永遠受着來自海上的外國人所統治的觀念。

第二天，我從巴格達飛到德黑蘭，想起前晚上所遇到的事情。我忽然覺悟到在這許多快樂中，含有若干嚴肅的暗流，這種潛伏着的洪流與我在整個中東，和學生，記者士兵們談話中所看到的一樣。牠增加了我的信念。這些最近覺醒的年青人，如果不能從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和外國統治者手中獲得他們所渴望的教育，擺脫古老的宗教教規，和政府行政的拘束，他們一定會追隨這一時代中少數極端派的領袖了。面紗，污穢的土耳其氈帽，疾病，教育與現代工業發展的缺乏，政府的妥協性，都混和在他們腦中。這些都由于他們自己的社會和外國統治的私利相混合的力量所造成，代表着已經過去的事蹟。人家屢次問我：「中東是世界軍事交通的要點和通商要道，美國會不會擁護一種，無論怎樣有禮貌的，但是外國人統治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無論怎樣間接的，但是我們受制於外轄着的生活？」或者，他們會向你這樣說：「是不是因為我們是在要塞地帶，因此必須阻止軸心或其國人非民主國家，來控制這世界的軍事要道；商務大道的重要區域？是不是因為我們的運河，

大海以及我們的國家是控制東地中海與貫通亞州交通所必需，因此這種統治仍須繼續存在？」

我知道這問題可在其本身的說明中簡單化，但這是一個不大容易回答的問題。我知道這些地方是爲從蘇彝士，東地中海經過小亞細亞，到東方的道路，有保留的必要，那是很明顯的。要是我們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受敵人武力的威脅，也必須把這條通路保存在有友誼和安定的手裏面。同樣地，我知道另外有許多有歷史性，甚至直到目前，對於保護性的殖民地制度，認爲是對的政策。就實際而言，看到目前所發生的種種紛亂現象，這是一個舊的制度能否維持的問題。從理論方面來看，我們必須認清事實，因爲這制度是和我們聲明要消滅的主義完全相反，其次，我們如果再宣傳這些主義，我們會更加刺激起那些危及此種制度的紛擾。

這些我全明白，我在此報告的不過是那些首相，外交部長，以及在中東某一城市中所發現的醒覺的知識份子和甚至沒有受過教育的民衆空泛的腦子裏面所有的感覺而已。有着新的接近辦法，和忍耐的聰明，這問題終會有得回答。或者會有一個新的領袖起來，用激烈的神力，來歸併這許多不滿的意見。結果必然是外國勢力完全退出，失去民主政治的影響，否則便是列強用武力來和統治那些國家。

果我們相信我們所宣佈的目的，我們便應策動中東的新的力量，來與我們共同朝向這個目的

努力。我們必須增加當地居民的力量，放棄祇為我們自己的目的而在他們中間挑撥鬥爭，實現永久統治的企圖。

### 第三章 土耳其——一個新的國家

從北非繞着世界最古的海的東端，一直伸展到通中國之路的巴格達，這一部份廣大而古老的區域，或許即是我們這次戰爭決勝負的地方，這仍是一個可能發生戰爭的戰場；有着美國，英國，戰時法國和其他同盟國家的飛機和坦克車。而且不祇是一個戰場，也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實驗室，數千萬人民用遲緩而堅決的方式，試驗着不同的理想和愛國忠心。戰鬥也在此進行着，無論勝或敗，都在他們的關切之中。

關於中東的動盪和變化的感覺可以在土耳其獲得證實。土耳其在一世代中反應着從前是奧托曼帝國的廣大的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而且，土耳其所給予一個美國人的理想在他到達蘇聯，中國和印度邊界的路上所見的一切而更加強。

土耳其是一個新的民主國，去年秋天，才慶祝開國十九週年紀念。它比歐洲諸鄰國弱小。當我在土耳其時，和我談話過的土耳其人，都很敏銳地意識到他的國家，會有一天被人攻擊。土耳其比從前是小得多了——一個散漫的奧托曼帝國却已變成一個團結的國家。

雖然土耳其立國不久，較為弱小，在我看來却很可頌揚。因為它很明顯地決定用它所有的資源

來嚴守中立。因為他努力在建設現代化國家。因為我看見許多誠實堅強的面容，他們有的穿着制服，有的穿着便衣，很顯著的表现着他們有一個須要奮鬥的將來。最後，土耳其可讚揚的是因為我相信我在土耳其已能看到，這個國家業已發現了改進衛生，提倡教育，建設自由和民主政治，在世界最古的地方和最新的地方是一樣的重要。

安哥拉并非是世界上最大的京城之一，安哥拉附近的山上，仍保留着一部份古老的村落，似乎告訴土耳其人他們已進步了多遠。從另一座山上，土耳其民主國的開國元勳凱末爾，造有他自己的住宅，你可走下被兩旁樹葉遮蓋着的街道走向城去，路邊有寬闊行人道，街上充滿了車輛，居民穿得很整齊，來往很忙碌，城內的房屋建築得新式而且美觀。

有一天，我乘車到安哥拉以東四十哩外的鄉村去，駛出了安哥拉界，即發現是在舊的安哥拉城。在這鄉村裏你可看到有一種堅苦卓絕的力量，幫助你瞭解爲什麼凱末爾毅然決然的放棄傳統的奧托曼帝國的京城——君士坦丁堡現在改稱爲伊斯坦堡——而在這安那托列平原中部建立這新的京城。

有一點要明白，土耳其是一個難以攻擊的國家，一小隊受過嚴格訓練，配備完整的陸軍可以固守像安哥拉附近的鄉村區域，長時期抵抗來犯的機械化部隊。

很多牧人在山上放牧。即使在鄉下，也可證明土耳其共和國在建國後的十九年中，會如何地在努力建設。不少人在築造一條向東去的新公路，我們乘坐了滾路機和碎石機在這路上通過，看他們工作，那裏有許多現代式的灌溉工程——這種灌溉工程，可以使大部份安那托列的土地將來都變成富沃的農田。土耳其人對於他們公衆教育的進步，灌排和工業的發展非常自得，渴望我們去實地參觀。

我們參觀過一個村落，主要目的是去看一所師範學校，校舍正在村中泉水近旁，是用水泥和玻璃造成的。一邊是可喝的水，另一邊擺有洗滌用的傢具；村中的小孩在這泉水裏遊戲，我站在那裏看得很有趣味，帶面紗的婦女們穿着舊式的衣服，沉靜地坐在房屋的頂上。我也看見年青男孩和女孩在看着清潔的泉水——和我一樣的看着一些新鮮美好的和興奮的東西。

在我短時期的停留中，我盡量參觀土耳其的工業。在數量上說來，比起可能來侵犯土耳其的德國的工業不及甚遠，但牠們的質量和將來的前途却很值得注意。我看到飛機場，機械化部隊的配備，火車以及最進步的各種建築物。我看到了這許多東西，更相信工業革命不是任何國家或任何民族所能獨佔。嘈雜的機器聲驚醒了數千萬中東的人民——喚醒了他們也擾亂了他們。工業革命給土耳其人帶來了新的技巧和新的饑餓。現在他們現代化，已開始學習如何使用工具，其勢已不可遏止。

在戰爭進行中，土耳其進行着社會和教育的革命，比它的工業和經濟的建設更令人感動。照一

般旅客的看法，從一個國家的人民所穿的衣服可看出這一國家變動方向的表面。在巴格達，我看到政府官吏，有的穿西式服裝，有的穿回教傳統的長袍。在中國，主席按着中國的習慣穿着中國古代的衣服，使中國人更加崇敬，蔣夫人也穿中國式衣服，但她的服裝，看來多少受一點英國時裝雜誌的影響。在土耳其，每一個官吏穿着西服才認為光榮。土耳其帽在當地明令取消作為一種改良的象徵。要是遇到少數仍戴着面紗的女人，看來反有些不服眼。凱末爾及其有決斷能力的繼承人員領導之下，土耳其人，已經在名義上和形式上取消了古代東方的面紗。

這種古老習慣的改革，並不靠一些佩獎章穿制服或羣衆的歇斯的里亞而成功的，他並沒有攻擊任何一國而達到了目的。

美國對於土耳其這些改革特別感到榮幸。在伊士坦堡城外，有一所勞白脫大學，可惜我沒有去參觀，現在如過往幾年中一樣，這學校仍在毫不自私地在試驗着國際化的教育，學校的畢業生，現在有不少土耳其政府的重要官員。他們已能充分實用美國教師所教授給他們的智識和概念。這些美國教師，并無別的目的，祇希望消除世界這一部份人的迷信和無知，同時，希望使整個世界能夠繁榮富饒。

不過美國人要瞭解整個亞洲嚴重的教育問題究竟多麼嚴重，也有困難之處。在我們一個兒童進

學校和讀書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我們的兒童也必然是學生，可是我們用什麼方法才能使他們的兒童也那樣便覺困難了。

在土耳其鄉下，一般人民對於受教育並不當爲一件必然的事。我在一所簡單的學校裏，校舍是教師和學生們所合力建造的，聽着年青的土耳其孩子們唱着他們的國歌，我看着他們練習他們的土風舞，表演着一度盛行於安那托列的古代技藝，同時他們也正受着現代教育，他們也在學習着科學農藝。我深信用這種方法來教育人民，是歷史上有決定性的事情，這是一個大的轉變，而這轉變不會後退。

現代化的土耳其，雖然年青，人民對於自由和自治尚缺少經驗，將來必定有不少事情須要努力。這從他們談話時的神色上看得出來，從他們的演講中也可知道土耳其人對於現代化的努力。此外，在他們像安哥拉一樣的新城市和在他們古老的村落中，正如我在土耳其鄉村裏所看到的，土耳其是在不斷地進步。

很自然的，土耳其人并不喜歡戰爭，他們知道如果一旦德軍入侵，他們所有的一切新的成功都將燬滅。土耳其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它的一千六百萬人民毫無在國外侵掠領土野心，對於如何改變這世界戰爭的均勢也沒有空想。因之，他們決定採取武裝中立政策。去年秋天，他們已有一百萬



人民加入軍隊。他們已培植了一個訓練有素，有決心的軍事機構，不過其中大部份仍缺乏若干現代軍事設備。我曾經和土國副參謀長談過，並且在軍官學校裏的演習中，看見他的士兵到處警戒着。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任何侵略國家想利用土耳其做爲進攻東方的橋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除了看到土國的士兵，我和他們政府領袖也會有過長談，他們很焦急地關心着歐洲局勢，雖然不曉得什麼時候，土耳其將陷入捍衛祖國的戰爭中。

生活在這種焦急的憂慮中，是很苦痛的，但我看見土耳其人民沒有一個不具有堅強的決心，假使他們的和平與安全受到任何威脅，他們將不顧困難，猛烈地加以抵抗。

我相信這一切，決不是一個鄉導者造出來欺騙旅客的話。實情決非如此簡單，我會和土耳其首相薩拉茹格魯晤談，他是一個有才智引人注意的人，又和繼薩拉茹格魯爲外長的納門卑談過，他是一個聰明而有聲望的人。另外我又和若干政府人員，新聞記者，士兵，農民，及工人談過話，他們同樣告訴我說：「我們不要戰爭，甚至很小的戰爭，但是如有侵入我們邊境的兵士，我們一定加以槍殺。在我們停止在山丘上，樹林中，或路旁的槍聲前，一定先有不少外國人在那些地方犧牲。」

土耳其人時常說到「外國人」這三個字，他們也時常堅決地表示他們要對付來自任何一方的任何侵略國家的抗戰決心。但是，很清楚而無須他們說明的，他們最追急的感懼，祇有一個方向。現

在他們並不恐懼英國和我們，因為英美二國都是土耳其的盟友。那堅強的蘇聯亦是土耳其的盟國之一，雖然他們對於蘇聯最後的目的有些固執，他們最急的憂慮是在西方，在西方有一個在最近幾年來，在歐洲所造成的具有侵略野心的力量，威脅着土耳其，要跨越過他們的國土，向亞洲進攻。土耳其人在憂慮與恐懼之中觀察着，因為他們怕懼打仗。可是這種不願意作戰的心理，決不是爲了驚惶或者是含有妥協性。德國曾經二次企圖在土京造成「和平攻勢」，可是先後失敗了。

土耳其人喜歡和我們來往，和我們交換貨物。土耳其出產的鉻約計世界消費量四分之一，他們的烟草和他們的棉花是我們所急需的。有着資源，土耳其無論如何有相當時期可支持他的中立。我也發現他們需要食糧，尤其是大麥，他們也需要製造品和機器。我特別高興的是在我回到美國後，我們運往土耳其的食糧和其他物品，已有大疊增加。因爲現在祇有我們可以充分地供給他們。我深信爲了我們的利益，在可能範圍內，當盡量不讓土耳其的資源落於我們的敵人手中，並且保持一個要與我們爲友的國家的中立。

我們對於土耳其的決心嚴守中立，可不必憂慮，因爲十年來，戈倍爾和其納粹宣傳機關雖不斷在土耳其努力做拉攏工作，並沒有改變這些雖已遲緩但終不失深刻覺醒的土耳其人傾向于和世界大民主國家發生密切關係的決心。土耳其人是我們的朋友，他們喜歡我們并且讚美我們，不怕我們也

不嫉妬我們。

土耳其執行它的中立政策可算是十二分澈底的。舉例來講，他們會拒絕我乘坐會載我飛行全球的美國飛機飛進他們的領土，結果我祇能在開羅換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經地中海東岸和多山的泰魯斯山到安哥拉。在我們降落的飛機場中，我們看到三架因航空員在轟炸羅馬尼亞油田回來失事被迫下降的美國自由式轟炸機，航空員被土國扣留，他們的飛機也被謹慎地看守着。

不過在這種正確的中立中，有着誰也不會認錯的對於盟國的友愛。在我訪土時，軸心無線電會發出怨言對於土國之招待我訪土，很不滿意。我告訴新聞記者說：要答復德國的批評很簡單，那就是：「請希特勒派一位他的反對黨的候選人代表德國，來土耳其一遊就是了，」後來我發現我這句話成爲土國官場的笑談。

土耳其在民族主義口號下已有着不少成就。土國及其政府官員，對於其在本國並不急需的國際合作的必要，比我所經過的任何一國特別尊重。這在我和土國首相外相以及著名出版家的長談中特別感覺到。

一般講來，在任何一國的京城裏，我們可看到一種國際社會的形式。有一晚上，外長納門卑在安哥拉城外請客，地點是在凱末爾的鄉居，這是在城外所創辦的現代農場。別人告訴我這是一所

現代化的農場，但我所看見的乃是一座建築在山上的美麗的皇宮。在房子的坪台上佈置着花卉，向下可看見遠處安哥拉的燈光。其中一間房間，現在作為外長的宴會廳，有一把凱末爾用過的純金製的電話機。一個廚子慢慢地轉動一大片放在炭火上烤的羊肉，把面上烤好了的切下，放在一碗飯上。

我們的主人納門卑站在大跳舞廳中，他是這一代中外交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他身體不很好，但是他的蒼白和一般的矮小，反而增加了他關心於歐洲和世界的問題，增加了他外交的技巧。我發現他的頭腦像他的容貌一樣。有一點憂愁，有一點傲世，很強，也很狡猾。

同盟國方面的各國外交家，和他們一起跳舞狂飲，暢談。受軸心指揮的新聞記者，參加了我在安哥拉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但軸心外交家，都不和同盟國外交家在交際場中為伍。那一晚有不少節目，蘇聯大使因公赴莫斯科，但是代辦來參加了宴會，穿着我們所沒有的整齊的夜禮服，不過帶着嚴肅乏味的舉動。一位身材高大穿着鶴鷺羽毛衣服的英國太太，看來和這位代辦却好相反。後來我帶知道這位太太的丈夫曾參加過在克里地島的戰爭。希臘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向我走來，他們把手臂搭在彼此的肩上，告訴我他們對於成立一個歐洲邦聯的計劃。另有一位我從未聽見過的外交家，帶着驚惶和紛亂的神情和不準確的消息告訴我，一位美國拳術家叫康文，剛剛打敗了裘，魯意斯。

看來十分魁偉的阿富汗大使，向我訴苦說，他到安哥拉任職的主要目的是來打獵的，可是現在他發現土耳其正在準備一切非常措置，阻止了他所愛的運動。

還有這些足以反映我們世界在混亂之中，我那主人的矮小身材，却在慢慢地生長變高了，正如同他前任外交部長現在是他上司的薩拉茹格魯一樣，他並不因出身和學問的淵博而得到力量，他一生經歷不少辛苦，最初跟着凱末爾和土耳其人民，現在祇有土耳其人民了。那天晚上在他自己的宴會中，我仔細注意着他，在熱鬧的國際性的外交宴會中，他喝着英國威士忌酒和吃着俄國卡伐爾，跳着美國音樂的舞，使我比前更深信土耳其人民已將他們的一切，努力從這次戰爭所改變了的世界中，抬高土耳其的地位。

正如同我每次在土耳其所看見，使我驚異的紅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們，或者在街上臉色堅實得和鐵一樣的士兵，或者在勞白脫大學裏學習過溫柔流俐的英文的學校教師一樣，在我看來，納門卑是目前在中東民族生命中，深刻工作着的廣大的潛勢力人物化了。他是古老民族的出品，有一個驕傲的傳統性，而在自己的一代中却經歷一個別人從未經驗到的最強烈的變動。

上次大戰中，土耳其是在德國一邊，那時候，這個在廢墟中生長起來的新民主國家的奧托曼帝國，到處都不受人歡迎。甚至「土耳其」這個名字，也是一個有罪惡的名字。

土耳其現代化的十分迅速，我們許多人却都把牠忽略了。不到二十年，凱末爾或他們的朋友，如納門卑和薩拉茹格魯的艱苦奮鬥，已經把土耳其人的力量與野心，努力改造成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土耳其人，如同中東的阿拉伯人，如同生活在中國疆外的居民，或者如南太平洋島上居民，或者如同印度人一樣，在一世代前他們沒有自治的經驗，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受到教育，沒有最低廉的公衆衛生，他們受到一個歷史很長時期的剝削，貧窮與困苦。但在很短的數年中，他們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古老的舊俗，以及他們思想的方法。

我在土耳其所認識的一位婦人，從她的真摯的態度和風格中，我獲得了土耳其變動的印像。她是一個純粹土耳其土人中一位動人的青年婦人，英文講得極好，她的談吐，正如同今日的知識婦女一樣風雅。她原住在伊士坦堡，但為經辦一件案件到安哥拉向土國最高法院辯論，因為她是一個律師，也是土國最高著名的律師，業務甚為發達。她雖是一個女律師，我亦曾看到一般人對她有任何驚異的批評，我並且看到不少的婦女們也在研究法律，其中包括有政府官員的女兒們。

這些都是土耳其所有的事情，因之我不能不想到我的童年時代，那祇不過在四十年以前，一般人認為我母親執行律師業務和關心公共事務，是極不普通的——在印第安那洲中部的人看來甚至是一件奇事。

## 第四章 我們的盟國——蘇聯

九月十八日星期四，我飛到了蘇聯境內，飛過了裏海，飛過了烏拉河的三角地帶含鹽質的紅池灘，一直飛到伏爾加河上的古比雪夫。十天後我離別蘇聯，沿着中亞細亞到中國的運絲綢古道，從伊犁河上流下飛。後來我們從中國回國又借道蘇聯，在西伯利亞降落了三次。

我在蘇聯一共祇有兩個星期。以往我從未到過蘇聯。我不會說俄語，但是我有幾個美國人在一起替我翻譯，我會經讀過許多關於蘇聯的書籍，但是對於那個廣大的國家的真實情形，那些書籍從未給我一個清楚的概念。除非以一生的時光研究，精讀滿架的書籍，才能知道這個如此廣大而變化又如此複雜的國家，可是這樣的信願在我去蘇聯以前，最後竟發生了懷疑，到了蘇聯，我才愈來愈相信了。

那是的確，而且值得報告的，蘇聯政府到處給我所要訪問的機會，允許我隨意調查實業和軍火工廠，集體農場，學校，圖書館，醫院以及作戰前線。我來去非常自由，像在美國旅行一般，而且我逢人隨意發問，沒有什麼限制或干涉，通常有一個會說俄語的美國人和我在一起。

凡是初次訪問蘇聯的人都不免要常常回憶蘇聯的過往。在古比雪夫時，有一天下午，我想起了

蘇聯革命以前的時代，我沿着伏爾加河西岸的陡峭的河岸走去，在一條公園的長凳上坐下，俯視着下面的河水。蘇聯政府撥給我們一座伏爾加右岸的紅軍休息所。氣候已十分寒冷，但樹葉尚未凋零。沿着河岸有許多小小的未加粉飾的別墅——俄國人所愛好的鄉間小屋——以及松樹，望去十分幽靜，而且深遠，好似下面有着大江。松樹以外即是麥田，像波浪滾滾的，一直綿延到斯大林格勒，在那里蘇聯的士兵堅強地團結在一起，對付納粹的坦克車和飛機。

在我的下面，有一艘貨船，靠着河岸已卸完了木材。木材堆積着，佔有好幾畝地的面積，自頓河流域淪陷以後，把所能獲得的煤量都用於軍火工業，蘇聯各城市在將臨的嚴寒的冬季中，唯一的燃料即是木材。一個牧童引着一羣綿羊沿着河岸過去。在河的中央有一艘裝滿載的油船，慢慢地駛往上流。一個年青的蘇聯士兵在羊羣後面跟着走，用腳把石片踢到河里去。當他脫去了制帽，風吹動了他的頭髮時，看去他更顯得年青了，那時我注意到他的帽上有着NKVD秘密警察的徽章。

我想到那一九一七年前造船的人，他建造了那所在我後面的避暑別墅。人家告訴我說，當時他在那地方很有權勢，他是一個有力的船主和穀商，當那城市還叫薩麻拉的時代，他在伏爾加流域的商業非常繁榮，可是自從薩麻拉改稱古比雪夫以後，他的事業即隨之結束，因為薩麻拉的革命黨員實行了第一次的五年計劃。那座別墅還留着，比附近的房屋整齊些，因為紅軍覺得它有用。



我可以看見，對於我似乎是這樣，在革命的名下，整整一代男子和婦女被屠殺，家庭被蹂躪，忠義被毀滅，成千萬的人民，死於戰爭，暗殺和飢饉之中。

那個時期的真正歷史，也許永不會有詳細的記載。除非逃到異國的那些人，但那樣的人是相當的稀少，實際上俄國的上中兩層階級現已完全消滅了。現在俄國人祇覺得過往的歷史是一章英勇的史蹟。

在我到蘇聯以前，我不知道他們的情形真實到怎樣一個地步。因為我未曾充分地估量現在俄國，現代的俄國是由沒有財產，沒有教育的祖先而祇有公民資格的子孫組織和治理的。如今在蘇聯幾乎沒有一個居民身份差於革命以前的他的祖先。俄國人，像所有的人一樣，自然會感到這種提高他們身份的制度是優良，而漸漸忘記了完成那個制度的兇暴手段。這對於美國人似乎是不可相信或贊同的，但是在蘇聯，無論那種人確是那樣，有一個晚上，我在莫斯科和一批現代俄國的智識階級談話，故意提高這一點，他們竭力維護他們的制度，那樣的情形，表現得更為明顯。

但是我決不是追憶過往而到蘇聯去的。除了總統的具體的囑咐外，我是決心去為我們美國人這一世代的實際問題，尋找答覆，即是蘇聯存在這一簡單事實，不管我們贊同與否。

我相信我已找一些答覆，至少對我自己是滿足的。我把三個最重要的答覆，簡略敘述如下：

第一、蘇聯是一個有效能的社會。它工作着，它有存在的價值。蘇聯抵抗希特勒的記錄，足以給我們大多數人的證實，但是我必得完全坦白地承認在我去蘇聯以前，我並沒有像現在一般的了解蘇聯的力量，她是一個男子和婦女的前進的機構。

第二、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是我們的盟國，俄國人受希特勒的蹂躪，比英國人所受的還大。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制度的憤恨，確是既深且鉅。這一種憤恨使他們決心消滅希特勒並把納粹的病菌，逐出於歐洲和全世界之外。

第三、戰後我們必須和蘇聯合作。至少我覺得應該如此，假使不這樣做，結果決不會有久長的和平。

那些結論因我在蘇聯各地所看到和聽到的事實而加強。我在蘇聯前線某地，親眼看見紅軍的行動。我看見許多前線與後方的工廠，在那些工廠裏，蘇聯的工人經常地以大量的軍火和物品供給前方作戰的士兵，這種情形，誠使我們的專家感覺驚奇。我看見集體農場。在工廠和農場的後面，我看見蘇聯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我也會和他們談話，他們給全國人民一種參加十字軍的非常崇高的感覺。在新聞記者的後面，我看見「克里姆林」，和斯大林先生會談兩次，並且看到了在無產階級獨裁下權力如何的行使。最後，在這一切後面，我看見了從蘇聯一端到另一端的蘇聯人民，雖然我所

舉出的人數和二萬萬相比，數目確是太小，不過那完全是由於機會，並不是我故意的選擇。

使我最感動的一次經歷，即是到塞夫前線的旅行。從莫斯科到塞夫，必須經由列甯格勒的公路到加里甯，那里時常稱爲的威爾，然後西向至克林，此去不遠至一小鄉鎮，名爲斯塔立薩。我們坐着舒適的汽車出發，整夜疾駛。天明時到斯塔立薩，改乘美國製造的小跑車吉潑（Жиппа），同行的有非列浦，泛蒙維將軍·福來脫·勃拉特萊少將·美國駐蘇聯陸軍武官，約瑟·密啓拉上校，以及本團中四位團員和蘇聯嚮導人員等。

吉潑小跑車確是一個重大的發明，我是美國人，我覺得非常誇耀。這一次我乘了十四個鐘頭，知道了那車子的構造，它的角度，它的曲折的行進，可是把我顛得有些頭暈，使我對於它是美國出產的誇耀的感覺竟然遲鈍了。因爲無盡的時光行着似乎無盡的路程，我們在凹凸不平的泥濘的路上，顛顛跛跛的行駛着，我第一次才真正了解我祖父時常告訴我的關於初開闢的印第安那的情形。

最後我們到達塞夫以北爾雷盛科中將的總司令部，爾雷盛科中將是富於豐采的人物，在我遇見的好許多人中間最爲生動。他祇有三十八歲，然而他已以中將的階級，統率十六個師團的士兵，守衛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線之一。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長得很結實，兩腿有些彎曲，生來是一個哥薩克的騎士，臉發紅光，

生氣勃勃，充滿了活躍的精神。他帶我們到他地下室的總司令部。他向我們說明他的作戰地圖，他的軍隊的位置，他的攻擊的計劃，以及圍繞我四周正在進行的戰爭中時時刻刻的變化。

那時他開始抄道塞夫，打算截斷至維羅瑪的鐵路，這件工作在我們回到美國以後尚在進行幾星期之久，也即是解除列甯格勒之圍的先鋒。從他的位於山頭的縱樹蔭下的司令部中望去，我們可以看見而且可以聽到離我們約八哩的城外的砲聲火光。

他的指揮的有條不紊，使我非常感動。他祇要一開口，兩三個部下立正著等待他的命令。一羣穿制服的婦女，也使我非常感動。除了通信，衛生和運輸工作外，我們在司令部附近以及軍官工作的地下室附近還看見她們守衛着崗位。

從總司令部，我們再往前駛去，接近火線去考察一個最近為蘇聯軍隊收復的德軍的一個堅強據點。那裏以往是一個位於山腰的小村莊，現在却祇見一堆破碎的斷垣殘瓦，泥堆，鋼盔，以及未曾掩埋的死屍。在一列戰壕的底里，我看見一個未曾啓開的罐頭，一半埋在泥中，上面有英文標着 Luncheon Ham（午餐火腿）我懷疑這一罐東西是德國人從別的戰場上拾來的。

那位將軍告訴我，他的部隊正捕到了幾個德國俘虜，問我是否願意見他們。我說我很願意，並且還願意和他們談話。他回答我說：「我已接到命令隨你意做好了。」

我把他們新俘來的俘虜看了一遍，一起十四人絕望地站在一排。我更仔細地看了一遍，於是我對自已說「這些衣服穿得如此單薄，面帶憔悴和病態的士兵，是否即是我以往在許多故事中讀到的威嚇而不可擊敗的德國兵？」通過傳譯員，我開始和他的談話。我問他們在德國住在那裏？有多少年紀，是否得到家信，家庭失去了他們如何生活，以及許多其他簡單的善意的詢問。他們逐一的答覆，於是德國軍事前線的最後的遺跡也隨之消滅了。這些士兵變得十分悲慘和思家。其中幾個已年近四十，幾個祇有十七歲。

我轉向那位將軍，告訴他我正在想的。

「很對，威爾基先生」，他回答說，「但不要誤會。德國的配備依然非常豐富，德國的軍官，受有精良的訓練，而且是職業化的。德國軍隊的組織是舉世無雙的。固然你在這裏看見那樣不振的德國士兵，然而德國軍隊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戰鬥的軍事機構。但假使貴國能運給我們所需要的裝備，紅軍定會自高加索一直到北極，從每一戰場上把他們逐出。因為我們的士兵比較更優良，而且是爲着祖國而戰。」

我想他們的軍隊是比較優良，那天整天以及第二天，他們爲祖國作戰的情形，很明白的可以證明。在前線後面數哩，我們看見蘇聯的農民用牛車裝載了家產，一路緩步而行。最驚奇的事情是他

們並不離開前線遷移，而是接近前線，給紅軍從敵人手里收復來的土地，帶來一種基本的力量。他們發現村落都被毀壞了，祇有幾個消瘦的煙囪，矗立在天空，但這正是秋天播種的季節，因此他們回來了。

一陣寒冷刺骨的秋雨——約在一兩個月以後，德國人也嘗到了這樣的滋味——延遲了我們的行程，那位將軍請我們一起進晚餐。蘇聯的軍官和士兵，以及他們的賓客一起約有四十人，擠進一個營帳裏，我們吃冷的醃豬肉，和裸麥製的麵包，蕃茄，胡瓜，醃菜，並且相互以伏特酒祝盃。

在晚餐時，我毫無思考地，要翻譯員問那位將軍，他所防守的兩千哩的戰線，其區域究有多大。那位將軍對我一看，似乎有些不快，那翻譯員接着替他慢慢地重複說：「先生，我並非在防守。我是在進攻。」

自我訪問塞夫以後，對於在蘇聯的「這是一個人民戰爭」的真正意義，比以往認識得更清楚了。摧毀希特勒主義決心最大的是蘇聯的人民。他們所經歷的以及他們將遭遇的一切，使每一個美國人受到感動。在我去考察前線之前，斯大林給我相當的事實，關於蘇聯的犧牲以及迫切的需要，現在我親眼看到兩者的實情。

蘇聯人民傷亡或失蹤的已達五百萬人。蘇聯西南部的肥沃土地，大部淪於納粹之手。他們的產

品供養了敵人，他們的男子和婦女被迫做了敵人的奴隸。成千的蘇聯村落遭受破壞，他們的人無民家可歸，蘇聯的鐵路運輸，已經載量過重，工廠的產量達於限度，並且在盡量的開發她餘下的油田和煤礦。

食糧在蘇聯感覺很恐慌——也許還甚於恐慌。冬季到臨，蘇聯的人家簡直沒有燃料。就是我在莫斯科時，那里的婦女和孩子，從五十哩以外去搜集木材來，以備製造稀少的熱量，抵禦嚴寒。至於衣服，除了軍隊和重要的軍事工業的工人外，幾乎已不能取得了。許多大量的醫藥生產，竟也停止了。

這是我所得到的戰時蘇聯的印象。然而沒有一個俄國人說要逃避。他們都知道在納粹侵佔下的各國情形。我相信蘇聯人民——不祇是他們的領袖，已下了勝利或死亡的決心。而他們說必能勝利。

我化了一整天時光，參觀一所蘇聯飛機製造廠。我也參觀了蘇聯其他的工廠，如糖果工廠，軍火工廠，鑄造廠，罐頭製造廠，以及電力廠等。但是這個飛機製造廠，現在位於莫斯科的郊外，在我的記憶中，最為生動。

製造廠的範圍很大。我猜約有三萬工人，分三班輪流工作，每天可以製造很可滿意的數量的飛機。那里製造的飛機，即是現在著名的 Stormovik 單引擎，重裝甲的戰鬥機，那是俄國人發明改良

的用於戰爭中的珍奇武器。這種飛機的升高度不大，慢慢的上爬，所以實際上，須要一架戰鬥機保護，但用爲攻擊坦克車的武器，降低飛以高速度而且攜帶鉅大的火力，這確是紅軍最有力量武器之一。

幾個美國飛行專家和我在一起考察，他們證實了我的意見，我們看見那些飛機，從廠里運到旁的飛機場上去試驗，結果都認爲是很好的飛機。尤其驚奇的，他們宣稱用以保護飛行員的裝甲，比他們所知道世界上任何飛機用的都好。我不是航空專家，但我一生參觀過許多飛機製造廠。我冷靜地觀察，我想我的報告是公正的。

製造的過程中，各部分粗粗地看了一遍。Sormovik 的翅膀用數層木版，經過蒸氣壓窄，然後覆以帆布而成。製木版的工場，我覺得太依賴手工，這在他們的出品上可以知道。而且有些發電和電鍍的工場也過於舊式。

除此以外，我覺得這個飛機製造廠比我看到的一切，都顯得更有效能。我逐一的參觀車床和鑽孔機的工場。我看是那裡的機件是從各國搜集來的，商標上表示是從克姆尼斯，斯高達，塞斐爾德，辛辛那提，斯維爾特洛克，安特衛普等她來的。這些機件效率很大。

這製造廠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工作是婦女做的。在工人中我們看到不過十歲的童工，都穿着



藍色的工衣，看起來好像是學徒，甚至工廠裏的職員也公然的承認許多工廠里的童工，像成人一般的每週工作六十六小時。許多職管鑽孔的童工，十分熟練，而且似乎做得非常優良。

一般而言，那製造廠的人員，在我們美國人看來，似乎太多。和一個相類的美國工廠此起來，工人的數目也較多。但在每三架或四架機器上面，都有懸着一個特別的記號，表示那里的工人是一個斯日哈諾夫運動的優秀工人，證明他或她超曠工應有的生產範圍。這一種斯日哈諾夫運動，我們看來覺得很奇怪，實在是一種包工，工作的速度愈快，報酬也愈增加，像是一種加速的雇員制度。蘇聯的工業制度，我們美國人覺得非常奇怪。雇用勞工和報酬的方法，一定會使我們一般最不合羣的工業資本家滿意。對待資本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會使鴉門，湯姆斯之類的人滿足。工廠的牆壁上時時標出光榮的工人和工場的名單，鼓勵生產不絕的競爭。我的公正的結論是，這一種特殊的鼓勵可以補償大部份，雖然不是全部的，技術的缺點，這在我們和工人間隨意的談話中，可以很明白知道。

每個工人的生產量，比在美國的為低。蘇聯的官員對我很坦白的承認這一點。他們解釋他們必須以教育和訓練來改善，否則祇能特別以愛國熱忱以及多用童工和年老的女工來加以補足這個缺點。同時，因為那里沒有反光鏡的設備，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飛機離開最後工場的大門，去試驗機關鎗

和砲的射程，然後升空在我們頭上飛行。

製造廠的廠長，面帶愁容，約模三十多歲，名叫脫利耶可夫，他請我們在廠里進午餐，我們走過長長的走廊，籍着暗淡的藍色的電光，走到一間簡單的房間，完全沒有窗戶，他便在那裏工作。在一張會議桌上，放着三明治，熱茶，點心，魚子醬，滿桌是伏將卡酒。在一個角上，張着兩面旗子，都是克里姆林因那製造廠實行計劃成功而特別獎賞的。

脫利耶可夫等着回答我的問題。他坐在桌子的一端，在他的暗灰色制服上，有着一顆銀星的徽章。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獲得這樣的星章的七個蘇聯人民之一，同時獲得「蘇聯英雄」的稱號。

在一小時談話以後，我知道他確是當代的社會領袖。他平靜地，鄭重地說明他的工作對於國內外的迫切需要，他對於他的巨大的製造廠，知道得非常精細，我問了他幾個問題，例如每天能生產若干飛機，工人的確數多少，Stomovitch的最大速度多少，他有禮貌而肯空地一一回答。當我提出一些比較精細的問題時，他兩眼閃耀着，但並不比英國或美國負責的工廠經理會多洩漏一點軍事秘密。

他告訴我，這一所製造廠，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間，從莫斯科移來的，因為當時蘇聯的首都已經聽到納粹的砲聲了。在軍運緊張的路上，它遷走了一千多哩。後來又重新安置下來，許多原來

的工人在遷運之時，始終照顧着他們自己的機器，兩個月後，十二月中，在新的廠址又開始生產飛機了。

他告訴我說，在一九四二年初，廠中沒有暖氣，工人們在工場裏升起爐火來，保養機器不致凍結。工人沒有宿舍，許多人睡在機器旁邊，至一九四二年秋天，情形好得多了，例如我所看到的工廠食堂，供給工人簡單精美而又營養的食物。但是我知道就是在那城中，市上唯一可以買到的食物是黑麵包，而且價格奇貴。

午餐散後，我開始問一個短少精幹的青年，廠長給我介紹，他是生產的監督，是廠長的一個精敏的助手。他穿着工人衣服，戴着工程帽，這在蘇聯幾乎是一個工業工人標記。他是一個有訓練的工程師，有着活潑優美的姿態，有力量，聰明，對於工作有着完全的知識；假使在美國的工業生命中，他定能進步，獲得能力，做同事間領導者。事實上他使我想起有希望的美國工業人才，使我決心要從他身上知道共產制度下的引誘和鼓勵，究有多大力量，使他超過其他的同事，教育自己，爲了做三萬人的監督，和獲得使他成爲領導者的知識，必須工作額外多的時間。

他說他很高興回答我的問題，他告訴我他是三十二歲，已經結婚，有了兩個孩子。他有着一所舒適的房屋，優於一般職員，在平時他還有一輛汽車。

「你在這廠里做監督所得的報酬，和製造廠裏一個平常熟練工人所得的報酬相比，究竟如何？」我問他。

他想了一想回答說：「大概要多十倍。」

這和在美國每年二萬五千元至三萬元的比率相似，他的工作實際上和在美國負有同樣責任的人也很相似。所以我對他說：「我想共產主義的意思是報酬平等。」

他告訴我，平等不是現在蘇聯社會主義觀念中的一部分。他解釋，「量能力而取用，視工作而給與」，這是斯大林社會主義的口號，等到他們完成了他們所工作的共產主義局面，才能改變口號為「量能力而取用，視需要而給與」。他又說，即使到了那時，澈底的平等也並不需要或所願望的。

「有那樣一筆收入，通常你應該可以有些積蓄，你是不是有些積蓄呢？」我接着說。

他笑着說：「是的，假使我的妻化費得不多。」

「那末，你怎樣處置你的積蓄呢？你怎樣把它們投資？」

「用我第一筆積蓄購買了一所優美的房屋，」他告訴我說。

「然後呢？」

「然後我們在鄉間買了一所住宅，放假的日子一家人可以去住，在我能離開工廠的時候，我也可以去那裏休息或垂釣和打獵。」

「那末你除化了那些錢之外，你怎樣處置你餘下的錢呢？」

「喔，我藏著現款或是用來購買政府公債。」

蘇聯的政府公債是沒有利息的，我記得我第一次積蓄的錢，並且我記得想如何利用牠去獲得收益，因此我問他，看他對這問題如何回答：「你爲什麼不投資在什麼地方，謀取較好的利益？」

他驚奇地看着我，我想，帶着一些優勝的神情，「威爾基先生，你的意思是要從資本上獲得利益麼？在蘇聯這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我不相信。」

我想要他告訴我什麼道理，結果我聽他講了十分鐘關於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理論，最後我以問題切斷了他：

「那末什麼東西使你那樣勤奮地工作呢？」

他的手臂在他身旁拂了一拂回答說：「我專心於這個工廠。將來有一天我將升任廠長。你看見這個徽章麼？」他指着他制服上掛着的一串獎章，「這些都是黨和政府給我的，因爲我的成績優良。」他說時帶着坦白的自負，「有一天我的成績夠好時，黨部將會給我一個職司專心服務政府

「你老了誰來照顧你？」

「我將有一點現錢儲蓄，假使不夠用，政府會供給我的。」

「你會希望要自己辦一個工廠麼？」我問他。

對於這個問題，他又發表了一套馬克斯經濟學，和社會哲學的宏論，他對於這些理論，像對於他的工廠一般的熟悉。

「那末你的家庭怎樣呢？」我固執着說。「你不要你的孩子們有一個較你更好的開始麼？如果你先你妻子而死的話，你不要預先設法爲你的妻子取得一種保障嗎？」

他不耐煩地說：「那祇是資本主義的說法，威爾基先生。我開始是做一個工人。我的孩子們將會有一個像我一般良好的開始。我的妻子現在也在工作，祇要她身體好，她會繼續工作的。當她不能工作時，國家會照顧她。」

「那末」，我說，「假使你沒有把你的職務做好，你將會遭受怎樣的處分呢？」

他帶着冷笑說：「我將會被革除。」我知道那意思可能從降級一直到死刑。但是他顯然地想他決無做不好的危險。

我於是又轉換了另一個方向。

「假使——在平時，不在戰時——你不喜歡你這裏的廠長，你能離開這裏到別一個工廠去另找一個職業麼？」

「許多工人是可以的，但我是一個黨員，我必須留在黨部認為我所能夠做得最好的地方。」

「但是，假使你喜歡做另外一種工作，你能改換你的職業麼？」

「那是要聽命于當局的。」

「我知道你是完全同意你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理論的。但假使你遇有不同的觀念時，你能表達出來，並提出爭論麼？」

這問題費了我十分鐘熱烈的申述，才使他考慮這一假設，可是他的回答是聳一聳雙肩。我却有些不耐煩了，因此我高聲地說：「那末實際上你並沒有得到自由。」

於是他振作地有如敵對般的說：「威爾基先生，你不了解。我比我的父親和祖父有着更多的自由。他們是農民。他們永不會學習閱讀或寫。他們是土地上的奴隸。他們病了，沒有醫生或醫院。我們是我們世代以來第一人能有機會教育自己，改進自己——這對於我即是自由。這對於你也許算不了自由。但是，記着，我們的制度正在發展的過程中。將來定有一天我們也會獲得政治的自由。」

我緊逼着他說：「在國家統制一切的情形下，你如何能獲得政治和經濟的自由？」

他又滔滔不絕的傾出了同樣無盡的理論來，但是除了那一套他所熟悉的馬克斯的理論之外，他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馬克斯主義却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當我臨行之時，我聽到我們的驚人熟練而又聰明的飛機駕駛員開脫上尉對蜀，朋納斯說：「聽着，威爾基先生正在和那人談話，在你對那人的解釋沒有弄清楚之前，我們不要離開。自然，我們在美國，金錢可以購買需要的一切，但使我們工作的不祇是金錢。我肩上的徽章，在我獲得時，會給我提高了很大的報酬，但是同時，我得到這一條緞帶，」他指着他的優等飛行十字章，「這勳章並沒有給我一分錢。你告訴他說，我可以放棄我的級位和我的報酬，但是我決不願意放棄這一條緞帶，來換取一百萬美金。」

蘇聯的農場，正像她的工廠一般的爲了這全體性的戰爭而動員了，他們維持國家作戰的能力，實是希特勒最大的隱患，也是全世界奇蹟之一。

一日又一日的，我們飛過那些農場，從塞夫前線一直到中亞細亞西伯利亞繁殖的邊區，因爲蘇聯的耕地，在前綫後方，廣延幾達六千哩。我想祇有在空中才能對廣大的耕地或其無窮的變化，獲得那樣的一個概念。其中有幾處種滿了稻穀，引起了我們的駕駛員開脫上尉思念到塔克薩斯州的蒙



鄉。其他地方如塔什干附近的灌溉的流域，看去好像南加利佛尼亞。

在古比雪夫附近的伏爾加河上，我得到一個機會，比較接近的參觀一些農場。我們乘了一艘精巧的新式小艇，向着伏爾加河上游駛去。從樹叢中望去，河岸兩邊是許多國有住宅的屋頂，那些房屋本來是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遠處的富翁的產業，現在却改爲工人的休息所和療養院了。那些寬大的房屋使我想起到哈得孫河上所見的情形，但伏爾加比哈得孫河更是湍急詭狹——有一次駕駛員誤我掌舵輪，立刻把我們捲入交流之中，我們的小艇很快的被衝向岸上，引起伏爾加船夫們一場大笑。一大排木材，從上游浮着下來，木排上蓋着幾間草房，管理木排的幾家人家，整個夏季都息在上面，從蘇聯北部的森林，慢慢地流到南方的城市，他們在木排上有雞有家畜。

在古比雪夫，有人告訴我說，伏爾加河上正有一個建築大水閘生產電力的計劃；在這次旅行中，我們也到了這個計劃建築的一帶地方。我不是一個容易爲政府龐大事業所眩耀的人，但很顯明的，這一工程完成以後，其所能產生的電力，將比TVA，大落岩（Grand coulee）和美城（Bonneville）等幾處電力的總和還多一倍。我認識了蘇聯的理想和計劃，是在適應他們的廣大的森林和平原。我們離開伏爾加河，曲折駛行，到了一個內地的集體農場。那里本來是一些次等貴族的獵場。大約有八百畝，一起住有五十五家，每家約佔一百四十畝，和印第安那州羅斯城的一般農場相等。

那裏的土地很好——黑色而且肥沃——但雨量不多，每年祇有十三吋模樣。而印第安那却有四十吋。稻田是不用施肥的，而且完全用機器耕種，大部分是種麥和裸麥，此外則有少數其他穀物。麥子每季每畝平均產量為十五布塞半（Bushel 一布塞可容八加倫——譯者註），裸麥產量較少，我想在那種環境下生長的裸麥，一定非常優良。密克、考利斯和我爲了要知道每畝的產量，便要了一些統計的數字，包括從百傾至數畝的面積，以及從坡特（Poot）至布塞的容量的拆算。我們終於放棄了以每布塞和美金若干的比較，因爲他們所給我們的數字都以盧布爲單位，而我們發覺盧布的價值，在各市場隨時有着變動。因此我們評量穀物的質，這方法對於我們似乎較爲方便。

五十五家，每家許可有一頭牛。各種混合種都有，一起在住宅附近的公地上食草。但集體農場的本身有八百頭牲畜，其中二百五十頭是牛，都畜養的很好。牲畜的小屋用磚砌成，相當寬大；地下很堅實，支柱也很新式。小牛另圈在清潔的屋內，管理那些牲畜的婦人對我解釋他們如何以仔細照顧和養育的方法來改善牲種，所用的方法非常合於科學而且新式。

我看見祇有一個壯年男子在農場上，他是經理。大多數工作的都是婦女和兒童，年老的很少。因爲蘇聯的農場是巨大的貯藏所，從那裏紅軍得到不絕的補充，紅軍的妻子和孩子，正在供養着國家。

經理是農場的沙皇。他有着科學的農業訓練，生動而有決斷。他計劃播種穀類，指導工作。在那地方的每一個男子，婦女和孩子都要聽他的命令。

他則負責完成計劃和戰時經濟中農業部分的生產。假使他獲得了成功，他的權力和地位隨之增高，假使他失敗，便要受到處罰。

我對於那農場的經濟情形，覺得非常好奇，因此問了許多問題。他們告訴我說每一人在農場的辦公室里有着精細的記錄。單位是一個「工作日」，但特殊的技能另有記載，所以，例如一個牽引車的司機，他一日中能耕種當數目的田畝，因此算他兩個「工作日」。綑扎相當數目的農產品，再看守相當數目的牛，同樣可以算作一個額外的「工作日」。

這一個農場像其他許多的蘇聯農場一般，向國有機務場所租用牽引車和機器設備，等到收成時付租，不付盧布而付實物，農場必須納稅，這算是付給政府的租用金，但也是實物。每一次的淨收成，根據記載的「工作日」的多少分配給各人。每一人以他最後分配到的東西，到農場的一家小店鋪裏去交易製成品或賤售。可是政府正加緊逼令集體農莊把穀物直接賣給政府，雖然在理論上他們既已付了租用機器和納稅的實物，他們有自由隨意處置他們的收穫。我覺得許多和我交談過的農民，有着很多的現錢，而無法化用。店鋪裏的貨物很少，而且日益減少，因各工廠為戰爭和紅軍的

需要，幾乎已被吸收殆盡。

我們到農場經理家裏去吃午餐。他三十七歲，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他住在一所小小的石砌的屋子內，很簡單，其景象和美國的一所殷富的農莊差不多。主人帶着笑容和幽默，誠懇地招待。食物豐富，簡單而精美，是經理夫人親自煮的，她勸我進食，正像有好幾次，我在印第安那的農莊裏，主婦們盛懇地向我勸食，「威爾基先生，再吃一點。你簡直沒有吃什麼呵！」自然，伏特加酒是不少的，可是却沒有水。

我緊問着經理和他的婦人，並且問其他的農場工人，爲什麼他倒不像那些我曾一向知道的，置有一些土地的人，時常會感到經濟的窘迫。其中有幾人覺得我問得很奇怪。但是經理的解釋是，他和其餘的人都是脫離奴身份不到百年，他們和他們的祖先都從未置有土地，他們覺得現在的制度是好的。

後來我知道這農場的設備，似乎比一般爲優。但是它的管理和蘇聯其他二十五萬的集體農場一樣，由此，我才知道集體農場如何構成了蘇聯堅強的抗戰的脊樑。

在蘇聯前線後面，有着工廠和農場，他們的總動員方式除了德國以外，恐怕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知道，在工廠和農場後面，有着使動員普遍於全體的機器。

這機器的最有趣，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覺得便是報紙，報紙像其他各部分一樣的受政府的統制。在莫斯科，我們看見男男女女在路上排着長隊購買報紙，這是我畢生中第一次所見，在和我同行的美國新聞出版家加特納，考來斯恐怕也是如此。日報每天出版好幾次，每次的數量達於六位數字，但依然是供不應求。

在蘇聯較小的城鎮，我看見一小羣一小羣的人圍着設置在街頭的玻璃櫃。玻璃櫃中張貼着真理報或消息報，這是蘇聯的兩種最大的報紙。人們要細細閱讀，在寒冷中站着，從人的肩膀上探視。在我們飛到塔什干途中，我們的飛機速度比蘇聯任何商營飛機都快。中亞細亞城中許多年沒有見過美國人了，我們的到臨引起了相當的好奇和注目。我們無意中，帶了些新近的莫斯科報紙，塔什干人尚未看到過。結果，連我們官方的主人也不願照呼我們，自己閱讀新聞去了。

我對於這事覺得很好奇，到處總是詢問。蘇聯的報紙，我相信是受政府操縱，為短期目的底最有力最而簡單的機構，正像我所相信的他們的學校是為長時期推動底機構。蘇聯現在的政府，統制新聞和學校已有二十五年，有些外國人私相議論它的是非，但對於這種業已獲有相當時期人民的擁戴和犧牲的政府力量，却仍表示輕視。

一天晚上，在莫斯科，我得到一個機會，從事調查蘇聯報紙上的思想和情緒。在莫斯科的美國報人，都是很精緻能幹的報導者。「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卡爾和辛度斯，「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斯篤，「紐約時報」的派格，合衆社的謝比洛，美聯社的吉爾摩和卡西第，國家廣播公司的瑪吉獨夫，哥倫比亞廣播組織的萊修，「時與潮」的格萊勃納——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可能除了倫敦，有着那樣一羣生動，誠實和刻苦耐勞的外國通訊員和記者，一個夜晚他們有幾人邀請了一羣蘇聯新聞界人士在一間大房間裏預備了酒菜，有翻譯的人，沒有政府官員，容許我隨意發問，一點沒有拘束。

他們是非常有趣味的一羣。其中有愛倫堡，蘇聯的報告文學家和小說家，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住在法國的，我想他知道西歐的情形一定不會差於任何外國記者。其中還有伏脫克羅夫，一個年青的報告文藝家和戲劇作家，他寫保衛塞佛斯太波爾的故事，一直到淪陷前一分鐘才乘了潛水艇逃出。其中，還有干納，一個年青的蘇聯記者，西木諾夫也在，一個面容倔強的青年，穿着俄國式的衣衫和皮靴。那天他剛從斯大林格勒來。他是「蘇聯的人民」劇本的作者。他也許可說是蘇聯現在最出風頭的記者。還有伊涅的夫將軍，六十歲年紀，身格很優美，一九一七年革命前，他曾在外國做過陸軍武官，現在他是紅軍的日報紅星報的第一位評論家。

我們吃鱸魚，飲熱茶，暢談了大半夜。談話有來有去。他們責問我關於歐洲第二戰場，關於赫斯的情形，關於蘇聯需要美國物資和配備。他們知道的很清楚，也很熱心好奇，而且精敏，但並不會有敵對的意思。後來有人告訴我，蘇聯的新聞記者和一個訪問的外國人，作着那樣坦白的談話，二十年來這是第一次。

那天晚上到的職業作家，沒有一個破壞我們彼此交換意見的信任。自然我也決不會加以破壞。我相信，假使我在生命中有一次把新聞記者告訴我事報告一些，他們也不致於誤會我的。

有兩件事情應該報告的。第一，我祇能名之為一種難於調解的特性。那些人確是不易調解。在一種極端主義的制度中，從兒童時代起便開始訓練的一個人，他祇有在黑與白之中思想。

譬如，我問剛從斯大林格勒回來的西木諾夫，在前線俘獲的德國俘虜，是否也像我前幾日在塞夫前線看見的那些德國俘虜一樣的可憐和頹傷。我的問題譯成了俄語。但是沒有回答。旁人接過了這問題去。

我和翻譯員在一起有幾個星期，但是什麼也不得要領。所以我一再重復我的問題，可是一再的沒有回答。這一次我一直等到談話繞了一週到一個停止的時候。我第三次提出這個問題。伊涅的夫將軍，一個嫺雅的，一視同仁的君子，而且那天到場的唯一能說幾句英語的人，最後他回答我說

「威爾基先生，你不會了解。那是很自然的，當這次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都盤問德國俘虜，我們一再的查考他們。我們要找出他們爲什麼要來侵犯我們土地的原由。我們發現了許多關於德國人，以及納粹如何對待他們的有趣的事情。」

「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自從去冬反攻以來，我們迫使德軍後退，收復了許多城鎮和鄉村，我們感覺不同了。我們親眼看見德國人如何對待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家。今日沒有一個蘇聯的新聞記者願意和一個德國人談話，即使在俘虜營中。」

再舉一例。幾日來我曾提議派送他們的大作曲家蕭斯塔可維基到美國訪問，這對於蘇聯也是一個很好的舉動。前一天晚上，我在莫斯科大音樂院柴闊夫斯基堂聽他的第七交響樂，那是一個強硬的樂曲，大部分我都不很喜歡，但開始的樂節却給我從未有的一種感動。

「我們彼此應該了解，」我說，「我們彼此應該學習長處，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是同盟，美國人民不會在打倒希特勒以前拋棄你們的。但是我願意看見我們在結束戰爭的和平會議以後，還是繼續合作。這需要雙方偉大的耐心，偉大的容忍，和偉大的了解。爲什麼不能派蕭斯塔可維基到美國旅行，在美國他有着歡迎的羣衆，那里他可以在工作上無限量地促進我們雙方的了解？」

這次西木諾夫回答了我。



「威爾基先生，了解要相互的。我們已經盡力在了解美國。我們從你們借得了許多東西，並且送了我們最優秀的人才到美國去研究。我們對於你們的國家略有所知，但不如我們所希望知道的那末深切，可是，對於你們爲什麼要邀請蕭斯塔可維基，却非常明白。

「你們應該派送幾個你們的優秀人才來研究我們。然後，也許你們會了解我們對於你們的邀請爲什麼沒有熱烈的反應。你知道我們正從事生死的鬥爭。不祇是爲了我們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爲了形成我們的生活已經一世代的理想，那個理想，今大晚上正懸於斯大林格勒之上衡量輕重。現在向我們提議我們應該派送一個音樂家到美國去，而美國也正在戰爭之中，人民的生活也正懸於衡量輕重之時，以非常明白的音樂來使你們信服，那簡直對我們是一種開玩笑的侮辱。請你不要誤會我。」

我想我沒有誤會他。

那天晚上的第二種特性應該報告的，是一種平靜堅信的自尊心與愛國心。這對於會讀過許多關於俄國可怕的故事的美國人，很難了解在一世代中創造了今日的蘇聯，這一個國家知道她自己的力量。這種情形後來在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給我很大的感動。在美國，尤其在西部，我也時常了解這種特性的。

在莫斯科，我和斯大林會有兩次長時間的談話。談話的大部分我不便隨便報告。但是關於他個人的事情是無須謹慎緘默的。他是這一代的一個重要人物。

我應他的邀請，在一天晚上七時三十分去拜訪他。他的大部分會議顯然都在夜間。他的辦公室是一間大小適宜，十八呎寬，三十五呎長的房間。牆壁上掛着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的相片，以及一幅列寧與斯大林合攝的側面相，這類相片，你可以在蘇聯每一個學校，公共建築，工廠，旅館，醫院，以及人家家裏看見，時常還加有莫洛托夫的相片。從辦公室可以望到的一間內室裏，陳設着一個約有十呎直徑的巨大的地球儀。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站在一隻長形橡木的會議桌的一端迎接我。他們說了幾句簡單的歡迎詞，我們談了約有三個鐘頭——談到戰爭，談到未來，談到斯大林格勒及前線，談到美國的地位，英美蘇的關係，以及許多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題目。

幾天後，斯大林大規模設宴歡迎我，我們在一起有五小時之久；以後在另一個房間裏，同在一張小桌上喝咖啡，最後非公開的放映莫斯科被圍和防衛的電影。

在這次宴席上，我們臨時想到對我們的翻譯人員祝杯。我們互相為彼此國家和領袖祝杯；我們互相為蘇聯人民和美國人民希望將來的合作祝杯；我們彼此相互慶杯。最後我感覺在席上唯一真正

工作的人是翻譯員，他們不停地替我們停譯。因此我揚議應對他們祝杯，後我對斯大林說：「我希望我的提議沒有越軌。」他回答說：「決沒有，威爾基先生，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估量斯大林高約五呎四五吋，形狀顯得有些矮肥。我初看見他那末的矮，確有些驚奇；但是他的頭，他的鬚和他的雙眼都很大。他的臉色在鎮靜的時候，非常冷酷，九月中尤有倦容！據說不是病，而是一種無可如何的疲倦，自然他不會有如此現象。他談話很沉着，有時帶着簡單而生動的口才。當他向我描述蘇聯的燃料，運輸，軍用裝備以及人力等困難的情形時，他真像演戲一般。他有着堅強不屈的前進頭腦。他詢問一些精細的問題，每一個問題像連珠鎗似的射擊，每一個問題須解答至他認為事情的中心為止。他不需要諾諾和恭維！他也不堪相信大概的意見。

他問我關於這一次參觀許多工廠的旅行，他要該細的報告，一部分一部分，並不要對他們實行的方法和效能作一般批評。我問他關於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他津津有味地向我敘述，除了地理上和軍事上的重要性，他還告訴我關於蘇聯，德國，尤其是中蘇各方面防守的成功或失敗在精神上的效果。他對於蘇聯保衛斯大林格勒的實力沒有預言，然而他確信祇有對於祖國之愛或純粹的勇敢決不能挽救斯城。戰爭之勝負最重要的是決定於軍隊的多少，技術的優劣，和物資的充足與否。

他一再的告訴我他的宣傳有意使他的人民憤恨納粹，但是很明顯的希特勒在蘇聯淪陷區內利用

了幾乎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作工人民，那樣的效能，對於斯大林實是一個相當苦痛的驚傷。他贊成德軍的完全職業訓練，尤其是軍官。他不重視希特勒祇是若干有權勢人手中的工具的那樣說法，像兩年前我在英國時邱吉爾向我表示的意見一樣。他並不想我們應該計劃德國內部早日崩潰。他說擊敗德國的方法，乃是擊潰他的軍隊。他相信摧毀在歐陸被征服的國家，對希特勒的信心最有效的方法，即使不斷的轟炸德國城市和在那些被佔領國家內德軍控制的船塢和工廠。

當我們談到戰爭的原因，以及戰爭所將遭逢的政治和經濟的問題時，他的見解很廣博，他的情報很詳細而且精確，他冷靜的思想很清明。斯大林是一個冷酷的人，也許竟是一個殘酷的人，但他確是非常能幹。他很少幻想。

他對於美國生產方法的效能的讚慕，使美國國家製造協會感覺非常滿意。但他不了解民主國家從事戰爭的方法有着相當的限制。例如他奇怪為什麼民主國家不堅持為戰爭的目的利用某些基地，那些基地對於他們確是有着很大的價值，特別是屬於那些既不能合作又不能加以保護的國家的地方。斯大林對邱吉爾表示很大的景仰，這與一般的報導完全相反；一個偉大的實行者，景仰另一個偉大的實行者。

斯大林就他個人而言，是一個生活簡單的人，沒有虛飾或姿態。他並不裝腔作勢。他的幽默感

很健全，他時常對於粗心的謔語和巧對，放聲大笑。有一次我告訴他們關於我所參觀的蘇聯的學校和圖書館——我覺得那些學校和圖書館很好。我又說：「但假使你繼續訓練蘇聯人民，斯大林先生，第一件事你當知道，你將會訓練你自己到無事可做。」

他轉過了頭去大笑特笑。兩個漫長的晚上我對他說的，或是其他人對他說的，沒有像這一次使他開心。

斯大林穿着淺藍色的衣服，我覺得很奇怪。他的著名的外衣是由精緻材料織成，淡綠色，或嬌嫩的淺紅，他的褲子為淺黃褐色或藍色。他的靴子為黑色，擦得光亮。平常社交的娛樂他覺得有些討厭。我第一次和他談話，當告別的時候，對於他給我的時間，和那樣爽直的談話給我的光榮，我表示感謝。

他帶着不安地說：

「威爾基先生，你知道，我是一個左濟亞農民出身的人。我沒有受過漂亮談話的訓練。我所要說的即是我非常歡喜你。」

不可避免的，斯太林的樸實的風氣已成了其他蘇聯領袖們的模範。尤其在莫斯科和古比雪夫，蘇聯的領袖們沒有一點浮華氣象，這一點尤為是顯著。他們都穿得很簡樸。他們都少說多聽。他們

大部分都很年青，約模三十左右，我猜想，但我並不能證實，斯大林似乎喜歡克里姆林中有大批青年在他四週。我想這是他要保持聽取下情的方法。

在其他領袖中，我所遇見而且曾經長時交談的有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及其助理羅本斯基與盧索夫斯基，前國防人民委員會主席伏洛希洛夫元帥，供職人民委員會主席兼蘇維埃對外貿易處主任米高揚，他們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對於國際關係也有興趣，他們的態度外表和談吐，與我們卡通上的野蠻的布爾希維克完全不同。

在古比雪夫，維辛斯基請我吃飯，四五年前，維辛斯基是審判一切可怖的叛國案件的國家檢查官，在席間我研究他的白髮，他的教授的面容，他的鎮靜而學者的風度，竟懷疑他是否曾經剷除過若干俄國革命的先輩因為他們企圖謀害和破壞國家。

無論何時，這些人談到和平，這是戰爭停止後全世界必須處理的問題，他們都非常有政治家的風度，而且有着真正的了解。

我回到美國以後，斯大林先生開明英美蘇在歐戰中合作的計劃。下面是他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取消種族歧視，國際地位平等以及國家領土完整，解放被奴役的國家！並恢復他們的國家主權，各國有權隨意處理其本國的事務，以經濟援助遭難的國家，並以物質接濟他們，恢復民主的自

由，撲滅希特勒的統治。一

我們問：斯大林所說的是否即是他的真意？有人將指出不過兩年以前，蘇聯邊和德國訂立了利害得失的同盟條約。我並不爲利害得失辯護，軍事的，政治的，暫時的或其他。因爲我相信利害得失的精神上的損失，此暫時的一些收護大得多。並且我相信爲利害得失而積蓄的每一滴血，將會二十倍的損失於侵犯者的刀下。但是一個俄國人覺得和德國的同盟是在爭取時間，他也許清楚地記着慕尼黑的民主國家以及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美國以七百萬噸的上等廢鐵運往日本的事實。

斯大林爲了保衛祖國而犧牲的成百萬人民，以及淪爲納粹奴隸的六千萬人民，爲了其他成百萬的蘇聯男子和婦女在工廠和礦中每週工作六十六小時，努力生產作戰工具供給前線；以及爲了遷運巨大的工廠的努力，在千百哩外納粹所不能到達的地方繼續不斷工作，爲了這些，斯太林的言辭，我們是可衡量他是出於善意。因爲這是出之於人民的態度，我們覺得這是斯太林的目的底最好的解釋。

民主國家中許多國家懼怕蘇聯，並且不信任她。他們怕蘇聯的經濟制度會侵入而破壞了他們自己的秩序。這一種恐怖是太懦弱了。蘇聯不會吞嚥我們，也不會引壞我們。那是我們應該考慮的——除非我們的民主組織，和我們的自由經濟成爲懦弱無能，受不起攻擊。對付共產主義最好的表

示是一個有生氣，勇敢而無畏懼的民主政治——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面。我們需要做的是遵照我們闡明的理想，挺起胸膛，努力幹去。然後那些理想可保安全。

我們無須懼怕蘇聯。我們須要和她一起學習工作，以對付我們共同的敵人希特勒，戰後我們也需要和她一起學習工作。因為蘇聯是一個動力學的國家，一個鉅大新進的社會，一種在將來世界上不可忽視的力量。



## 第五章 雅庫次克共和國

蘇維埃聯邦所轄的土地很廣，比美國加拿大和中美的總和還大。蘇聯的民族混合着許多不同的種族和國籍，而且講着各種語言。

在一個西伯利亞的共和國叫雅庫次克境內，我發現了若干美國人關於蘇聯的問題的答案。

我在雅庫次克看見的許多事情，不能用以適用蘇聯全部。例如邊疆的情形，嚴寒的氣候隨意可佔領的無限的新土地，以及在整個民族的一種開導的精神等特點在蘇聯其他部分是沒有的。然而，雖然有這些異點，雅庫次克——她過往的歷史，以及我所看見的現在——告訴了我關於蘇聯革命的新的資料。

雅庫次克是一個廣大的國家，比阿拉斯加大出兩倍，人口不多，現在祇有四十萬，但其資源足夠供給更多的人口。蘇維埃組織已在境內發展，我看見他們的努力，其對於世界和美國的重要性，實比許多年來在莫斯科和紐約不絕的政治爭論大得不知多少倍。

第一，先來考查雅庫次克過往的歷史。雅庫人原來是成吉思汗向西發展時遷到北部的一批蒙古人。

他們依然保持着高高頰骨，傾斜的眼睛以及黑色的頭髮。他們大多數人從事設阱捕獸和掘土淘

金的工作。他們住在低矮的屋頂，懸土的基地的茅屋中，煙氣瀰漫，與家畜同居，實在是培養肺病細菌的場所。冬天他們吃收藏的魚乾和草根；疾病和不時的飢餓，使曾經一代堅強的民族，死亡了大部分。在沙皇的時代，雅庫次克是出名盛行梅毒和肺病以及出產毛皮的地方。

俄羅斯人漸漸移到這個國家來，但直至最近為數依然很少。聖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勒）的政府，會把囚犯和政治犯送到雅庫次克。普希金即流放到那里。許多作家曾經在那里忍耐着堅苦的生活，釋放以後他們寫過不少關於那里的文章。所以大家知道雅庫次克是「人民的監獄。」

「當我們在那里時，我偶然發現侍奉我們的女侍中，有好幾個是今日的蘇聯放逐的囚犯。一個波蘭婦人說蘇維埃制度和官方宣傳完全不符。

當我們的「解放」式號轟炸機在雅庫次克京城降落時，第一次的九月的雪，已掩蓋了飛機場。我們在西伯利亞北部一直展到北極圈內的森林地帶上空飛行了好幾小時。從上空下望，那地帶十分嚴寒和空曠，路線很少，接連的雪和樹木。一個人離開了站在我們的飛機所降落的場地旁近的一小羣人，上前來對我說：

「我名叫英拉托夫，我是雅庫次克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我接到了莫斯科，接到了斯大林同志的訓令，當你光臨此間時，來招待你，並引導你所要參觀的以及答覆你所要詢問的，歡迎你」。

他的話很簡單，但很週到。在飛機場上站着的約模有一打多人，但是他却帶着一副左右列着樂隊和儀仗隊的神氣來歡迎一個外國的訪問者。

我對他道謝，並且說明我祇打算稍稍停留一會，因為那天時間尚早，我們還可以飛行一千哩。

「你們今天不要飛了，威爾基先生，」他回答說：「明天大概還不行。氣象報告不很好，而且

我接到訓令，要我保證你們平安地到達第二站，否則我將受處罰。」

我們乘了一輛沉重的黑色的蘇聯製造的汽車，約行五哩許，到達雅庫次克城中，在途中，莫拉托夫開始和我談起如何參觀他的共和國的程序。這事情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念念不忘的談着。他的熱誠沒有一點狡猾。

「你希望在雅庫次克看些什麼，威爾基先生？」當我們進城的時候，他問我說。

「你們有圖書館麼？」

我們直接駛到圖書館，莫拉托夫讓我們一直走進閱覽室，不必停留解脫衣帽。但我們在門口，被一個態度溫順，身材小巧而有學者風度的婦人攔住了，莫拉托夫的明顯的長官氣派使她毫不感覺羞赧。她很有禮貌地，然而很肯定地說：「我們這裏不祇要教人們有讀書的習慣而且要有良好的態度的習慣。請到樓下去把你們的外衣和帽子寄在存衣室裏。」莫拉托夫有些震怒，開始表明，終於妥善地讓步，把我們的外衣和帽子留在那位婦人的辦公室裏。我幾乎大笑起來。這是在蘇聯的第一次，而且是僅有的一次，我看見一個重要的蘇聯長官碰了釘子。

雅庫次克，五萬人口的一個城市，有着五十五萬冊書籍陳列在老式的，但光線充足的房屋中，編排得非常整潔。書架是木製的，送書籍到閱覽室的機器，好像是原始的鄉村的吊井。但閱覽室中坐

滿了人。書目分類卡片都十分新式而且完備。統計記載過去九個月中閱讀書籍的超過十萬人——其中許多是從附近鄉村來的。牆壁上掛着特別的告白。蘇聯定期刊物和參考書籍，陳列在公開的書架上。到處充滿了效率很大的氣象。像這樣大小的城市有如此一個圖書館，確是值得誇耀的。

我們的旅館——雅庫次克唯一的旅館——是一所新的建築，用木材建造，每間房內有一個俄國式的火爐。旅館里住滿了穿着皮製外衣，和馴鹿皮製的靴子的剛強的男客，女子的面頰紅紅的，用手帕扎着頭。他們看着我們很感興趣，一會兒轉過頭去大笑，我們是外國人。

這城市好些地方。像一世代以前的俄國西部的城市。事實上，這個地方的生活，使我回憶到我們美國早期的開拓時期——尤其是熱誠簡樸的性格，不太機敏的頭腦，以及異常雄厚的活力。街道兩旁的人行道，特別寬闊，記得和我童年時在愛爾伍特所見的一樣。房屋像北部城市的家庭，門口遮蔽着，從窗孔中透進光線，煙囪中冒着輕輕的煙。

有許多事情使我們回憶，然而這是西伯利亞，不是明尼蘇達或威斯康辛。那些房屋大部分是用木材造的，用毛氈分隔，正面像所有西伯利亞房屋那樣雜亂地有着捲狀的裝飾。

食物是西伯利亞式的——早餐，桌上放着一隻完整的烤豬，此外有臘腸，雞蛋，乳酪，湯鷄，小牛肉，蕃茄和泡菜筍，酒，伏特加非常濃厚，即使俄國人也愛滲水才飲。每一頓給我們準備的：

總是那麼富盛。早餐有伏特加，整天有蒸氣煮的茶。那里是一個嚴寒的國家，不管在我們旅館外邊的雅庫次克人吃是什麼，總之吃得很多。

我不知道那里的人民的娛樂。

「你們這里有戲院麼？」我問莫拉托夫。

他回答有，於是我們晚上到戲院裏去參觀。他告訴我九點鐘開演。晚飯後我們喝了伏特加而且談話，我忽然發覺已經過了九點。

「你說幾點鐘開始？」我問他。

「威爾基先生，」他回答說，「我什麼時候到那里，什麼時候開始。」

果然如此。這一次沒有人給他碰釘子。約半小時後，我們到了戲院，在包廂中坐了下來，幕開始升起，我們看的是一齣吉卜賽歌劇，是由一個列寧格勒旅行歌劇團演出的。其中的舞踊很精彩，表演很好，唱得也不錯。雖然戲院並未客滿，觀眾贊美的聲音非常嘈雜，這歌劇在這里連續演出，這是第九次了。

那晚上戰爭遠離了那些青年的觀眾，共產主義的理想也遠離了我們。愛情，妒忌，與吉卜賽的舞踊，充滿舞台，幕與幕間休息的時候，年青的男子挽着愛人的手臂，繞着戲院散步，俄國的觀眾

時常這樣的。

但是第二天凌晨，在曙光朦朧之中，我們踏着新降的雪去參觀縣立博物館。在那里，我們看見戰爭的生動的紀念品。壁上掛的圖表，表示學校，醫院，牲畜，零售商數目的增加，至一九四一年六月都停止了，似乎國家的生命在那時候都停止了。他們回答我的問題，最後總是說，假使德國人沒有使我們精神上各方面的進步，暫時停頓，我們一定已完成了許多。

莫拉托夫在博物館，指給我看真金的樣品，金子是雅庫次克最大的財富，其次珍貴的出產即是「軟金」——皮毛。除了貂皮，狐皮，和熊皮外，尚有柔軟的小兔皮和白松鼠皮。他說這些較小的動物，必須射中牠們的眼，才不傷毀皮毛。我對於捕捉松鼠必須射中它眼睛的職業，對於那樣的經濟生活，確是有些懷疑，可是莫拉托夫堅持他的說法。他說所有被徵到紅軍中去服役的雅庫次克獵人，都自願擔任阻擊兵的職務。

在白天我們也留心戰爭。雖然雅庫次克離開前線有三千哩，我們看到那些簡樸的人民，大部分一生未曾見過德國人，或旅行到過烏拉山以西，可是他們都十分熱心的在談論「為祖國的戰爭。」我問莫拉托夫，他如何處理關於人民的教育。

「威爾基先生，」他說，「回答是很簡單。一九一七年前，雅庫次克的全國人民，祇有百分之

二是識字的；百分之九十八不能閱讀或書寫。而現在這個百分比恰恰反了過來。」

「而且，」他繼續說，帶着欣喜的笑容，「我現在已接到了莫斯科的命令，在明年年終以前，把這百分之二的文盲也要一起剷除。」

又用了「剷除」這個名詞。在蘇聯時常用到這個名詞。可用於某種指定工作的實行（工作的本身即是被剷除），或可用於因無能而失敗、或破壞怠工而受的監禁，流放，或死刑。我記得朋納森會從真理報上念給我聽的一件事，一個集體農場的經理，因為在他的農場里死了一頭牛，他被判處罰二十年的徒刑。他沒有剷除肇事的原因，因此他自己受了剷除的處分，政府要其他農場的經理有所儆戒。

莫拉托夫得意地領我們去參觀雅庫次克最新式的電影院。那是一所鋼骨水泥的建築，由此他推翻了一向以為在永凍凍結的地基上祇能建造木屋的成見。

城里最引人注意的建築是當地共產黨黨部的房屋。我時常不解，事實上祇有三百萬共產黨員——那是蘇聯全部黨員的數目，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五——如何能推行他們的理想，統治兩萬萬人民。在雅庫次克我開始明白了其中的方法。

在這城中，沒有其他有組織的團體，沒有教堂，沒有集會，沒有其他黨派。最多不過七百五十

人，佔雅庫次克五萬人口中百分之一。五是共產黨員，而且也是城中唯一俱樂部會員。這七百五十人中，包括全部的工廠廠長，集體農場經理，政府官員，大部分的醫生，學校監督，文化工作者，作家，圖書館職員，以及教員等。換言之，在雅庫次克和在蘇聯其他城市一樣，當地受有最高教育的，最活動，最聰慧，最能幹的人，即是共產黨員。全蘇聯每一個共產黨的俱樂部，是全國總部的一部分。總部的書記長仍舊是斯大林。我們可以知道爲什麼他喜歡這個名義，甚於他其他名義。因爲這個組織，幫助黨的執政。它的會員都是既得權利的一羣。這便是問題的答覆。

美國人不喜歡一黨制度。但是我在雅庫次克發現了蘇聯最大的成就的明證，而美國人也必贊美不止的：即是對於少數民族問題的處置。

城里的居民，大部分仍是雅庫人。他們佔共和國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據我所見，他們同俄羅斯人一樣的生活；他們在政府中佔有高級地位；他們自己寫詩，他們有着他們自己的戲院。莫斯科任命的官員如莫拉托夫時常是俄羅斯人。他們告訴我，選舉的官員，時常是由雅庫人擔任的。學校里教授兩種文字。沿街張貼的關於戰爭的廣告，俄文和雅庫文同時標着。

這一種情形維持多久，難於預測。無疑的，這個共和國的一部份力量，是因爲他幅員廣大的關係，還有許多地方未曾繪入地圖，莫拉托夫告訴我，那里約有十萬個不同的湖沼和河，於過去幾



年內發現後才定名的。我想像我們在雅庫次克上空飛行了兩天的空曠的土地，假使是在歐洲，倒可以解決許多嫉妒和窘迫的爭執。

在這個蘇聯的西伯利亞的前哨中，有這件事我比莫拉托夫本人感到更大的興趣。雅庫次克城替我解答了許多問題，而莫拉托夫更給了我解答其他問題的鎖鑰。因為他是一個治理蘇聯的十足新式的人，他有許多特性和事業很像我會看見過的許多美國人。

他生得矮胖，有着一張圓圓的帶着微笑的臉，鬍鬚括得很光，生於伏爾加河上的薩拉多夫城，父親是一個農民。幼時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家機器店里當學徒，後來被選送入學校，受專門訓練，因為他很聰明，半工半讀的讀完了小學，讀完了大學，說完了莫斯科社會科學著名的紅色教授研究所，兩年以前他方被派到這裏，在這個靠近北極圈的雅庫次克共和國中擔任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他現在是三十七歲，他的教育完全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受的，他治理的共和國比蘇聯其他的共和國都大，比法蘭西大五倍有餘。在兩天之內，我對他觀察得很精細。假使他在美國也認做得很好；在他自己的國裏自然做得更好。

他做事的方法，像流行於全西伯利亞的蘇維埃的方法一樣，相當的粗豪，剛強，時常很殘忍，有時竟然錯誤。他的解釋是一但是這得到了結果。一當我緊問着他關於雅庫次克的經濟發展的情況

時，他說起來像一個加利佛尼亞的不動產的兜售商。這又使我想起了這個國家在本世紀初年，大規模開發的粗暴的情形，而那時我們自己的領袖們，却已完成了重要的事業。

「想什麼？威爾基先生。我們在一九二二年當內戰完全獲得勝利之時，建設了這雅庫次克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那時，斯太林是數民族委員會的主席。從那時起，我們增加了共和國的預算至八倍之多，在這裏住的人都很明白的。」

「可是，為什麼雅庫次克在地圖上時常僅僅是一個白點。本月裏我們的金礦在全俄的非鐵礦產中，佔到第三位。而且還計劃趕上去。」接着他給我看數字。

他的電力廠在全蘇聯的市辦廠中已佔首位黨部獎了一面紅旗，因為他們的生產成本減低到了每呎瓦小時六·二七科貝克（Kopeck）。

「我們在二十年中在雅庫次克投資了十萬萬以上的盧布，」他說，「今年我們砍伐將近四百萬方米的木材，而一九一一年祇有三萬五千方米。但是照我們的計算，每年約有八千萬方米的生產，我們的工作還差得很遠。」

而且他的計劃顧到日後的國際貿易。

「這一次戰爭結束以後，你們美國一定需要木材和木髓。而我們則需要機器，各種機器。我們

距離你們並不遠，祇要我們開闢了北冰洋的通路即可。歡迎你們來，我們很願意和你們交換的。」

我親眼看見，他的話並不全屬於兜售商的派頭。雅庫次克離鐵路約有一千哩。今年他們即將完成一條硬面的四季可用的公路，接連橫貫西伯利亞的鐵道，一直通到莫斯科。到現在為止，他們和外界的交通祇靠航空和利那河。在夏季，利那河可通解船和汽艇，從北冰洋貨船停泊的鐵克西灣，可一直上駛至雅庫次克。到冬天，利那河凍結成爲全共和國最給實的道路。

金子和毛皮是珍貴的貨物；他們的運輸自有歷史以來，即無路線可循，但現在蘇維埃政察隊在雅庫次克又發現了其他的財富：銀，鐵，銅，鉛。油礦也發現了，惟有關軍事祕密，詳情不知。但莫拉托夫告訴我，一九四三年年終以前，他們即可供給商用，至於魚，木材，和鹽他們有着無限發開發的資源。象牙工業也有相當的規模，奇怪的是他們所用的象牙，是史前曾在那一帶地方生殖的古象的牙，在北極的冷藏庫中竟保存到了現在。

即使農業，雅庫次克也有相當的發展。在博物館中，他們指給我看混合種的小麥樣品，俄國人即拿這種小麥一直向北推廣他們的種植地帶。生長的季节很短，但土地下層水量很富，整天有陽光，如在夏季幾乎整夜也有陽光。農場的大部分——在九月中有百分之九十七——已經集體化了。馴鹿仍是那共和國的動力，但現在他們已經從機器牽引車站租來了幾百輛牽引車。共和國有着二百六

十輛——請想一想，威爾基先生，在北極圈內有着二百六十輛牽引車——以及數目雖小，但繼續增大的一羣專家決心在那裏工作，要使凍結的苔地上，開放出北極之花以及生產穀物。

這些人那樣的熱心和自信，使我一再的回憶到我們自己開發西部的故事。我離開了雅庫次克，懷着一種好奇，不知十年以後，那地方將成怎樣情形。

我回國以後，我發現一般人對於蘇聯有着同樣的好奇，對蘇聯都帶着一種欽慕和恐懼的混雜。俄國將有什麼舉動？是否將做一個和平的新的破壞者？她在戰爭結束時是否將提出要求，以致無法在和平中重建歐洲？她是否打算以她的經濟和社會的哲學侵入其他的國家？

坦白說：我不相信有人能知道這些問題的答覆，我懷疑即使是斯大林先生，恐也不能全部知道。所以假使我說蘇聯將要做什麼，這是非常可笑的。可是我確是知道：蘇聯有着二萬萬人口，他們以一個政府統治世界上最大的整個土地上的人民，他們有着幾乎用不盡的木材，鐵，煤，煤油，那些富藏，事實上都未曾開發；他們有着良好的醫療制度，和公共衛生的組織，俄國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民族之一，生活在有生氣有刺激的土地之上；在過往的二十五年內因廣泛推行劇烈的教育制度的結果，使很大數目的人民認識了字，成萬的人民獲得了專門技術的訓練，從最高層的官員，下

至最不重要的農民，或工廠中的工人，所有的俄國人都瘋狂地忠於俄羅斯，並且都沉溺於將來開發的理想中。

我不能回答關於蘇聯的一切問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的：即是那樣的一個力量，那樣的一個權力，那樣的一個民族決不能葬於忽視的。我們不能像主婦到百貨店裏一般的去選擇陳列着的食品，檢了這樣，棄了那樣。事實很明顯：對於這事情，我們沒有什麼選擇。蘇聯和我們不能分開，這便是我爲什麼時常告訴我的美國同胞的理由：當我們爲了擊敗共同的敵人的目的，聯合在一起，我們應該和蘇聯永遠保持密切的合作。我們盡力去學他們，讓他們也學我們。

還有一件事我所知道的：從商業的觀點說，美國和蘇聯在地理上有許多地方相似，我們應該攜手同行。蘇聯的工業化，需要無限量美國的帮助，而蘇聯却有着我們所需要的無限量的資源，俄國人和我們一樣的是堅忍直爽的人民，他們欽慕美國的一切，除了資本主義制度。坦白地說，蘇聯也有着許多東西值得我們欽慕——她的生氣，她的理想，她的力量；她的堅強的意志。沒有人比我更反對共產主義的理論，因爲我是完全不贊同任何至於極端的制度的。但是我永不解，爲什麼一定要肯定的說：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間有了任何可能的接觸，民主主義即會失敗。

所以我願意重述一遍：我相信蘇聯和美國，也許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爲了經濟繁榮和世界和

平而合作是很可能的。至少應該知道，如果和這個國家不能合作，世界上不會有持久的和平，與經濟的穩定。除此以外，我不相信有其他可能。同時我對於我們自由經濟和政治的組織的基本正直性十分信任，他們將會使這一種共同工作的生命延長。

## 第六章 中國已打了五年

假使我們要在這一次戰爭中，獲得真正的勝利，對於遠東人民，我們必須有一清楚的了解。在我們直接參加戰爭的第一年中，大部分美國人已漸漸認識遠東的戰爭，並不是歐洲戰爭的一部分。但是，假使我們要避免將來戰爭，我們必須知道，在這廣大的世界上那一些力量是在活動着。我們須要知道那些對我們友好的國家，同時，我們須要誠實地報答他們，我們對於世界，不能有任何傳統的偏見。

因為我們和遠東的新的聯繫，使我決定到中國去。在華盛頓第一次討論行程後，因為要遵照總統的意思，不去印度。所以到中國的路程發生了極大的困難。但是在我們離開紐約之前，這些困難都解決了。

在我離開華盛頓前數日，和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同進午餐。他很公開而坦白地對我說明他們國家在財政上和軍事上的困難，他希望聯合國有一個真正聯合的戰略。他想祇要有這樣一個戰略，便能幫助中國，並且可以使民主國家巨大的潛力，像希特勒和東條一般有效地推行他們的計劃。

我同意他的意見，但是我到中國旅行以及以後累次想制定一真正的聯合戰略，使中國和蘇聯與

英美成爲完全和明顯的同盟的嘗試，都未曾給予這種意見任何實際的保證。我們許多領袖的趨勢，將戰爭分爲一等的戰爭，和二等的戰爭，這一種見解使我非常驚奇。我到中國的旅行，在我自己的心中，自然毫無此種意思。我們和亞洲的中國合作獲得的勝利，其意義與我們和英蘇，以及歐洲被佔領國家合作所獲得的勝利一樣，否則我們不會真正獲得勝利。

我知道，有許多人相信，控制將來的方法，大部須靠英美的統治。他們希望當德國消耗至有機可乘時，英美即進攻西歐，並且合力佔領中東，這樣，他們想，我們佔領了西歐，招羅被佔領區各民族，可以對消蘇聯的進展和將來的統治。消滅了希特勒以後，他們想，英美再以聯合力量，加上中國的幫助，然後去擊敗日本，他們以爲戰後的中國，是一個友善相處，完整而軟弱無能的國家，西歐的列強爲了東方的利益，根據似乎爲了將來的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方法世襲地代爲指導亞洲的武力。他們想英美在東方和西方，應以保證人的資格，控制全世界有戰略性的軍事和商業據點；而以最優秀的英美的實力爲擔保。這樣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的價值可以流行，和平可以恢復，經濟的安全可以獲得，整個世界可以歸附在我們民主主義的開明的標準之下。

這是一種殘害的論調。說起來很好聽——假使你不知道羅斯福總統——不是邱吉爾首相——把大西洋憲章推及適用於太平洋諸民族的偉大的言論，假使你不知道，我們正在向世界闡明四種自由



；假使你忘記了二十萬萬人民的思想。

多少年來，我們不知道日本的真正的野心和力量，以及牠日漸增長的，要把東方歸附於太陽旗下的慾望。我們把日本人估計得太低，結果我們忽視了她在東方發展的勢力。我們含糊地知道日本人要建設一個帝國，我們現在才開始認識日本的帝國，假使一旦建設了起來將有多大。

日本的夢想終於在我們眼前實現了，我們看見日本人征服了他們所計劃的帝國的一大部分。除了朝鮮和滿洲，他們控制了中國整個的海岸。他們佔領了菲列賓的大部分。他們實際上已征服了東印度。他們已取得了緬甸的一半，而且截斷了滇緬路。他們控制了至少印度洋的東半部，而且在敲擊加爾各答的門戶。

他們發展得那末快，使我不能想像，假使他們成功，世界將成怎樣一個局面。假設印度淪於敵手。假設中國斷絕一切援助，必至窒息而被征服，我不相信這些事情會發生，但否認其可能性，實蹈過去悲慘的錯誤的覆轍。

假使這一切都將實現，我們可以證實這個創造，不祇是一個大帝國也許是歷史上最大的帝國；包括十萬萬人口佔全球人口的一半，生活在二千五百萬方哩的土地之上；佔全球土地的三分之一。這便是日本人的夢想。

而且，這個帝國內，幾乎包括着各種資源，不論平時或戰時，都足以自給。日本可從非列賓的鐵，從非列賓和緬甸取銅，從馬來亞取錫，從南洋各島取得煤油，其他如鎳，鈾，鈾，鋁礬以及用不盡的橡皮。這樣美國不再能稱為富饒之國，而要讓位於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了。

我對於美國人的勇氣，大胆和命運有着無限的信心。但我相信假使美國人此後被迫與那一個廣大的帝國面相對而處，我們生活的方式將與軍營相似，所謂自由不過是希望而已。生活在不絕的恐怖和無止境的戰爭之中，處於被壓服的軍備之下，時常要掙扎，以圖加強，沒有和平，沒有繁榮，沒有自由，沒有正義，在這種生存的奮鬥之中可以滋生繁盛。而太平洋的如何寬闊或如何狹窄，也將不成其為問題了。

我相信我們正在努力避免那種災禍的到臨。我相信我們在這不太為晚的時候，正一再以痛擊來避免災禍的發生。但是祇有痛擊，尚不足夠。我們對於東方的遭遇，關於東方的人民，關於他們思想的改變，關於他們對於西方帝國主義和白種人的優越性失去信心，以及他們按照他們理想的標準要求自由的希望等，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瞭解。我們都說這是一個「解放人類思想的戰爭」，一個政治性的戰爭。但是在北非和東方，我們實行的，實在祇是一種舊式的強權政治，純粹的軍事行動，祇是一種利害得失與明顯的實用主義。我們忘記了爲了什麼而戰，而且也太易於放棄我們的理想。

我們也沒有充分的感覺到，假使沒有中國人民五年來艱難的抗戰，現在想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擊潰日本的超等帝國，也許爲時已晚了。

要美國人回憶過去的五年，是不會特別感覺興味的，在那五年之中，很少人認識中國的抗戰對於我們整個文化的重要性。我在中國時和那些領導抗戰的人物談話，我想起來也不是一件特別有興趣的事。而當我們全神灌注於劇烈的爭論和孤立主義的幻想時，我們決沒有時間去了解中國人民所表現的英勇的事蹟。祇給他們一些物質的援助。現在我們在這次大戰中要補救這個錯誤。我們必須加以補救。

中國人對於將來的看法和日本人相反。他們不需要帝國。他們所需要的祇是保持並發展他們自己的廣大可愛的國土。他們願意看到在東方正在掙扎的新的力量，這一種新的力量是用以爭取他們自己的自由，並幫助其他的民族爭取自由。而日本人却要利用這些力量來達到他們帝國主義的目的。

中國的面積和人口都大於美國。國境以內有着許多豐富的資源。在另一方面說，她卻不是以自給——其實我們也不是自給。但這個事實並未妨害中國人民，也未曾使他們想征服世界，和對於我們的情形一樣。自是是集權國家的一個幻想。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的世界中，一個國家不需要自足；

最多不過像紐約州脫離賓雪文尼亞州獨立那樣罷了。

我們不必希望中國人對於個人自由，和民主政府的理想，和我們的完全一樣。他們有些理想，我們看起來也許感覺太激烈，有些我們覺得陳舊得可笑。我們應該記得，在他們眼中我們有些習慣也很可笑或甚至可厭惡。我們必須注意到重要的事實，即是中國要求自由——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爲了他們自己人民的利益和快樂，自由治理他們的生活。他們需要一個自由的亞洲。

中美，中英最近簽訂的關於取消治外法權的條約，即是承認中國爭取自由的決心的一個步驟。在中國的英美人民，此後不再能特別免於中國法律和法庭的管轄，但是決不能認爲這些條約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例如英國人依然保留着香港，香港是中國人和國外通商所必需的大商埠之一。雖然香港正像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要求一樣，對於中國不過是一個外國人的利權和特權的標記，但對於走向真正自由之路，仍舊是一種障礙。

很不幸，依然有許多美國人仍以爲中國是若干巨大的惰性的羣衆，而不視爲一整個民族，仍以爲犧牲了五百萬中國人，和犧牲了五百萬西方人不同。也許世界上今日最重要的事情即是東方覺醒的奮鬥。即使在軍事上我們獲得了勝利，這一種覺醒仍舊須要計算在內的。假使我們聰明，我們可以指導那些東方的爲了和平與經濟的安全努力向着世界合作的力量。假使忽視不問，這種力量將會被敵人利用而繼續擾亂世界。

## 第七章 中國西部的開發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不是由通常所稱的「通商口岸」，而是由後門中國西北廣大腹地而入，這是我所引為欣慰的。太平洋沿岸的「通商口岸」——現在都是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對於幾世代來的現代中國人民，是一種創傷的標記，西方國家總以為中國是一個廣大而原始的國家，須要改善，開發或引以為笑料。上海，香港和廣州也許是美麗的港埠；但是對於中國人民，那幾個地名有着苦痛的回憶。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可是我在中國第一個停留的地方是迪化，新疆的省會，或稱中國東方土耳其斯坦，俄國人稱為Urunchi。我們的「解放」式機從西伯利亞的塔什干起飛，祇一日路程，其中大部分是沿着世界最高的山脈，天山和阿爾泰山中間的伊犁河流域下飛。我們在空曠的沙漠上空飛行了好幾個鐘頭，景色的奇麗，會所未見，然後我們飛到產葡萄產瓜的肥沃地帶，那裏即是中國人所稱的新疆。

新疆的面積比法蘭西大兩倍，人口約五百萬弱。是中國最大的一省，蘊藏也許也是最富的一省。不祇在地理上是亞洲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的中心，因為這裏是中國和蘇聯接壤的地方。這個奇怪的土地上所遭遇的長時期的爭執，許多美國人所從未聽到過的，在我們的歷史上是有着重大的

影響。

在過去的一世代中，外國人在那里的很少；我在迪化時，我的中國主人估計，自從一年前中國和莫斯科間的中蘇商營航線開闢以來，美國旅客或英國旅客，經過新疆的不過幾十人，就是這有限的若干人，大都也是去參觀哈密。這是一個比迪化更小的城市，但有着較佳的飛機場。

迪化本身實無可稱道。是一個小小的，睡眠樣的，而且是異常泥濘的城市。街道的標記用俄文，政府是中國的，人民為突厥族，中國境內二千萬回教徒，有一部即在迪化居住。可以自傲的是亞洲的最佳美的瓜，以及普通的小而無子的葡萄。城外四週的山中，寶藏着各種金屬礦產。全省的農田全靠灌溉，現在唯一重要的出口是羊毛，大量的運往蘇聯，供給紅軍。

新疆在世界上是那末一個區域，政治和地理混合而成一種爆發的呆滯，對於那些不知世界將要發生什麼的人，充滿着好奇。地理上使新疆倚賴蘇聯。蘇維埃的土西鐵路有幾哩經過新疆的邊境。我們在迪化看見所有的消費者的貨物都是從蘇聯來的；我們所乘的汽車是俄國製造的；我們看見的軍隊，駕駛着俄國的坦克車。但是政治使新疆省回順倚賴中國。中國人自漢朝以來即治理新疆。現在的主席是中國人。今日，中國正在開發自己的內地，全力以赴，充滿着希望向前進展，給新疆帶來了新的生氣，戰後中蘇的關係，對於整個世界非常重要，而兩者的關係，也許即在這個地方決定

蘇聯政府，一向承認中國在新疆的主權。兩國間從沒有發生邊疆衝突之類的事情。但在過去的十年中，鐵路，市場，商業銀行，共產主義的理論的壓力，迫使新疆傾向蘇聯，但是假使中國人以工業化和發展西北等計劃，推及於新疆，作為對策，那末兩者的勢力，勢將接觸。

我在莫斯科和重慶都會聽說新疆政治的困難，幾乎像一部小說。新疆的領袖是新疆省現在的主席盛世才，他是漢人。他原籍是東北，自一九三一年東北為日軍佔領後，他切齒痛恨日本人。他的弟兄去年六月間在主席公館被暗殺，這件事傳遍了亞洲。

我不知道這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在迪化我和盛主席一起吃飯，蘇聯的總領事也在座。我們以俄國的伏特加和中國的米酒相互祝杯，沒有別的意思，祇是共祝中蘇間的友好。但第二天早晨，我和盛主席同進早餐（盛主席曾一度同情共產黨，但現在已忠心於委員長），他告訴我暗殺的故事，陰謀，間諜，反間諜，說得非常動聽，對於一個美國人，簡直有些不敢置信。很明顯的，戰後我們的問題之一，即是要幫助中蘇合作，共同解決彼此靠近土耳其斯坦（亞洲的世界脊樑）發生的問題。這也便是我所一再主張現在應召開中英美蘇會議，在戰鬥中彼此可以學習與合作的另一原因。

盛主席宴請我的晚餐，不祇是第一次我所受到的世界上最好客的人士給我的宴席。而且也是最有興趣的一次。我們坐在一間長拱形的廳堂，賓主面對面的坐在狹長桌子的兩旁，桌子是順着廳堂

放置的。牆壁上貼着歡迎一個美國人，對我們共同的敵人作戰，我們有必勝的信念等標語，用十七種文字寫成，這些文字至今仍通行於亞洲的十字通路，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陸商往來的大道，仍聯繫着歐亞兩洲。

盛主席身材很高，有着美觀的黑髮，他是漢人，生於滿洲，曾在日本求學。他任新疆主席已十多年了，對於國事知道得很清楚。那天上午在他辦公室裏我和他談話，他告訴我治理一個邊疆省份的問題，從他國家的首都到那里須要四十六天的旅程。

在迪化，像在我以後將訪問的其他各中國城市一樣，我接受着使人感動的好意，九月的那天晚上，和宴會廳距離得最遠的是美國，就是在一起吃飯的人，大部份是政府官員和軍官，都好奇地對我看着，似乎他們之中許多人，一生中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然而他們對我都很熱情和友好，表示着一種不可言喻的希望，希望美國將來繼續為中國的朋友。

迪化的每一件事都深深的印在我腦中，比塔什干，或德黑蘭，或巴格達所表現的亞洲的生氣和力量更為生動。第二天，盛主席邀我們檢閱軍隊。在一片廣大的場地，我們檢閱新疆的軍隊，大部份是分隊的行進。



檢閱的情形非常使人感動。兵士看去都很堅韌有訓練而且健康，他們的配備數量有限，大部分似乎是蘇聯製造的，而且非常優良。他們有自動砲，裝置在機器腳踏車上的機關槍，裝甲巡邏車，以及少數的輕快坦克車。此外又有幾分隊的車運的步兵。一個砲兵團經過我們，乘着烏克蘭的農用馬車，車上裝設着機關鎗，這種裝配顯然是來自蘇聯，當蘇聯內戰時，游擊部隊發明了這樣的配備，而現在烏克蘭却又第二次用為重要的武器對付納粹。

但是檢閱中最精彩的是純粹當地的騎兵。數十個強壯的蒙古人和喀山喀人騎在馬鞍上，好像是馬的一部分，輪流表演約模十五種的技術，每一種使你看了會喘不過氣來。用兩面開鋒的佩刀研削幼樹，把假想的人頭斬下，以及從地面上檢取物件等——一切動作都在疾馳中完成，我們看見不難了解，當年成吉思汗的威風如何使他的敵人震驚。

蔣委員長派了他的兩個最親近的朋友，帶了正式的請柬到迪化來歡迎我，那兩位朋友，在我留在中國的時期中，他們一直陪伴着我。一個是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博士，一個是西北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在我離開中國以前我對他們兩人會表示了懇切的謝忱。

一個非常了解而且愛好中國的外國人，在我們到中國的途中，對我描述董副部長：「他是委員長最靈敏的助手，而且非常忠實。」他是密蘇里的派克學院，以及紐約的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畢業的

。在中國報界會有着卓越的事業，後來即成爲委員長最親近的顧問之一，協助處理重要的部務；同時做委員長的翻譯，祕書和顧問。我後來很了解他，我覺得他確是任何偉大領袖所歡喜的助手。

朱將軍不像董副部長那樣說得一口好英文，他所說的我一字也不懂。但他非常和愛可親，每一次宴會，或演說完畢或走出會場，我總是看見他以最友好的態度對我微笑。他很少講話，保持着卓越的軍人的身份，他在早日統一中國的戰事中，會隨從委員長艱苦地作戰，但他如其他許多人，同樣的使我覺得中國不是一個充滿奇異習慣的外國，而是一個到處有着美國的朋友的國家。

另外一個和我們從莫斯科一起旅行的中國人，他的熱烈的友誼也使我不會忘記。他就是徐煥昇少校，是中國駐古比雪夫大使館的助理陸軍武官。我們在中國境內飛行時，有好幾次是由他駕駛的。在一九三八年，美國參戰前三年，這個看起來只像十七歲的青年，第一次駕了中國飛機襲擊日本，投下了小冊子，因而出了名。我很高興，他同我們一起旅行，使他有機會在我們去霸安前綫途中，看見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們回國時，他在西伯利亞和我們分別，因爲他要去復職，我頗有依依不捨之感。

這些人於次日清晨，九月二十九日，和我們同機飛往甘肅的省會蘭州。這五小時的飛行，在某一點意義上講，是我週遊世界的飛行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段。在戰火瀰漫的世界上飛行每停留一次，

以後又要打聽下一站；或偷閒小睡一會，觀賞風景是次要。但是迪化和蘭州間的風光，實是我一生所見的最愉快的景色。我們以極大的興趣，俯視着展開在我們翼下的大地。

自然的美豈無以比美的旅程中，一部分是沙漠，一部分是綠色的耕地。到處全是山，但飛過了白雪掩蓋的大山山脈，山巒漸漸的低落，而且意外的肥沃，有些地方，中國人民已把山丘耕平，下面的土地看起來像一張鉅大的彈子桌，上面鋪着不規則的，變化無窮的綠色輾動的絨毯。

我們飛近蘭州時，發現那些紅土壤的山丘，幾百年來，華北大部分從風中和河道中帶來的灰土，即是發源於此。那些紅色的山丘從空中俯視，非常美觀，但是我一看見即想起這些紅色的土壤，對於一邦決心開發西部的國家，代表着如何樣的財富。濃澁的計劃，電力工廠，肥沃的耕地，以及牧場，完整的城市，都可在這個區域建設起來，全國所缺少的，我覺得乃是人力。

在中國的幾星期內，我時常想到這一次飛行。第一，西北地區的空虛，和富饒的人烟稠密的華南比起來，恰恰相反。第二，和我談話的每一個中國領袖都提起西北，以及目前如何發展運輸，合作事業，和現代科學等，開發西北的富源，這是抵抗日本戰爭中的基本希望；以及戰後建設強大的現代國家的偉大試驗。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我在迪化，在蘭州，以及在兩地之間的鄉間的時候，覺得那些地方

很像我們自己當年開發時的美國的西部，那里的人民似乎長得很高而且富有，比起我們在成都和重慶擁擠的街上所看見的許多人，似乎較為粗俗。因為日本人佔據了中國沿海的一半土地，佔據所有巨大的工業城市和商埠以及許多富庶肥沃的農地，中國人現在沒有第二個辦法，祇有去開發他們自己的西北。現在西北開發的那些中國人，毫沒有一些酸葡萄的態度，這是很好的現象。反之，他們談起來非常遠大，稍帶一些誇大，很像我父親時代的美國人民。

在蘭州我參觀了若干中國的工業合作事業。在那里我遇見了一個沉靜熱忱的新西蘭人阿蘭，他把工合（Indusco）變成了一個國際的名詞，並且把這名詞成爲一個民族決心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的標記。我見阿蘭時，他正遇着困難；我猜想他將繼續遭遇困難。但是我相信他和我在中國西北各省所見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隨着亞洲中心的開發，在世界經濟地理中，將有一個巨大的變更。

這一個中國目前所從事的經濟奮鬥，在美國有關的記載，比關於中國軍事對付日本侵略的奮鬥少得多。但是我所看見的一切，使我相信並不遜色於軍事上的英勇。假使我們的沿海受到敵人的蹂躪，我們可以退到廣大的內地，那里有着機器和熟練的勞工，可以繼續作戰。但是在中國的廣大的內地，沒有那些便利。中國人必須帶着工廠到內地；不是用貨車或甚至馬車運送，而是一件一件的藉人民的勞力肩負，把工廠遷到大江的流域，翻過高山峻嶺。

他們把它們一起安置在遼遠的高原，那里從來未曾聽到過機器的嗚聲。從那力量所能遷移的數的幾家工廠中，現在繁殖了一千以上的工業單位——大部分規模很小，製造數量很有限，但每一單位對於新中國的基礎，却都供獻了他們的微薄的力量。

自然，我們美國人是能認識這件事情的。在現代歷史中，新中國的開發，祇能以我們自己西部的開發相比。我們了解那些人民的奮鬥，我們了解他們的希望。我們也了解他們的成就的重要性。現代中國的領袖們以經濟協助，開發他們的國家，甚於我們開發我們的國家。他們要建設一個工業的基礎，在這基礎上，可以提高他們人民的生活標準。許多專家相信中國的工業化一旦開始後，其進展的速度，甚至比我們還大。新中國以高等技術開始，而我們必須等着火車頭慢慢的改進，他們開始即能製造每小時三百哩的飛機。

直至現在，他們還沒有飛機和火車頭的製造廠。在蘭州我看見蘇聯公路，一條通現代中國的陸路的終點。我希望每一個美國人能看見那條路，假使他懷疑在那些有限的，從中國帶回來的故事中，對於中國人民打了五年多仗以後，仍以英勇和堅忍的精神打擊日本，是否過甚其辭。

我們自從經過阿拉木圖以東蘇聯的邊境後，曾經在這條公路的延長線上空飛行。阿拉木圖是一個大城，籍鐵路和航空與西伯利亞，蘇維埃中亞細亞，以及俄國本部相聯繫。戰重貨車從阿木圖東

行，沿着一條硬面的大道，經過迪化和哈密，直達甘肅省的西部省界。我們曾在那些貨車上空飛行，證實了他們確是在這運絲綢的古道上行駛，也許這是歷史上最古老的商隊往來的路線，馬可波羅即是從這條路線旅行到古代的中國。

這條公路在中國的一端，既沒有路基，又沒有汽油和車輛，更顯得合於歷史上的傳說。中國人用馬車駱駝和苦力來代替汽車。蘇聯的貨車，須要七十多天到達蘭州，從邊疆到甘肅的省界，則須四天。可是仍舊接不上鐵路，必須一天一天用着最原始的運輸方法，輸送到中國人口稠密需要孔急的地方。

蘭州城外，在飛機場和城市之間，我們看見一羣中國的商隊。將就道轉向蘇聯出發。他們有着小型的兩輪駱車，車輪用橡皮包着——很奇怪，我的眼睛對於橡皮的感覺特別靈敏——車上高高的裝着木材，鹽，和茶葉。蘇聯耐心地站在一線上，大約有數哩之長，苦力站在後面等候命令出發。人幫告訴我，他們徒步西行，約須兩個多月，然後才能把貨物換取汽車，飛機各種機件，引擎以及軍火，那些東西蘇聯仍在運往中國，大部分是信用貸款，這種貸款，現在已達到一巨大的數目。

公路像一條鞋帶，用以支持巨大的重量，假使鞋帶斷了，我們全要失敗。我對於腳踏土現在的運輸總量，沒有獲得官方的數字。但是根據在蘭州的美國人估計，每月約有二千噸以內的貨運，沿

看一千八百哩的公路，到達中國。這和已爲日軍截斷的滇緬路比起來，差得很遠，但是除了從印度，經喜馬拉雅山上空而來的美國飛機，以及從日軍各前線的走私以外，這條公路是目前中國和外界唯一的聯繫。

蘭州位於黃河之上，比瀟關更近河源，一兩星期後，我們會到瀟關，隔河遠望日軍的防地。蘭州約有五十萬人口，沒有鐵路，沒有六年以上的重要工廠，但是有着偉大的將來。甘肅省（蘭州是其省會）的土地很富庶，充滿着巨大的希望。

在蘭州，朱將軍邀我到他家里，引見他的夫人。我們出城攀登一山，可以俯視城市及其附近的河道。山頂附近有一中國廟宇，我們在這里坐下，和朱將軍及其夫人一盞喝茶吃餅，從朱將軍辦公室外面的掛樓上望去，經過廟屋的瓦頂，經過城市，一直望見黃河在那裏灌溉，二千年來不停地那樣工作，把甘肅的土地變得非常肥沃。

那天晚上，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在勵志社宴請我們，晚上我們即在那里住宿。除主人以外，還到了其他的高級官員：後方勤務部部長俞飛鵬將軍，及農林部部長沈鴻烈將軍。他們談起甘肅省的森林，農業，以及水壘保存等問題，並且也談到雛型工業，第二天早上，我參觀了幾家工廠，其中一家是氈毯工廠。雖然我離開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還很遠，但我已開始感覺到這個國家的力量，從

這種力量中，產生了作戰的能力反攻日本。



## 第八章 自由中國用什麼作戰

我們從蘭州向南飛到成都，然後飛到叢山峻嶺中的陪都重慶。我們從中國回國時，先向北飛到西安，又折回成都，然後重登長途的飛程，經過中國北部和戈壁逕至西伯利亞。爲了要訪問在四川和雲南的美國司令部和美國駐軍，我們曾作了幾次短程的飛行，因此自由中國的各省，我們到了大部分，那些省分尙未曾爲日本插足，祇受到敵機的轟炸而已。

這樣的省分一起有十個，西北五個，西南五個。在西北的省分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將來，在西南的省分，特別是四川省——成都和重慶——我們看見了她的繁榮的現在。

在這裏所給我們的最強烈的印象，不是土地而是人民。中國的無窮盡人力的來源，實在使人不易了解。自從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侵略以來，一般到過中國的人告訴我關於中國的那種生氣，富源，以及爲爭取自由的勇敢和決心，使他們時常感到非常驚奇。

我參觀了中國的紗廠，兵工廠，陶器廠和水泥工廠，並且和各廠的經理，以及千百工人談了好幾小時之後，我才真正認識了中國的技術，在現代工業方法中的靈敏和適用。我和若干大學教授，及各級學校教員，討論過關於近代中國幾年內推行教育從少數人普及到大衆的事實，一般人所謂中

國的醒悟，對於我確是找到了真正的意義。現在約有一萬萬中國人都能識字。大學校的學習，不能再稱為純粹的博學。中國今日的學者，把中國豐富的學問，適用在現代生活的問題上。他們的目的不僅在出世的廟堂；他們現在熱心地尋求優良的方法，服務於他們自己的社會和國家。

在成都，我曾遇見在那裏的八個大學的校長，和他們交換了若干問題。其中六個大學是從日軍佔領區內逃出來的，現在利用當地兩個大學的房屋和設備的餘閒，因此，教室，圖書館和實驗室等，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一點落空。

一天清早，我對一萬個大學學生講演，他們聽到每一句關於自由的話，放大了喉嚨歡呼，我永不會忘記使我感動的這一幕。在中國各地，我和許多負責小學校的人談過話，在那些小學校里，中國農民和苦力的孩子，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讀書的機會。

在目前自由中國的地方，十年以前有一百種報紙，現在却已增加到了一千種。每一個稍大的城鎮，即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報紙，他們的社評有人給我譯成了英文，非常激烈而且富有力量。中央通訊社以職業的方式，收集並分發新聞稿件，頗城和我們自己的通訊社，及英國的路透社相媲美。

我於下午到達重慶，在一個離城數哩的飛機站降落。在我們的汽車到達城市之前，站在街道兩旁的人們擁擠着，一直擠到商店的門前。男人，婦女，年青的男子和女子，長鬚的長着，纏着頭巾

的中國人，苦力，腳夫，學生，喂着孩子的母親，穿得漂亮的，穿得破爛的——他們擁擠在七哩長的路上，我們的汽車在路中慢慢地駛到我們留宿的賓館。在長江的對岸，他們還站着等候。在重慶四週的山上，重慶必定是世界上山巒最多的城市，他們還站着，帶着笑容，歡呼，搖動着小小的紙製的美國的和中國的國旗。

凡是參加過美國總統競選的人，對付羣衆是慣常的事。但是這一次却不然。其實對於這些羣衆，我可以不用計在心中，可是不行。人民搖動的紙旗大小是一列的，表示那位招待遇到且富於理想的市長吳國楨博士，曾參與了設計的意見。很明白的，這許多光着腳，穿得衣衫襤褸的人民，他們怎知道我是誰？爲什麼到中國？在每一個街角上燃放的鞭炮，我對自己說，那不過是一種舊式的中國的感情。

但我雖然盡量的不計在心，可是這一種景象還是深深的感動了我。我所看見的那些人的面上，沒有一點虛偽。他們看我是個美國的代表，一個友誼和可能獲得援助的真實的希望。這是一個羣衆的善意的表示。也即是在人民心中和情緒中單純的力量深刻的表示，這一種單純的力量，是中國最大的資源。

我到蘭州時，也曾看見過這樣的羣衆，但規模較小。後來在陝西的省會西安街上又曾看見一次

，同樣給我很深的印象，因為我們的飛機遲到，他們在雨中等候了好幾小時。他們都使我深深地感動，在一個短時間內，在中國那樣廣大的國家旅行，要像密切的私人的友誼一樣獲得一種關係藉以了解一個外國民族的精神和理想，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這些中國的羣衆，給了我一種堅信不忘的感覺，在千萬的民衆的臉上那種坦白的情緒充實了我對於中國的外表的印象。

我所了解的中國人，不可避免的是各界的領袖。其中有漢人以後我將要以頌揚的詞句加以描述。可是我知道對於中國的無名人士，是無法可以表達我的頌揚的，

其中一人，我從未見過面，當我在中國時他給我寫了一封信。他是一個學生，在信的末尾貼着他的相片，

他的英文表示他是一個對他自己和字典，有着極大信心的學生。

「親愛的威爾基先生，」他寫，「讓我向你保證，中國是同盟國中，最勇敢，最守信的國家之一，她並不因目前的許多困難而受挫折，改變她的意志，因為我們完全明白，我們是爲着自由和正義的神聖的理由而作戰，我們堅信光明的前途在等候着我們，而且上帝將會給我們正在艱苦爭取的勝利。」

他還附着一個戰後和平建設的草案，這是一個非常有魄的計劃，但是那種精神，像我到處所看

到的中國羣衆的精神，同樣的使我感動。他建議建立紀念碑，使人們怨恨戰爭，而不是頌揚戰爭，並建議把這次戰爭的最後一天，爲全世界大衆的犧牲定爲一個紀念日，名之曰「和平，自由，快樂日。」

他的計劃中另一建議，名爲「加強人類間的感情。」他提議每一國家須籌募和平基金，作爲科學獎學金。他寫給我說，祇有科學「能解除人類的苦痛，彌補自然的缺點，提高人類生活的標準，以及使全人類與自然鬥爭，而不是彼此屠殺。」

在這次戰爭中，在我們一邊的國家，可能沒有一國像中國那樣受治於一個人的人格。這個人即是舉世所知的 蔣委員長。

我和 委員長談過好幾次話，也和他及蔣夫人一起吃好幾次早餐和午晚餐。

一天下午，我們驅車到委員長的郊外別墅，房屋高高的位於長江沿岸的石級坡上。董副部長和我們在一起。走過了那構造簡單的房屋的前方，是一個寬廣的走廊，我們在那里坐下，可以遠望重慶的山崗。下面的江中，有若干小船正在急流中移動，中國的農民在小船裏裝載着他們的產物運往下流的市場去，那天是重慶的炎熱的日子，但這裏却有着愉快的涼風，蔣夫人和董副部長輪流擔任傳譯。

我們討論過去，以及 委員長的行政的目的，即在改造中國從一個幾乎純粹的農業社會，變為一個現代的工業社會。他希望在改造之中，保留着最優秀的傳統，並大量建立分散於各地的小規模的工廠，以避免因大規模的西方工業的發展而引起社會紊亂。他相信在國父 孫總理的遺教中，關於工農聯合社會問題內，他可以找辦法。但是他很顯意和西方人士討論這個問題，我問了他許多問題，以及如他所要避免的大規模的工業聯合，不祇是如他所想像的在為爭權的慾望和建設個人財產的緣故，雖然這些因素，無疑的是有着相當作用。至少這些問題的發生，一部分是因為經濟的需要：大量生產可以大大的減低成本。

我以汽車為例來說明，他希望汽車在中國也能以低的成本製造，以供應中國公路的需要。我指出一輛在小規模的工廠裏製造的汽車，其成本將五倍於在科學管理的分門別類的，大規模的工廠所製造者。在完全小規模的工廠裏，希望以在大規模工廠裏所製造的那樣低廉的成本，而欲得到高度的生活標準的產品，那簡直是不可能的。每一個有思想的美國人都知道，我們有許多大規模的工業聯合是不必須的，爲了社會和經濟的利益，我們必須以最大的鼓勵和特惠，給與小規模的工業。但是某種工業爲了要維持我們的生活標準，需要大規模的生產。我告訴他，我們也認識在獨家的工廠中，集中着成萬的工人，無論在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公共意見，各方面都不能妥善處理，因

而引起整個同業同時失業的事情。我們對於目前制度所產生的，全國各巨大組織成爲永遠的雇工階級，而減少個人經營事業的機會，覺得非常抱憾，我也告訴委員長，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切解決的辦法。但是我們知道，解決的關鍵不在取消必須的大規模的工廠，改設效力薄弱的小規模的工廠。我提醒他，有一個實驗，對於他比西方各國更易明瞭，即是共產黨在蘇聯的實驗，他們一部分的成功，應歸功於用大量工人，完成某一特殊目的底大規模的生產技術。

他說把必須的大規模的事業，一部分劃歸國有，一部分聽由私人資本經營，也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討論繼續了幾小時之久。替我們傳譯的蔣夫人於是帶着愉快而堅定的女界權威的神情說：「現在已經十點鐘了，你們還沒吃過什麼呢，讓我們進城去多少吃一點東西。你們的談話留待下次結束罷。」

後來我們又有幾次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同時又談到別的事情。我們談到印度，整個東方，它的希望，它的目的，如何可以適應全世界的秩序，軍事戰略，日本及其資源，珍珠港和新加坡的淪陷，以及關於東方對於西方的態度，在心理上的深刻的反應。我們又談到緊張而幾乎瘋狂的民族主義的高漲的精神，在中東各國，蘇聯以及現在的中國，我發現它們正在發展之中，這一種精神也

許會破壞世界合作的可能性。我們又談到蘇聯以及 委員長和中國共產黨間的關係，英國及其在東方的政策，以及羅斯福與邱吉爾和斯大林。

事實上我和 委員長在一起的六天中，幾乎時時刻刻在談話之中。

委員長無論以一平民或以一領袖的身份，他的偉大實超過他一般傳說的聲譽，在我確定這樣的給論以前，對於中國不能有所記述。他是一個異常沉靜而說話溫和的人。他不穿軍服時，穿着中國衣服，這更加强了他的學者的風度，不像是一備政治領袖。他顯然是一個精於聽取人家談話的人，且敏於了解他人的思想。他同意你時，點點頭，繼續溫和而小聲地說：「對，對……」這是一個微妙的贊許的方式，無形中使他談話的對方，放棄成見，站到 委員長的一邊。

據說 委員長每天費一小部分時間祈禱及閱讀聖經。他從聖經或是從孩童時期的影響，養成了一種富於沉思的安閑的態度，以及一種偶爾的喃喃自語。他非常真誠，他的壯嚴和鎮靜多少帶有一些嚴重的性質。

委員長的執政，經過千辛萬苦的奮鬥，這件事他頗引為自傲。他二十多年以來，始終都在設法了解建設的最難問題。也許就因這個緣故，他對於他夫人的非常的家庭，以及他早年共同奮鬥的做屬的忠誠，堅信不移。關於這點，我沒有什麼可以證明，但是凡在重慶逗留過的人，即使很短的時



間，一定都能認識這個年青的中華民族，雖然很年青，却已養成了一種「袍澤的關係」，這種關係自動地保持了若干高級地位的人材。穿着那種「袍澤」的領袖們都是 委員長當年剷除軍閥時，在軍事方面的同志，而這些人，現在都還不老，這是中國的幸福。

我不是說我在重慶所遇見的領袖們，都是沒有相當才能的人物。他們都能幹。但以西方的觀念來看，他們全不是代表的人物。那是因為中國人對於民主的觀念，在某種事情上和我們不同，例如生活的方式以領袖為模範，即是一例。統治中國的國民黨，在其建立自治政府的計劃中，規定有「訓政時期」，在此期間，訓練人民養成新的生活，和思想的習慣，目的在使他們成為完全民主的，良好的公民，最後再賦予選舉權。

在這個訓政時期中，不可避免的中國的領袖們，必須是在外國大學，或在戰爭與政治中受有相當訓練的人，不是直接由人民選舉代表的。中國的情形就是如此。我相信在中國，尤其使同情於中國的外國人，對於重慶所實施的關於集中管制中國人民生活的辦法，發生一種不可忍受的感覺，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中國有許多最能幹的人回答我的問題，指示我她的戰爭的努力。我不可能把那末多的，給我深刻印象的人，一一列舉。

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曾在他重慶山頂上的公館中，邀請我午餐。因此我又有機會和他，和施迪威將軍，和陳紹寬將軍，以及和其他中國軍隊的將官談話，後來和白崇禧將軍，廣西的三位領袖之一，有一個長時間的談論，

林主席在官邸中，正式接見我。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博士，在他的全重慶最華美的公館的草坪上，請我吃自由行動的便餐。教育部長陳立夫博士，經濟部長翁文灝博士，以及當時的宣傳部長王世杰博士，都充分地給我時間，對我解釋中國如何應付她的危機。

委員長在軍事委員會，親自主持了一個宴會，軍事委員會一個巨大的禮堂，位於重慶的中心，一年前會遭轟炸，但早已重建起來了。這是我周遊全世界所會參加的最動人的一次公開宴會。因為這很簡樸，大家都應當相信，這是在這必須犧牲的幾年中，那些重要的地方所必然的情形。宴會中有音樂家參加演奏中國古樂器，許多是單弦的樂器，形式和構造都很簡單。演奏的是中國古代民曲，音節十分柔和。

在這一次一直使我們愉快地記着的宴會中，却會發生了一個插曲。密克考來斯前天因為像做實驗般的，吃了一些奶油魚肝生了病，因此他看見了這次宴席上的點心是老式而佳美的香草冰淇淋，覺得特別高興。他把他的快樂告訴了重慶市市長，市長解釋道：四月中，醫學界的權威都怕中國將

流行霍亂。因為他們沒有預防霍亂的血清，因為霍亂菌是由牛奶傳染的，所以市政府通過了一個命令，禁止售賣冰淇淋。

「但是」，他接着說：「因為威爾基先生的來到重慶，我們異常歡欣，而冰淇淋又是如此的美好，因此昨天我決定發布命令，解禁一天，所以今天晚上我們能以冰淇淋款待你們。」

以後幾天中，我們心焦地等着看我們的預防霍亂的種苗，是否真正有效。

在沒有應酬的時候，外表上是休息的時候，我又看見了許多其他的中國人。宋博士公館是一個便於集會的地方。我的好奇心很大，祇要中國人願意來會見，是沒有限制的。

例如在那裏，我一個人閒暇的時候，毫無打擾的和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周恩來談話。他住在重慶，幫助編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並負責參加國民參政會各屆會議。國民參政會，現在是中國的最近於代表立法的團體，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都是參政員。

在孔博士的餐會中，我又看見周恩來。周將軍穿着一套藍色粗斜紋布制服，令人想到中國舊式的服裝，同時看來好像是一個熟練工人所穿的制服。他有一個開闊的臉，一雙巨大嚴肅的眼睛，英語說得很慢。

另外一位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張伯苓博士，他是一個體格魁梧的人，有着嚴肅的深謀遠慮的學者

風度，並且有微妙熱烈的幽默。張博士是國內著名的南開大學的校長，同時也是參政員。無論我們談的是關於印度或是戰爭，或是美國大學，他所講的內容和判斷，在美國也很少人可和他相比。

在重慶，另外二人也會給我講解關於新中國的事情。他們所講到的在我讀過的所關於統治中國生活的書本中是找不到的。一位是李惟果博士，他是蔣委員長對待從秘書。年青英俊，聰敏過人，精緻強幹，是一個偉大領袖不可少的祕書人材。另外一位是黃仁霖將軍，勵志社的總幹事，黃將軍身材很魁偉，他的笑聲也很洪亮。如果說他像一位異常多才的主人和幹事，或許更容易來描寫他。他所做的工作之一，是經辦美國飛行員在中國的住所，這工作他做得異常成功。但是在他有風趣的舉止和他的社會經驗中，我發現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毅力，為中國勝利與改善世界努力的戰士。

在重慶中國並不缺乏幹練的人材來担任重要職務，但是無論他們所定的標準多高，宋氏家庭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有着獨特的地位。宋氏的三個兄弟和三個姊妹，都會受過美以美教會和美國大學的教育，他們是中國有才幹，有政治技巧，有偉大財富和矢忠於年青家國的第一流人材。他們構成了世界上最有聲望的家庭之一。

我在華盛頓便已認識宋子文博士，他是中國的外交部長，同時亦是同盟國家偉大政治家之一。他的三位姊妹，我在中國都會看到。一位是蔣委員長夫人，一位是主管中國財政的孔祥熙博士的

夫人。另一位是中華民國創造者——孫總理的夫人。

孔博士招待的宴會，是在草坪上舉行的，我的座位被列在孫夫人和蔣夫人之間，談話很是輕鬆愉快，兩位夫人都講着極流俐的英語，並且充滿了豐富的智識。散席之後，蔣夫人說：「我要你去會一會我的另一位姐姐，他因臂手疼痛不能出來參加這宴會。」在房子裏面，我們看見孔夫人，她的臂膀放在吊帶裏，渴望着要知道她曾經一度居住過的美國的情形。我們三人於是暢談，竟忘記了時間和門外的人。

快到十一點鐘，席已散了，孔博士進來，溫柔地責備蔣夫人和我，因為我們沒有回到席上去。他也坐了下來，我們四個人就在這裏談論着宇宙間各種問題。

我們談到在東方波動着的革命思潮——我在所到過的地方都會發生過與此相同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的尼赫魯，中國的蔣委員長——談到亞洲數萬萬人民，不可制止的要求自由的激昂情緒，他們要求教育、較好的生活等。而最重要的都是要離開西方，而設立自治政府。

使我驚奇的是他們三位，對於現實都很清楚，她們都有健全而準確的意見，每個人都熱烈參加說話，尤其是蔣夫人。最後在我們正要走的時候，蔣夫人對孔院長和孔夫人說：「在昨晚宴會席上，威爾基先生向我建議說，我應當到美國去作一次友誼的訪問。」孔院長和孔夫人帶着詢問的神色

望着我，我於是說：「不錯的，而且我知道我這建議是正確的。」

於是孔博士很嚴肅地對我說：「威爾基先生，你真有這意思嗎？如果真的，那又爲了什麼呢？」

我對他說：「孔博士，在我們談話之中，你知道我是堅決相信，這是一件極重要的工作，使我的同胞能夠明瞭亞洲的問題和亞洲人民的意見；並且我也確信將來世界的和平，必須依賴於戰後東方問題的公平解決。」

「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富於思想，善於辭令和充滿着精神力量的人從中國到美國去，幫助我們，使我們明白中國和印度的人民。蔣夫人可以作一個十分完備的大使，他的偉大人格——我知道她會原諒我說得太親切了——她對於中國的切愛，在美國早已深知熟聞，美國將會發現她不僅被人所愛戴，而且頗能發生作用，我們會不聽別人，祇聽她一人的話，她有才智，溫柔，慷慨和富於瞭解的心，藹然可親和美麗的儀態以及熱烈的信念，他正是我們所要的一位訪問者」。

她現在已到美國來了，自從她在國會發表了動人的演詞，並向總統提出了溫和有禮，詞鋒銳利的意見，美國人民紛紛讚慕着她的勇氣和理智。

美國駐華陸軍空軍司令陳納德中將，凡是和他談過話的人，全不會忘記他。他身材瘦長，膚色

赤黑，態度十分嚴肅，他的前額和眼睛和一般得意斯安那人不相同。他最初到中國時候是以一個私人飛行員和航空戰鬥技術專家的資格，幫助中國訓練空軍。之後他組織了美國志願隊，在中國和緬甸有過光榮的戰蹟，如今在美國陸軍中服務，美國陸軍有他這樣人材，確是一件可慶幸的事。

關於他和他的部下的成功，現已爲一般人所熟知。他曾在若干次的空戰中擊下不少日本飛機。損失的比例是十二對一或者二十對一。當我在重慶時，中國軍事當局所宣佈的公告說，他的隊伍會與日本飛機連續空戰七十次而無一架損失，雖然在每一次作戰中，美國飛機的數量不及日方的多。他的參謀長古柏上校，有一天在重慶和我吃飯，告訴我，他的長官一聽別人說到他是採用正統派的戰略，配合最不正統的戰術，結果竟使日本人感到畏懼時，他的臉就會紅起來。我自己的駕駛員開脫少校對我說：陳納德將軍對於氣候，空中作戰情況以及地理等的情報，有着一種驚人的系統。因爲在中國並沒有設備完全的氣象站，供給航空人員的情報，陳納德將軍的人員，大半依類在中國諜報人員從離開他的司令部很遠的地方，轉輾傳送的情報。

我知道中國人全都知道陳納德將軍。我在成都時問一位小學教員，美國人中間那一位最著名而爲他的學生所喜歡。他告訴我即是陳納德將軍。並且我聽到不少中國最重要的領袖們，也時常提到他，而且對他有着極大的敬意和深愛。

我曾有好幾次和陳納德將軍會晤談，但一次也未能實現。結果我特地從重慶飛到他的司令部去看他。當我發現他正在他飛機場上，站在他的二排P-40的戰鬥機面前時，我才明白他爲什麼不能到重慶赴約的理由。

他直接用親自統治的方式，來主持一個我從未見過的最忙碌而最驚人的空軍根據地，他的任務不僅是在保衛重慶和雲南省會昆明的天空，而且還要保衛從印度經過緬甸所有重要的航空路線。此外，他的附帶的任務是轟炸在廣州和香港的日軍。有一個時候更遠至華北，離長城不遠的開灤煤鐵。他的空襲指揮機構之有效及巧妙是我所從未聽到的；他的部隊大半是美國南部人，其中有不少是塔克薩族州來的，在他的統率下，他們都表現了神妙的技能。

我會看到一件事，使我感到十分驚奇。他所用以工作的材料很少。看到在他指揮下的有限的人力，使我們更難相信他們所以完成的任務。陳納德將軍的確是有着偉大傳統精神的美國戰士，對於那些在他手下服務的飛行人員，我們也該寄以最大的敬意。

事實上，他所要求的材料已經很少，不過我們所會給他的尚遠不足他的要求。陳納德將軍曾談到如何使在中國的日軍疲于奔命，如何截斷日軍在中國海的供應線，以幫助偉大的中國陸軍反攻。當他提到如果中國陸軍有了空中的保障即可以向華東平原反攻時，他的聲音很低，但充滿了巨大的



信願。他告訴我，要是利用目前的航線經過喜馬拉亞山運輸汽油，零件和代替品到中國來，也可以維持中國相當的空中攻勢。

對於美國現在的官吏，却不能看到那些在他認為已經很明顯的事實，他也覺得有些沮喪。在中國發動一個攻勢，會有比一般軍事更大的影響。這種攻勢，可以給予中國軍隊以新的信心，且可以鼓勵中國民氣。我從中國回來之後，確實感到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來掃除中國人以爲我們在這一年之內，並不注意他們，而集中力量於其他戰場的思想。無論這種思想對於中國抗戰將產生什麼影響，至少會使因通貨膨脹產生的危機，更趨複雜。同時，這種思想會危及我們和中國成立諒解，共同建立和平以及戰後世界新基礎的一切工作。

當我在中國時，我每天清楚地記得中國已和日本打了五年多仗，這種長期的現象，可從重慶岩石做成的堅固的防空洞中看到，日本轟炸機每次飛入市空，全市人民都在洞內躲避。每次空襲過後，人民從防空洞中出來，從新建築被炸燬了的城市，繼續抵抗把敵人驅走。

雖然我沒有親自看見，但我在重慶却會聽到許多對於日本佔領區的中國民衆英勇抵抗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有證據可予證實，我在重慶時，會有不少英勇人士，繼續不絕地從日軍征服的上海，香港和北平等地，長途跋涉，歷盡艱苦，來到自由的中國。他們會經過不少游擊隊的省分

• 這些游擊隊是中國人在日軍佔領區域抵抗日軍的主要力量。中國的農民，每天都在爭取自由，表現出悲壯的事蹟，以及願為自由獨立而犧牲奮鬥的愛國熱忱。

我同時亦看到中國長期的有組織的作戰的證據，這對我是一種新的智識，後來我發現這對於許多中國人自己也是一種新的事件。可是現在仍有許多美國人以爲中國的軍隊是一羣烏合之衆，他們的軍官是和敵人談交易的專家，這些印象是一個對於散漫無組織，技術落後的中國軍事的諷刺。現在這些諷刺是不該存在了。中國的軍事已經統一，他們的領袖是受過訓練的，軍官非常能幹，中國的新式士兵都是強健耐勞。即使他們顯明的缺少現代作戰的武器，使他們知道爲什麼作戰和應當怎麼作戰。中國正如蘇聯，這次的抗戰，確是一個民族戰爭。即使是一個高級官員的子弟，也須入伍從軍，這現像是一世代前中國人所不能相信的，因爲那時候的軍役是僱用無知識的人充數的。

有一天，我站在成都附近的一座橋上，橋下流着帶土的河水，一陣陣黑煙在我面前從河畔一帶的圍牆中冒出來。我們從此可以看到機關槍的火花在閃爍。自砲在我們後面空地上不斷的演放，河中充溢了年青的中國人，不顧死活的逆流游泳，有的把來福槍舉在頭上，有的攜帶了連繫浮橋的繩索。

他們把浮橋拖過了河，其間雖曾一度爲河水淹沒，我以爲他們決不會成功了，可是忽然從我後

面的田地中爬了幾百個士兵，他們的帽子和制服是那樣巧妙地掩護着，我事先竟毫不覺察。他們跑過那座浮橋爬上那邊河岸，展開行伍，向着約在一哩外的村落開始攻擊。

他們穿過鐵絲網，經過有地雷的區域，觸着了地雷，空中立刻冒出一縷濃濃的黑烟，然後全身伏在沒有遮蓋的空地上，蛇行前進。帶着全付武裝，衝入那座村莊；他們演習得很熟，很疲倦，一身的污穢，但是學習如何在戰場上進行作複雜的動作，使他們感覺滿意而且驕傲。

這一幕軍事行動是成都中央軍官學校學員的作戰演習。演習是由一位在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中國學生負責指揮，在演習進行中，他站在我的旁邊給我解釋演習的規則，該校常有一千學生受訓，大部份學生都參加了這次演習，他們畢業之後，將在新中國軍隊中任職。這次演習是驚魂動魄的一幕，如同在世界別地方相似的演習一樣熟練。那一天下午我所看見的以及在中國別處所看見的演習在我看來，可說是一個紀元結束的標幟——四萬萬中國人受着無論是日本的，英國的或是美國的軍隊所支配所統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第二天，我參觀了成都中央航空學校，在那裏我又看到中國已經作戰五年的證據。我看到數百中國航空員——這些人在數年前尚被人憐憫地說是「一個不諳作戰的民族」——彼此用沉重的棍子對擊，當他們擁抱着撕打時，口中叫喊着，這種猛烈的肉搏，是我所從來未看見過的。在那裏，我

又看到許多童子軍，有的年紀很小，祇有八歲，他們承受着軍隊生活的全盤紀律和訓練，作為將步入伍從軍的準備。

我告訴蕭副部長說，我要參觀中國的前線。最初似乎不可能，不過後來我才知道 蔣委員長因為深切關懷我在中國境內的安全，所以董副部長必須有充分時間詳細準備。最後，準備好了，雖然我們發現并不如以前所想像的那樣危險，可是我們因此更知道，在這五年全面抗戰中，中國人民確實學到了不少。

我們飛到中國古都之一的西安，西安是在黃河的河曲，黃河從此向東流入大海。我們乘汽車到離城數哩的地方，借着山路兩旁排着的中國燈籠的火光，爬上另一個軍官學校去，這學校是一九三六年 蔣委員長在西安蒙難前不久所居住的地方，當天晚上，我們赴前線參觀。我們竟睡在自由中國有數的鐵路的富賢堂阜的臥車上出發，我覺得非常不調和。

第二天清早，我們離開火車，另外又坐了十五哩路的手搖車，到離開黃河祇有數哩的前線。一位將軍肯定地說現們坐在手搖車上會使對岸的日軍看到。於是我們下了車在一條在中國中部肥沃土壤掘成的戰壕一樣的路上向前走了數哩。

這裏的前線是一座村落，四面圍繞着蛛網似的戰壕，這一據點前面的河面，闊約有一千二百碼

，但在前哨偵察站從砲隊所用的望遠鏡向下望去，可以看到準對着我們的大砲口，和日軍營房裏的士兵。我們在那邊的時候，一切都平穩，但是很明顯的，這地方並非尋常平靜的。事實上，在我們未到之前已有過一陣砲戰。

我在此前線遇到蔣緯國上尉，是蔣委員長的第二公子，蔣上尉能講極流利的英語，他化了一整天時間，告訴我們日軍爲什麼不能在這裏越過黃河，那裏有許多凹谷的大山，向來是南來的軍隊由此進攻華北的路線。

我們看到大砲，步兵，裝甲車，和在山上建築得非常深固的日軍會所希望加以擊毀的堡壘。我們檢閱部隊，這是蔣委員長的精銳部隊之一。士兵們受過極優越的訓練，穿着整潔的制服，同時配有現代優良的武器，我對士兵講話，他們站在烈日下，注視着他們特別爲我造好的小木頭講台。雖然我講的是英語，我看見沒有一個人不在聚精會神的聽，直到我講完爲止。當我的演辭譯成華語後，他們高聲歡呼。日軍一定會聽得到這呼聲，但決猜想不到爲什麼這樣興奮和愉快。

回到我們所乘坐的火車裏，坐下用午餐，蔣上尉向我堅決地表示，方才我所看到的前線，並不是專爲給人參觀的。他走進餐車來時，兩臂上掛滿了日軍的馬劍，作爲送給我們的禮物。此外還攜着上等法國酒，這些都是中國士兵在夜間渡河偷襲得來的，他們在日軍後方神速地衝殺一陣後，回

來時便滿載地帶回了像這樣的擄獲品。並且還有更重要的戰利品，如俘虜和日軍的作戰計劃。蔣上尉告訴我，有時候，一隊偷襲部隊，在敵後逗留了幾個星期，才回到河西自己的陣地。當他們在敵後期間，他們截斷了日方交通線，組織起那里的人民反抗佔領區內的日軍。

## 第九章 對於中國貨幣問題的幾點意見

當我離開中國時，中國正爲目前的經濟和通貨膨脹問題感到有些挫折。很顯明的，中國的通貨膨脹如根據貨幣經濟的名詞來評判，或許早已發生危機，不過我們感覺到中國目前尙無財政上的危機。

中國的物價指數，決不是一個美國銀行家，在回答一個通貨膨脹問題前，所必須知道。在我們所會遊歷過的幾個城市裏，物價都有顯著的不同。我一天比一天的明白，有許多中國人，生活在他們國家的貨幣經濟之外，與物價無關。除非是爲了很少量衣服的需要和幾種主要的製造品。但即使承認這許多條件，圍繞於我們四周的通貨膨脹現象，會使一個美國人感覺紛擾到極點。

在重慶，有人告訴我說：批發物價已比戰前至少高出五十倍。若干種零售價格比以前高了六十倍。在我十月中到達重慶前數月，高漲的比例每月高百分之十。各界人民，尤其是靠固定收入爲生的人，這種高漲現象表示，許多從前通常消費的物品，現在却是無力購買了。

在成都非常忙碌的一天，有兩位女教師幫我做翻譯。她們二位都會受過教育，英語講得很好，很明顯的她們是在一個依舊缺乏受訓練人才的年青的民主國家中，是最好公民。她們告訴我說生活

費用的暴漲，使她們無從吃得好。舉例來講，她們的飲食，尙不及最卑微的挑夫，那些挑夫的生活是不靠固定的薪金，而依靠工資的。這也正是以反映着通貨的膨脹。

在成都，我和幾個中國大學校長討論教育問題，我發現大學的收入在許多方面確是逐漸增加了，美國聯合救濟會會極力設法維持各大學的預算和戰前數額接近，但是物價已增加了五十倍，美金折合中國國幣祇增加了三倍，結果各大學也發生了和教授學生的生活同樣的危機。

在我看來，通貨膨脹有着許多原因：第一，中國被迫發行紙幣，作爲戰爭費用。在一九四二年，租稅收入祇佔政府支出的四分之一，政府新的專賣事業現在包括糖，火柴，捲菸，茶和酒，這些都會幫着收入的增加，但仍是不足。中國並無公共的儲蓄，如吸收政府借款等。因此爲繼續抵抗侵略的戰爭，政府當局祇能被迫繼續採用增發紙幣的辦法。

一部份原因是政府本身未能充分實施一種有規律的貨幣制度，和有效的物價統制手段；其次因爲未嘗實施一種適當收入和租稅的辦法，藉以從若干因通貨膨脹致富的人身上吸取溢利的辦法。政府對於基本商品的投機，未嘗作嚴密的管制，也是原因之一。每一個人都告訴我說：蔣委員長正在用的最大努力，從事剷除許多不法的行爲，建立一種健全的財政秩序，消滅任何貪贓枉法的份子



另一個通貨膨脹發展的原因，是因自由中國物資缺乏的嚴重。一方面這是由於我們未能運送物資到中國，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佔領了大部份中國早年已發達了的工業區域，並阻斷了中國對外通商的交通，除了經過蘇聯或是飛過喜馬拉雅山的兩條途徑。中國需要原料及若干重要的機器，使在自由中國國內可作大規模生產之用。這兩種在目前都很難獲得。

根據我所看到的來判斷，中國人民業已完成一種奇蹟，應付了這個問題，不過單靠奇蹟是不夠的。在重慶，有一天使我十分驚奇，經濟部翁部長文瀾帶我去看從河南搬到四川來的棉紗廠，和一九三八年從上海搬出來的造紙廠。他對我說：政府總共搬了十二萬噸機器到內地來，其中大部份是屬於鋼鐵和紡織工業的。

這二家工廠規模很大，而且頗有成績。從翁部長所告訴我的，以及從這數量和住在自由中國的一萬萬人的需要來比，顯出中國在抗戰期間，企圖建立新經濟基礎所遭遇的嚴重問題。

我在蘭州看到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解決了這一問題的一部份。但是關於究竟由誰來管理他們，却就引起了極大的困難和爭執。擔任這個運動的人以為在中國有若干財政和工業力量想毀壞他們，可是他們有和我詳談過這一問題的 蔣委員長，做他們的穩固堅定的朋友。可是無論如何，要工業合作運動，在缺乏生產必需的重工業基礎和適當的運輸，在短時期中要應付戰爭的需要，或許非

常困難。自由中國，所有鐵路不到一千哩，通蘇聯的公路，正如我上文所指出的，乃是唯一暢通的進出口商品運輸的大路。而越過喜馬拉雅山上空的運輸，和在日本佔領區走私的路線是十分有限的。

問題是如此，我在中國所看到的中外專家，正在尋求謀取解決的方法，究竟什麼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在沒有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時，我不便說。但是我相信其中主要特點之一，必須解除目前加於中國人民經濟生活的嚴緊的統制和繼承財產以及動員中國無數人力來生產製造比現在更大規模的貨物和勞役。

我想中國政府當局，對於通貨膨脹問題的看法，我還不及所會談過的許多美國人，所看到的來得嚴重。他們告訴我，在中國祇有中產階級才有固定收入，由此他們的生活受到通貨膨脹的惡劣影響。而這些中產階級祇是極少數的一部份。他們並且告訴我，中國的勞動階級，一般從事於手工業的人和許多沒有固定收入，但是因生產品價格提高的許多農民，實際上收了通貨膨脹的利益。

主張上面這些看法的人，會有這樣的論調說，誰都是想把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作為像美國發生的同樣經濟問題來衡量，一定會產生一個可怕的錯誤結論。我會遇見一位研究經濟學的優秀的中國學生，他計算給我聽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民自己可以生產食品，而很少需要貨幣，他們貨幣的購買

力非常微薄。

但是這論證並不能維持得很久，雖然依現在的情勢看來，並不失望，可是到了將來必無希望。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羣，是我所看見的最能幹，而有思想的行政長官，他告訴我說，在四川省境內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耕種食糧的，他們全部或一部分是個戶。他說這些人必須拿他們出產的實物來繳租，不是拿錢來繳納。所以糧食價格的上漲，對他們的利益並不大。可是他們所需要購買的，即使是有限的用品，其價格的上漲，使大多數中國農民藉以生存的僅有一點微薄財力，爲之消耗殆盡。

最要緊的，不幸中國人民的經濟，實在，仍然在極度的貧困之中。要支持戰時與戰後急需的建設，必須有較大的生產組織，從事開發天然的富源。凡是看見過中國的人力，和天富的資源，以及感覺到中國人民有着深刻的決心來開發這些資源的人，便決不會懷疑到這個事實。

在我看來，解決中國通貨膨脹的最好辦法，或許便在按照中國所能應用的機器技術的需要，予以大量供給，同時讓中國人民自己決定他們如何組織或管理這許多作爲大量生產之用的物資與勞役。此外把我在中國各地所看到的土地，分配給人民經營，或許會有些幫助。在我和蘭州西安中國的青年銀行家，工廠經理們舉行談話之後，我想對於財政統制，採取較大規模的地方分編制，或許也

有些幫助。在實施這種辦法之前，政府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在我覺得，讓人民參加一部份也是一個聰明辦法。但這些問題是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來決定的。

現在美國有不少地方可以幫助中國：第一，我深信我們一定要和中國人民為友。他們和我們一同作戰，比我們做得更認真，更實際。我們可由蘇聯的路線，或是，飛越喜馬拉雅山的空中路線，或者重新開放滇緬路，或是三者並用，以機器、飛機、軍火以及他們所需要的各種原料，大量輸送給他們。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盟國，也應為我們自己設想一下，并且決定這個盟國對於我們究有如何真實意義。我們要決定，除了中國人民，現在東亞是否可能另行找出比中國更好的一個盟友？如果這回答是否定，正如我所預測，那麼我們必定要準備做到一個盟友應盡的義務。這些義務包括經濟合作與目前的軍事援助，但是其中還應包括瞭解中國人和中國各種問題的義務。中國人對於動聽的辭句，和抗議的信仰，現已逐漸減低了。

## 第十章 我們的友誼蓄水池

我們在十月九日離開成都，在中國境內旅行了將近一千哩，經過廣大的戈壁沙漠和蒙古，經過幾千哩的西伯利亞，經過白令海，整個阿拉斯加，最後橫越加拿大，於十月十三日回到美國，我們經過國際日期線時，在日歷上多加上了一天。

當你在四十九天中飛繞世界一週以後，你會知道這世界不僅在地圖上是縮小了，而且人們的頭腦也變小了。在這世界各地，數萬萬人抱着若干相同的理想，幾乎好像他們是同住在一個市鎮裏，在這些理想之中有一個我可以毫不遲疑地提出報告的，整個世界對於美國都懷有一種敬意與希望，這在我們美國人民實有驚人的意義。

當我和一個巴西貝郎或是納塔耳的居民談天，或是一個在尼日里正在精算着他的負擔的人，或是一個在古老的巴格達戴着面紗的女人，或是在埃及的一個首相或國王或是一位古老的前稱波斯現稱伊郎的國王，或是伊郎的一個織地氈的人，或是像我們中西部城市街道一樣的安哥拉街上的一凱末爾信徒，或者是在蘇聯的一個手臂堅強的工廠工人，或是斯大林本人；或者是中國 蔣委員長的美麗詭幹的夫人，或是一個在前線的中國士兵，或者是在西伯利亞荒無人跡的樹林裏面帶着獸皮

帽的獵者，無論和這些人中的某一個或和別的人談話，我總發現他們都有一個融貫的共同點。即是他們對於美國的深切友誼。

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對於美國都有一種毫不虛偽的真情以及不可分裂的友誼。我回到祖國，帶來一種確信，覺得目前在世上只有一個顯明而重要的事實，即在目前世界上正有一個對美友誼的巨大蓄水池的存在。

這無限量的蓄水池，是由許多因素構成的。前面列着的是美國傳教士，教師，和醫生，在世界上最遠的角落裏所設立的醫院，學校和大學。許多古舊國家的新領袖，那些在伊拉克土耳其或是中國執政的人，有不少會跟美國教師讀過書。這些美國教師們唯一的目的，是在廣佈智識。現在，當我們正有危機的時候，對於這些會為我們結交了不少朋友的男女，我們應表示深刻的敬意。

那些會從事經營開闢新路線，新航空線，和新航運線的美國開拓者，也會為我們在國外積儲了強大的友誼。恰如銀行帳目中的存款一樣。因了他們的緣故，世界上別個國家的人民，才會想到我們是一個善於改善物資和理想的人。他們喜歡我們的原因在此，他們尊敬我們的原因也在此。

在建造這友誼蓄水池的時候，我們的電影界，曾經擔任了一個極重要的任務。它們在世界各處放映着。每一個國家的人民，可用他們自己的眼睛來看我們像什麼，也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是怎樣

的？從納塔耳到重慶，許多人問過我不少關於美國電影明星的問題。其中有商店女店員和侍候我們喝咖啡的女侍者，他們熱烈地提出各種問題，正如許多國王和首相的妻子們渴望知道一樣。

我們所以能在海外蓄積友情，尙有別的原因。每一國家的人民，不論這國家是工業化了沒有，對於他們所聽到的關於美國工人的成功與願望，總是羨慕不置，渴望着能夠獲得同樣的享受。其次，他們對於我們用於農工商業的方法表示十分欽佩。在我所到的每一國家，有不少美國人所建築的灌溉工程的大水閘，許多實驗室和工廠。我發現一般人喜歡我們的工作，不僅因為可以幫助他們的生活變得豐富舒服，而且因為我們已表現出美國式的商業企業沒有控制政治的企圖。

我在各處發現當地居民對於外國統治都有一種恐怖。然而一般人都明白美國決無此種意願。此他們更加欽佩我們，其欽佩的程度，比我所想像到的還多。當我發現這世界那末敏銳地知道我們並不希望在任何地方，統治別人或向他們榨取特別的利益時，我覺得非常驚喜。

地球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對他們沒有險詐的陰謀。即便當我們過去曾從國際關係中退出，轉到一個虛偽的自給自足，但還從來就沒有存着惡意的目的。而且他們知道，我們參加這次戰爭，我們的目的是爲要取得利益，或是乘機搶掠，擴充領土，和攫取控制別的人民的生命與政治的權力。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友情蓄水池所以能存在於世界的唯一重要的理由。

在我們所遊歷過的世界各地。我的意思即是指世界任何一處，我看到美國陸軍的將士們。在有些地方，他們祇是一個很小的隊伍，在另一些地方，他們人數很多，佔用了數畝屬於當地政府的土地，建造巨大的營房。在我所看到的情形，他們是在增加當地人民對於美國的友情。

舉一個非常令人怪異的例子，即是我們所乘的 C-119 式陸軍飛行人員。這架飛機的職員或航空隊員從前沒有一個到過外國，除了奉命參加作戰以外。他們並不是訓練有素約外交家。而且他們大半不會講外國話。可是我們在各處降落之時，他們都替美國找到了朋友。我將永久不會忘記的是伊朗國王。當我們給他坐上我們的飛機，作生平第一次飛行後，他立刻和我們的駕駛員開脫握手，並且注視着他。這種情景，我祇能以愛慕和嫉妒的混和的心情來形容。

我為我在各處見到的美國士兵驕傲，我覺得有一種信心：即是我們的國民對於入伍為職業化的陸軍，雖無興趣，但他們却很願自動地幫着來保持我們經過了一個長時期遺留下來的友情的蓄水池，同時並願從直接的經驗中找出這一次為什麼是美國的戰爭。

我認為這個蓄水池的存在，乃是我們這一時代最大的政治事實。沒有別的西方國家有着這樣的蓄水池，我們必須以這個蓄水池供地球上一切人類作為尋求自由與公正之用，這蓄水池必須要維持，同時要有信心。這樣方可使那些人民和我們共同合作，從事消滅那足以破壞我們彼此所有主張的



巨大的惡勢力。保持這個友情的蓄水池，乃是一件神聖的責任。我們不僅應為地球上一切有志願的人，負起這種責任，且應為此次戰爭之中，正在每一洲前線作戰的子弟，負起這種責任。因為這蓄水池的水乃是澄清，激勵而奮發的自由之水。

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是昭和天皇，全都不能用他們的宣傳和武器，從我們手中奪取這種友情的聯合力量——在這世界上再沒有第二種聯合力量了——或者來挑撥離間我們自己，或我們的同盟，祇要我們不做出嘲笑自己所宣稱的作戰主義和理想。一種貧小便宜的欺騙敷衍的政策，證明是不適當的：因為這種政策，會使我們失去了世界全人類對於我們的理想與方法的信仰所有無價的精神的與實際的資產。

如果我們允許我們自己也被列入舊世界的陰謀及宗教，民族和種族的集團之中，我們會發現我們是外行。如果我們忠守於我們的基本原則，那麼，我們會發現我們對於世界各地人類所期望的一切，感覺熟練易行。

## 第十一章 我們為什麼而戰

要說這次戰爭是全世界人類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一種革命，那是太平凡了。但能看到革命的發生却就不是平凡，而這正是我所看到的。這是興奮，也有點害怕。興奮，因為這是一種新的證明，足證人類正以其廣大無垠的力量來轉變他的環境，用一種天性的，和他們以為可以憑藉自由而獲得一切的信心來為這種自由而戰。所可怕的，則因聯合國家的許多不同國籍的人民，不關心他們的領袖，對於他們所以作戰的目的，尚沒有得到共同的協定。

在人類發展過程中，不論刀鎗是居於如何重要的地位，理想所負的責任，實遠為重要——並且在這遼遠的過程中，也較有決定性。無論如何，從歷史上的許多時期看來，人類并不會僅僅為了以殺人為樂而常常從事於戰爭。他們確是為了某種目標而戰。有時這種目標並不十分令人興奮。有時是很自私的。但是一個沒有目標的戰爭的勝利，也就是一個不會獲得勝利的戰爭。

關於有目標的戰爭中，却有一個最有名的例子，便是我們的美國革命。我們決不是為了恨英國人，或是為了要殺死英國人而革命，我們是為了愛好自由並要建立自由而革命。如果從自由對於世界的意義而言，我認為平心而論，約克郡的勝利，乃是一切以武力所獲得的勝利中的最大的勝利。

但這決不是因為我們兵力的強盛可畏，這全是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如此的明白，崇高和確切。

很可惜的這却並不能適用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那次的戰爭是一個不會獲得勝利  
的戰爭，幾已成爲歷史上的定論。自然，當我們參與戰爭的時候，我們確曾設想或說明我們是爲了  
一個崇高的目標而作戰。我們的統帥威爾遜曾用了很漂亮的詞句，來說明我們的目標。我們爲求民  
主政治，使世界得到安全，——所謂求其安全，並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確曾接受了一套被稱爲「  
十四點」的原則，和設立了一個羽毛豐滿被稱爲國際聯盟的國際機構。這自然是一個崇高的目標。  
但正當簽訂和約開始實現的時候，却不幸發現了一個致命傷。我們發覺我們以及同盟國家對於這個  
目標，尙未衷心一致。一方面，有些同盟國家因有秘密條約的縛束，因此，他們多少仍頗履行這些  
條約，追求傳統的強權外交政策，而不願一揭威爾遜先生所擬訂指示的新天地。同時，在另一方面  
，我們想使全世界對於我們所宣佈的那些目標虔誠遵奉，但我們自己却不會完全做到。實在所得的  
結果，便是放棄了大部份我們所假設爲戰爭所由發生的目標。這個戰爭，我們這一代會斥之爲殘暴  
而無用的屠殺。幾百萬人們喪失了生命，但從這些犧牲者的屍灰裏却並不會生長出任何新的理想，  
和新的目的。

現在，我以爲這種說法把我們不可避免的引到了一個結論。

一般的說，沒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戰爭中不能獲得而能在和平中獲得的。我說沒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固然，詳細的細節，必須在和議席上以及在和議席以後的許多會議中訂定，——這些細目在戰爭的壓迫下是不能很詳細地擬訂出來的。譬如，我們——當然是指我們以及我們的同盟國家——決不能停止了對日戰爭，而來擬訂一個戰勝後處置緬甸問題的詳細計劃。我們現在也不能放棄對於希特勒的壓力而去商決關於波蘭日後的詳細辦法。

我們目前在戰爭中所一定要贏得的應是若干原則。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是我們所能解決的方針。讓我再引美國革命爲例。在我們作戰當時，並沒有實際建立一個美利堅合衆國的暗示。也沒有一個人聽到過憲法，那些聯邦制度，政府三權，以及致使各邦併入合衆國的那種光明的兩院制的折衷辦法——革新制度都還有待於日後，當時還在少數偉大的政治思想家的腦袋裏蘊育滋長，——而當時在些思想家自己，他們也還沒有十分清楚呢。但是這個日後成爲美利堅合衆國的偉大政治機構的基本原則，却已分明包含在獨立宣言之中，在當時的一切歌曲演詞之中，在茶餘酒後的閒談以及在兵士席地圍火，和火西洋沿岸各處的私人討論之中了！縱使那些較大的州，如麻薩芝沙芝，和佛羅尼亞等，也都由於那些空泛的宣言以及脆弱的政治機構州議會而互相結合，但是人民對於他們所以作戰的原因和他們所願達到的目的，則都出於誠實的融和。

如果麻省、佛省在戰時不會對此和協，那末對於和平時的許多原則一定亦不能和協。他們在和平後所獲得的恰好正是他們在戰時所獲得的——不多也不少。我們如果還不明瞭這些事實，也可以拿美國歷史上的災禍作個引證。各州人民對於解放黑奴問題，意見始終不會趨於一致。結果在南方黑奴的周圍便產生了一種與北方所有截然不同的經濟制度。因此又產生了另一個更殘忍的後果，戰爭。

難道我們不能從這簡單的教訓中，以及其他歷史上類似的教訓中，學習並求出我們當前的工作嗎？我們必須學習。我們必須知道日後和平時所應獲得的，即將為今日戰爭所能獲得的，不多也不少。

第一，要決定我們必須贏得什麼，很明顯的必須先和我們同盟各國取得一致具體而誠懇的協定。在此正和在我們美國革命中一樣，不需要甚或也不必要有一個瑣細的協定。但是除非我們願意重演上次大戰的不快愉的歷史，我們必須有一個原則上的協定。尤其，這不應僅僅存在於同盟國的領袖之間。我所想像的基本協調，必須是建立在各同盟國家人民本身之間，我們須要明白，我們所共同爭取的，主要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每人都有自由而坦白的發表和交換意見的責任，不管是隔着太

平洋，隔着大西洋，或是在國內。除非英國人能夠明白我們美國人思想的方法而記在心上，除非我們對於那些在英國和在聯合國內所設想的有一個相似的意見，我們將永沒有協同一致的希望。我們必須明瞭蘇聯和中國人民的意見，我們也要讓他們明瞭我們的意見。

我們若是認爲，任何一國國民，因恐爲他們領袖當前的或不正的政策招致困難，而必須噤若寒蟬，那是一種最愚蠢的事——簡直等於自殺。

假如我們知道，所有普通人民，尤其是那些不熟習於軍事，或與政府並無關係的人，不應對於有關戰爭的工作如軍事，工業，經濟，政治等發表任何意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保持緘默，好讓我們的領袖和專家專心一意的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相信這種情形很有變成一座牆壁的危險把真相隔在外面，而把真實和虛偽的安全關在裏面。當我在去年秋天歸國之時，我曾向美國人民報告說，在許多很重要的地方，我們全沒有弄好；我們正向着每勝利邁進，但是我們都冒了一個嚴重的危險，就是我們所耗費的人力，物力，遠過於我們所應該耗費的。這個報告是根據事實而來的。這種事實不應抹殺，應公開於我們民衆之前。因爲除非我們承認並且改正我們的錯誤，我們在戰事結果之前即會失去我們半數盟邦的友誼，乃至失去和平。

這是很明白的，如果要求這次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使它成爲我們的戰爭，我們大家的戰爭。若違背此目的，我們必須儘量探知一切，除軍事安全的必需以外。一個方針錯誤的檢查制度必不能達到這種目的。

法國有一個軍事領袖，名馬奇諾。某次，一個有遠見的法國人偶然指出，建築在地下的要塞決不是以抵抗飛機和坦克車。但馬奇諾立刻告訴這個人說，這些問題應該交給專家們去研究，不應由他多嘴。

截至目前爲止，戰事的事實，並不能引起我們對於那些政治軍事，以及海軍專家們的觀察的信心。軍事專家們，甚至我們的領袖們，必須受制於民主政治之最大的推動力，即從誠懇而自由的討論中所發出的民意的鞭策。

假如，當北非屢次失敗，隆美爾迭獲大勝之際，民意的批評使該處的統帥易人。當我在埃及時，這位新統帥阻止了隆美爾的進展。從那時到現在，已把他追過了橫越非洲的四分之三的路程。我想那次的勝利的功勞有一部份應該要記在美國民意的賬上。

美國人往往認爲在極權形式的統治之下，沒有所謂民意和民意作用這一類的東西。事實上，在每一個我所訪問過的獨裁國家，政府都會力求各種方法以確悉他們的人民到底在想些什麼。就是斯

太林也有他的「輿論測驗」的形式，據說當拿破崙威勢鼎盛之時，他跨着白馬，在餘火未熄的莫斯科廢墟中，尚且很焦急的等候着每日從使的報告，以求明白那些巴黎民衆，在作何感想。

在我所看到的世界各國中，我發現無論在戰時或可從思考的平時，一部分民意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在巴格達，我在每一個咖啡館的談話中都明白聽到，並且多得不可勝數。在蘇聯，這些又表現在各大工廠的會議中，以及蘇聯人民在各處的談話中，雖我看起來和我們對於蘇聯的觀念不同，但依然能在私人談話中像我們一樣的自由交換着意見。在中國，報紙雖不能像我們那樣無拘無束，但也仍然有着驚人的自由，反映和領導着民意。在中國和我談話的人們，無論是一個共產黨領袖，一個工人，一個大學教授，或是一個兵士，他們在表示他們的意見時，全都沒有任何畏縮不能盡言的樣子，這些意見甚至於和政府的若干政策是衝突的。

在每一個國家裏，我發現處在後方的羣衆都有一種焦慮與疑惑的心理。他們是在尋找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可以很明白的從他們對於戰後美國的問題，對於不列顛的問題，以及當我在中國時，對於蘇聯的問題的見解中看出來。我所發見的整個世界似乎都充滿着迫切，需求，渴望，與好勝的心情，準備作令人難於置信的犧牲，祇要他們能夠看到一些值得犧牲的希望。

一九一七年的歐洲，多半也有着同樣的心情。這是流血與厭戰的必然副產物。因此，列強在一



九一七年對世界提出了他的一套答案。不久以後，威爾遜又提出了另外一套。這些答案中沒有一套是切中戰爭的主要原因的，但在戰後的許多不同的條約中却都派在它上面了。因此任何一種答案都不會替戰爭解脫一些罪過，或是使他成爲戰一個爭權奪利的耗費戰爭略勝一籌。結果是一個停戰，而不是真正的和平。

我不相信這次戰爭會和上次一樣。在目前戰事尚在進行之中，住在各處的人們的心目中，已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不管那些人相隔如何遼遠，如同英國及其各自治邦的人民，如同美國人，蘇聯人和中國人。但我們應即確定和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

卷

人們必須在戰爭中就確定他們的目標。我會十分審慎的企圖在舉世各國的人民中，鼓勵他們對於這種目標的討論。因爲我常總總慮，深恐一旦戰爭結束，而世人對於他們究竟如何而戰，與對於戰後作何希望，還不會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在上次大戰中，我是一名戰士，當戰爭結束後我發現我們光明的夢想都已消逝無形，我們激昂慷慨的口號都變成了冷譏熱笑人們的話柄，這都是因爲這些作戰的人們在戰爭中不會達到任何對於戰後問題的共同目標。這是我們的責任，必須使他不再發生。

在這次戰爭中，已經有數百萬人民喪失了生命，在戰爭結束之前，還有無數人要繼續流血。除

非那些現在戰時即已普遍合作的英國人，加拿大，蘇聯人，中國人，美國人，以及其他與我們共同作戰的盟國人士能夠找出一種戰後合作的工具與方法，那末，我們全人類的這一個時期算是失敗了。

我們的領袖都會單獨的或者共同的闡明若于我們的共同的宗旨。其中最精闢的一個便是 蔣委員長於去年十一月在紐約論壇報時事欄中所發表對於西半球的一篇文章。他的結論說：

「中國無意以其本國或其他任何一國之大陸帝國主義或孤立主義代替西方各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我們堅信必須衝出足致更爲廣大的戰爭的獨佔同盟與疆界封鎖的狹窄思想，而達到大同世界的有效組織。除非真正的世界合作能將自由國家互助互賴的新世界中任何形式的孤立主義與帝國主義取而代之，則無論對你們我們都將不會有一個永久的安全。」

此外，我在前面已經引過，還有斯大林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爲紀念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的關於主義的聲明。這是一當非常坦白而確切的聲明：

「種族排斥而廢除，國際平等和他們領土的完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他們統治權的恢復，每一個國家有隨意處理他們本身事務之權，對於受損失各國的經濟援助，以及協助他們取得物質的福利，民主自由的重行獲得以及希特勒政權的毀滅。」

羅斯福想出了四大自由，並且和邱吉爾兩人又共同對世界宣佈了大西洋憲章。

據我看起來，斯大林聲明與大西洋憲章，都有一個共同的謬誤。他們預期將西部歐洲，依然按照那些小國的舊日分治而重建，這些小國家有他們各自的政治，經濟，軍事的主權。殊不知這種不合時的制度，便是千百萬歐洲人民被希特勒所設計的新秩序所奴役的原因。因為縱然是在希特勒的暴政之下，他們終究還有一線成立一個頗足令現代經濟制度順利推動的新時代的希望。他們已經從痛苦經驗中體驗到被一種個人主義的國家主義的堡壘所禁錮的貿易區域，一切被他們強力政治所操縱將使貧窮與戰爭成爲不可或免。

使歐洲各小國重建爲政治的單位，這是對的；但使他們成爲經濟與軍事的單位，如果我們真要爲他們的本身利益以及全世界和平與經濟的安全而謀取西歐的穩定，那是不對的。

蔣委員長的文章，斯大林的宣言，大西洋憲章的條文，以及四大自由的宣佈，無論其爲單獨的或共同的，都仍不失爲一個偉大進步的象徵，而使全世界產生了崇高的希望。

但是這種主義的實行，如果不以公開的表示來觀察，或者又爲那種阻撓其實行的各國本身的希望所干擾，那末全世界的人們便將轉入於腐蝕的憤世嫉俗主義，並毀滅了達成世界秩序的每一個機會。

任何一處和任何一種人民。正在期待着發表這些宣言和主義的領袖們，究竟是否真諦兌現。

在我這次旅行出發之前，邱吉爾先生對於大西洋憲章發表了兩項聲明：（一）在這些發言者的心上，一開始就存着要恢復那些目前在納粹束縛下歐洲各國和各民族的統治權，自治政府和他們的國運；與（二）大西洋憲章條文「對於歷來所有關於印度，緬甸，或英帝國其他各屬地立憲政府之發展的各種政策的聲明並不完全適用」。尤其是凡我所訪問的每一國家的每一首相與每一外交部長以及無數人民，都曾問我這是否表示大西洋憲章僅適用於西歐的意思。我告訴他們，當然我不能知道邱吉爾先生的原意何在，但這是很明白的，邱吉爾先生會說在條文撰擬人的心中是以歐洲各國爲主，所以他也必須將其他各國特別除外。果然我的聽衆用一種似乎合法和尋常的焦急把我的答案一掠而過。當我聽到邱吉爾先生嗣後發表他那次騷動全世界的聲明時，那確是使我感到了頗大的痛苦：「我的意思是在保持我們自己的，我並不因爲要清算英帝國而才做帝國的首相。」但我後來和許多如今仍在美國的英國人提出討論，並閱讀了英國報紙以及一篇英國人和全英帝國人的至可讚美的表示堅定的長信之後，我看出英國對於這些問題的一般民意甚至比美國的民意還要前進，這使我才感到了一點欣慰。英國人已無疑的——依我所見不無一點遺憾——認爲舊的帝國主義必須廢除，而下列顛自由聯邦的原則必須加速的擴展到不列顛帝國的每一角落去。

這也是由於我們那些領袖所造成的。從他們的聲明看來，似乎正把我們自己在北非的政策當做一個悲劇和一個試驗。這是開始於總統發表美國軍隊在北非勝利進軍的一篇宣言，他不曾為我們的進軍說出一個坦率的理由，而祇舉出和那個永令人相信的陳舊而過時的外交公式相同的理由，正如當希特勒進軍比利時荷蘭時，所舉出而他們也不會相信的理由：「爲了要防止德國和意大利對於非洲的侵佔，這種侵佔如果成功，對於從西部非洲較狹洋面侵入美洲造成一個直接威脅，因此，美國的強大軍隊……：今始在地中海和非洲法屬殖民地的大西洋沿岸實行登陸。」

此後就發生與達爾朗的交涉，這是爲一切自由人民所輕視的一件事。這個基於「臨時軍事利益」的聲明，使一般對於一個尙未見其不忠的優秀軍事領袖的批評發生困難，這個領袖正在和英國海軍合力完成一個有組織的軍略的光榮工作。但是這個聲明却又未能使那些不相信這個軍人懂得這種作爲的人滿意，而使他們覺得又重見另一套外交手腕，把我們所宣示於世界的那些原則主義都變更了。

爾後貝魯德的任命，證明了這種光諦。我們這一羣多災多難的人們希望有一些較好的東西能公開出來，但是即使發生了這種事件，仍可斷言美國所藏的好意並不如此之多，他是經不起如此重大的損失的。因爲蘇聯人，英國人，和歐洲那些被征服國家的人民都覺得是被遺棄和遭受了挫折。即以遙遠的中國，而言，他那已被我們以安南輕許還給法國的語言所動搖的信心現在又加上了一次打

擊。在國內，這很使那些充分相信我們祇不過作一個防禦戰爭的人們更堅決深信，以爲在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仍會退入我們自己的國界之內。

邱吉爾和羅斯福決不是一言一動都被入對誇其宣言，而注意着的唯一領袖。斯大林也未能以東歐的蘇聯的特別願望向這個焦慮的世界說明，對於這些領袖們所宣稱的目的，更加重一些份量。

無論是這些領袖的聲明，或是全世界的民意，不問其說得如何巧妙，都決不能有所成就，除非我們在戰時就想出一個辦法來，並且這辦法要能夠實現。

當聯合國宣言發表的時候，無數男女，在南美洲的，在非洲的，在蘇聯的，在中國的，在英國聯邦的，在美國的，在歐洲被佔領諸國的，甚至深居於德國和意大利內部的，都以爲他們似乎看到了對於這盟約簽字各國的一個景象，就是他們加入了爲人類自由而共同協力工作的一份子。他們想這些國家在戰時一致參加共同的戰略會議，經濟利益會議，以及將來的設計會議。因爲他們知道唯有如此，戰爭才能早日結束。他們也知道在目前學習共同工作，將成爲將來各國學習共同生活的保證。

宣言簽字，迄今已有一年有餘，如今的聯合國家，業已成爲一個重大的象徵和同盟的條約了。但是我們也要正視事實，就是他如果實現，則千萬人類都將不會失望，如果我們所夢想的世界能夠

實現，縱使祇是一部份的，那末今天，不是明天，聯合國必須成爲一個共同的會議，不僅爲作戰勝利，抑且爲了人類未來的幸福。

我們當正在作戰之時，我們必須發明一種共同工作的機構，俾得留存於戰後。每一個國家自己的政府或一個國際政府的有效工具，都是逐漸生長的結果。他們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長成的。在這些重又拾頭的國家主義的激動，自私，道德的墮落，以及經濟與社會的紊亂之中，以上種種對於戰後時期是一種不幸的事件。所謂有效的工具，必須在目前應付共同危險的團結力量之下創造出來。他們必須在逐日磨鍊以求解決一切問題之中，成爲實用與順利。

如要等戰爭停止以後，再去創造一個防止經濟戰爭，推進國際和平的機構，這全是理想，除非這機構的若干部份能在尋求擊敗敵人的整齊協力與共同目標之下聯同起來。若說一切事等都要依賴國際貿易和在戰後的發展，這全是夢想，除非目前在我們共同作戰的時候，我們就能在協同，相互尊重，與諒解之下共同努力。我們豈能像某一位領袖所說的，和中國與遠東發展廣大的貿易關係？除非我們今天就和中國有一個聯合的軍事戰略。我們能夠希望把蘇聯和她那驚人的實力帶到一個未來合作經濟世界的軌道上去，除非我們已習於和他們在共同會議中的軍事戰略家與政治領袖協同工作？

我們所需的是一個目前聯合國家的會議——在這會議中，大家共同設計，而不是少數人的會議，僅爲他們想指導或祇幫助別人。我們必須有一個大規模軍事戰略會議，代表着一切負戰爭責任的國家。或許，我們須從中國學習一些東西，他們是以如此少數東西，而能打得如此之好和如此之久的。或者，從蘇聯學習一些，他們最近對於戰爭的方法似乎已頗有所得了。

我們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會議，以溶合所有聯合國家的經濟力量以應付整個的戰時生產，共同研討未來經濟合作的可能。

聯合國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我們目前即須提出與我們逐步走向解放被征服各國時所應限制我們行動的那些原則。我們須要設立一個機構來處理那些隨我們的勝利大軍逐步發生的無數問題。否則，我們將發現我們不過是從這一個惟利是圖罔顧信義的主義走向另一個主義。並佈下了未來動亂的種子——種族的，宗教的，政治的——不僅佈在我們所想解放的人民之間，甚至還佈在聯合各國本身之間。



## 第十二章 這是一個解放的戰爭

在我週遊世界所看到的這次戰事，據斯大林先生說，乃是一個解放的戰事，其目的在將若干國家，由納粹軍隊或日軍的鐵蹄下解放，並使其他國家在他們所受的威脅之下獲得解放。關於此點，我們大家都同意。可是，若說解放的意義不止於此，我們都同意嗎？明白的講，現在並肩作戰的三十一個聯合國是否同意我們所有解放的共同任務，包括給予所有民族在他們一旦力能自治之時，給他們以治理自己的自由，和所有永久自治政府所依據的經濟的自由嗎？

我相信這兩類自由乃是我們所以能對這次戰爭抱有信心的基礎。我相信我們必須將其列入我們所應奮鬥求取的自由觀念之中。否則，我敢斷言，我們將不能爭得和平，至於戰爭能否獲勝，我亦不能斷定。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我在重慶對中外新聞界發表一篇聲明，就此次週遊世界所得若干結論一加申述，下面是一部份：

「余曾游歷十三國，余曾見各王國，蘇維埃政府共和國，委任統治地殖民地及屬地，余曾見各種各式之生活方式，統治方式及被統治之情形，幾至令人目迷五色，在余所曾聘問之各

國，及在各該國所與接談之普通人民中，余發現若干共同之點：

「渠等均欲聯合國獲勝。」

「渠等均欲在戰爭結束後，獲得一在自由及獨立之中生存之機會。」

「渠等均多少懷疑，各主要民主國是否將於戰爭結束後欣然贊助而促成其他國家之自由，此種懷疑之心理，使渠等不能熱烈參加吾人之一方面。」

「若無此類普通人民之真正支持，制勝將至為困難，而贏得和平適屬不可能矣，此次戰爭。僅為負擔各種任務之部隊之單純技術問題，亦為人類智力之戰爭。吾人不僅須爭取居住於南美，非洲，東歐及亞洲，幾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之人民之同情，且須使其積極，進取，與進攻之精神，抱加入吾人之一方，過去及現在，均未及此，今後必須為之。」

「吾人在此種戰爭中作戰及制勝之所需，尤有甚於軍火者。對於將來須具熱心，並深信立於其下以作戰之旗幟，顏色均極鮮明，但實則吾儕之國家，今日尚未決定將來勝利之日，究應為何種世界而立言也。」

尤以此處亞洲之普通人民，感覺吾人之請其參加吾人一方面之原因，不過以為日本之統治，且將較西方帝國主義為尤劣耳，西方各民主國在此亞洲大陸，具有悠久而複雜之歷史，而當

地人民——吾人須知此人民已數達十萬萬之衆矣——已決心不再生活於外人控制之下。自由與機會乃係對於亞洲人具有現代魔術性之名詞，且吾人已任現代世界上最暴虐之帝國主義者之日本，竊取此類名詞加以曲解，用遂自私。

「亞洲多數人民，從不知民主主義爲何物。渠等或需要，或不需要吾人此種形式之民主主義，渠等顯皆不欲即日將民主主義感諸銀盤之中而授予之，但彼等決在其自行選定之政府下，造成其將來之命運。」

「余曾與若干有思想之男女人士接談，渠等對於大西洋憲章之稱，亦有攪擾不清之感。渠等詢曰：大西洋憲章所有簽字各國，是否一致同意其適用於太平洋乎？吾人須有一明白簡單之聲明，以闡述吾人之立場，而答覆彼等之詢問。吾人切須立即開始努力於吾人之共同問題，即將該項聲明變爲計劃，而是項計劃必須對我數千萬盟友之生活甚爲具體而饒有意義者。」

「余深信此一聲明中所欲領導之計劃，大多數美國人民必已瞭解。」

「吾人相信以國治國之帝國時代必因此次戰爭而告結束。例如中國之尺土寸地，除生息於斯土之人民外，不應亦不能由其他民族來說治。此點吾人必須於現在說明，不待戰後。」

「吾人相信，目前全世界之共同責任，乃在樹立若干制度，以爲協助參加聯合國家之殖民

地民族，獲得自由與獨立。吾人應制定一時間表，俾殖民地之民族，能循序創制並訓練彼等所自擇之政府，吾人並須提出由所有聯合國國家共同控制之確切信障，俾使不再恢復殖民狀態。

「有人以為，此類問題，在戰爭尚未獲得勝利之前，亟應避免不談，其實不然，目前尋求進步解決之真誠方法，必能增加吾人之作戰力量，吾人須記，反對社會改變之人，常藉目前危機為拖延之口實，然至戰後則或嫌過少，或嫌過遲矣。

「吾人必須發展國際貿易，並發展鞏固國際貿易之路線，俾使所有民族，皆能享受此項和平時代所應享受之利益，一似吾美國人民所已享受者。

「吾人現在美國，無欲摧毀軸心，必須暫時放棄個人之自由與經濟之自由。但主戰後，此兩種自由，必須恢復。在一級生活水準提高之情形下，確能恢復我美國之傳統生活方式，其法惟為創造一新世界，使生活其中之所有人民，皆能獲得自由也。」

這一聲明引起許多評論，有些怒目相加，但大半反應則是極力喝采。因此，它證實了我的感覺，我感覺安靜而有力的輿論對此問題的傾向已超先於我們許多的領袖。不久之後，必使我們向世界公開承認我們所堅持的信念。

我們大家都想把戰爭的目標劃定範圍。講句笑話，我們或者希望過去所會使用的大字眼，到了和會席上便變小了。或者希望我們可以避免需費甚大而執行困難的戰後調整，而這戰後調整，是在建立並保衛一切民族真正自由所必需的。

由非洲直至阿拉斯加，與我接談的許多男女都向我提出一個問題，這問題幾已成為整個亞洲的

表記，印度怎麼樣，這次我沒有去印度，我也未想討論這糾纏不清的問題。但在東方有一種看法，由開羅起，我到處遇到了這個問題，我應該提出來報告。中國最聰明的人告我說：「印度自由的志願，若被擱置以待諸將來解決時，則在遠東將爲大家輕視的，實非英國，而是美國。」

這位聰明人說這些話時，並非在與英國在印度之帝國主義爭吵——或者可說是一個慈善的帝國主義——他並不相信它，他甚至於不談到它。他告訴我：我們對印度問題的緘默已使我們在東方所貯藏的友情大受損失。東方的人民，本有意倚重我們，現在也懷疑起來了。由於我們對印度問題的態度，他們不能斷定戰爭終止時，我們對所有其他幾萬萬的東方人民的態度如何？他們從我們的空泛遼遼的談話中，看不出我們是否真正代表自由或者我們對自由的想法如何？

在中國，背井離鄉，輾轉數千里流亡學生問我，我們是否將在戰後拿回上海。在貝魯特，黎巴嫩人問我，他們在布魯克林的親友——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黎巴嫩人住在美國——是否將勸促英法佔領軍，在戰後離開敘利亞及黎巴嫩，而使他們自己治理他們的國家。

在非洲，在中東，整個阿刺伯世界以及中國及整個遠東，自由的意義是殖民制度漸漸按照預定的次序的放棄。不管我們喜歡與否，事實是如此的。

不列顛聯合王國是世界上這種有程序方式最顯著的例證，其成功應該是聯合國莫大的鼓勵，來

仍有許多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是英帝國的殘餘，有的有些自治，有的完全沒有。雖然在英國本土和解決當前民族自治的問題。世界上大部份地方仍受殖民制度的統治，大不列顛除掉聯合王國之外，聯合王國的百萬英國人民，正以精明才幹毫不自私的努力，從事剷除這種殘餘，來擴大聯合王國以代替殖民地的制度。

英國人自非惟一的殖民地統治者。法國在非洲，越南，南美及世界各地島嶼仍有帝國的存在，荷蘭人仍自認爲東西印度羣島大部份土地的統治者。葡萄牙人，比利時人及其他民族仍有殖民屬地。而我們自己尙未給予西印度羣島大部份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我們對他們實負有責任。進一步講，我們更有內部的帝國主義。

但世界終於醒覺過來了，知道一個民族由另一個民族統治不是自由，決非我們所需奮鬥以保存的。此後將有許多困難的問題，在各代管地及殖民地上各有所不同。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在一朝之間即可以準備取得自由或能保衛自由。但在今天，他們皆需要一個明確的日期，努力以赴。需要這個日期，能夠實現的保證。爲了將來，他們不要求我們替他們解決他們本身的問題。他們既非如此愚蠢，更不是如此氣餒。他們僅要求解決自身問題的機會，及政治經濟方面的合作，因爲世界上的人民，不僅企求自由以圖政治方面的滿意，且爲了他們經濟方面的發展進步。

### 第十三章 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

我在全世界的帝國主義中，提出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這次的大戰爲我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地理上的新天地，道德上的新天地。我們會見一種獻身於祖國事業的人民。我們也變成了一種對於海外一切首感興趣的人民。一些蘇聯，緬甸，突尼斯和中國的城市名稱曾在我們的報紙上受到最大的注意。在一切傳到我們國內的函件中，最能引人熱望的便是那些從我們在澳洲，新幾內亞，瓜達康納爾，愛爾蘭，以及北菲的青年們所寄回來的信件。我們的興趣已和他們的興趣趨於一致，我們一定會覺得，他們在全世界各地作戰，回來時總決不會再是一個心胸狹窄的美國人。他們也將覺得我們已大異往昔。這些究意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雖然我們是跟着上次世界大戰開始長大，但我們現在不過是從一個素來注重於國內事務的年青國家，一變而爲一個有世界眼光和側身於國際舞台的成人國家而已。

無論一個有統治權的國家是如何的驕傲，真正有世界性的遠大眼光和外國的帝國主義是決不相容的。他和那些在國內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也同樣不能相容。自由是一個不可分的字眼。如果我們要享受自由，要爲自由而戰，我們必須準備把他推廣至每一個人，無論他們是貧是富，無論他們是

否和我們同意，無論他們是那一種族或他們的皮膚是作何顏色。我們明明知道，在我們決定賦予在美國的一切人民以自由之前，絕不能希望英國能為印度的自由，而設想出一個有計劃的辦法來。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已和那有四萬萬人民的中國結為盟邦，並且和那有三萬萬人民的印度做了朋友。和我們並肩作戰的，是那些非列賓人，爪哇，以及東印度和南非洲的土人們。這些人總計起來，差不多已包括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大部份的美國人和他們都沒有種族上的關係。但我們在這次戰爭中已經體會到，這些人之所以能團結起來，不是由於種族的分類，也不是人類學上的理由；那是由於大家的利害相關以及大家有着一種共同的目標。

我們並已明白，要體會一個民族，應看他們的目的，而不在于看他們的膚色。縱以希特拉的種族壁壘，也因要和那些「名譽亞利安種」的日本人承認一個共同目標而告打破。我們也有我們的天然的同盟國家。從今以後，我們必須自視為和其他民族一樣的國家，不管他們的種族與膚色，他們重視自由為一種本能的權利，無論為他們自己或為別人。從今以後，我們必須聯合一切人民，摒絕那是使世界永陷於戰禍的帝國主義。

讓我重行提醒一遍在這次戰爭中，種族與膚色已不能決定誰敵，誰友。在東方，我們就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因為她對於其他弱小國家施以肆意的與野蠻的侵略，因為她藉



帝國主義以圖統治和奴役全世界。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因為她近次以欺詐的手段，從事突然的進攻，以推行她征服世界的計劃。

中國是我們的盟友，因為她和我們一樣，不會懷着征服別人的夢想，而且她也尊重自由。她是我們的盟邦，因為她是這些國家中最先抵抗侵略與奴役的。

東方有兩個民族，其一是我們的敵人；而另一個是我們的朋友。種族與膚色對於我們今日作戰的目標，毫無關係。種族與膚色不能使我們決定應為那一方面作戰。這些事實便是白種人在這次戰爭中所學到的。而且這便是我們所必須學習的。

即以我們的敵人日本而言，她也是以震動了我們的種族自負。她會毫不客氣的提醒我們那種事實，就是白種人並不是出類拔萃的種族，不能因為過去的進步與優勢而取得一切優先的權利。其實，在一年半前，我們對於日本大多心存輕視，並不認為她是一個可能的敵人，如今我們却得承認已經碰到一個可怕的敵人了，對於她，我們得動員我們全部的力量。

我們的盟邦，中國，也以這同樣的方式教我們以新的與健全的謙遜。因為我們已看見她在五年多以來，不會獲得任何新式的武器配備，而單獨的和這一個可怕的敵人應戰。目前她的人民仍在繼續奮鬥，而我們却尚在作參戰的準備。白種人以前所生活着的那種育理的環境如今已是味異勢易。

這不僅在我們對於遠東人民的態度有了變更，而在我們國內也有了變化。

自從美國對於國外有所帝國主義的企圖，歷時已久。但在我們國內，也已實施了一些相當於帝國主義的措施。我國白種人民，對於黑人的態度，不可否認的常有一種相當於各國帝國主義的不愉快的性質，那分明是一種種族上的優越感，一種想利用那些乏人保護的人民的願望。我們自以為其結果是慈善的，因此認為合法的舉動。有時這是對的。但有時其結果却成了帝國主義。這種種族偏見所存在的那種精神環境，殊無異於一般人——好意的人們——之暢談所謂「白種人的負擔」。

但這種環境是變了。目前一般有思想的美國人都已逐漸明白，我們決不能一面在國外和帝國主義的武力與觀念奮鬥，一面却在國內維持着一種帝國主義的形式。這次的戰爭，在我們的思想上已有這種作用。

在美國，有色人種的解放業已成爲一種戰時的措置。這是一種軍事急需的行動。很明顯的，這種解放詭不藉戰爭，而由人道主義的改革與社會的文明，使之逐漸來臨。但這需要一次兇暴與殘殺的戰爭，使這人類自由的問題釀成一種危機，於是打破奴隸桎梏的這一步驟，便可一舉而成。在這一次戰鬥的壓迫之中，以前那些存在已久的障礙與偏見都已打倒。保衛我們的民主政治，抵禦外來的威脅，在我們國內分期已失敗。

我們層次所宣布的作戰目的，已使我們明白的處於一種不公平的地位。當我們說到一切國家的自由與機會，我們便不能忽視了在我們自己社會裏可笑的矛盾現象。如果我們說到自由，我們必須表示這是別人的自由，同時也就是我們自己的自由，我們必須表示外國人的自由，同時也是我們國內同胞的自由。在戰爭期間，這是尤其重要。

戰爭之時，從兩種事件，對於種族與宗教，以及在政治上的少數派人羣，足以造成一種威脅——即一羣過度熱情的羣衆，堅持主張普遍適重於一種主要的標準，以及在情緒緊張的狀態之下，恢復了數百年來的種族與宗教的猜疑。於是必然的便把戰爭的責任，以及一切因戰爭所引起的紊亂和不安，全都歸罪在少數人的身上。於是他們被嫉妒地受到了嚴密的偵查，以決定他們是否接受了特殊的利益。

我們大家都熟知了這樣一種過程，在戰時心理中，凡是並非習見的事，都會受到猜疑，凡是並非正統的事，在一部分人都會把他和通敵的事，併想一起。在任何社會中，似乎都含有愛國家的產生。在一八一二年內戰期間，便曾有過一個例子，一個青年因被指為犯有間諜嫌疑被捕，因為「他攜有一枝長鞭，在他的長褲上密縫着無數鈕子，一形跡可疑。照着舊時的習慣，當形勢顯得惡化了時，民衆便必須尋求一件代罪的羔羊，而他們最先着手搜索的，便是從少數階級中尋出一個人

來。

在現代的時期，若不是因爲在一段一度會被視爲文明的國家，我們會看到一些顯著的例子，甚之更嚴重地說，若不是因爲在我們本國，我們已經目擊着一種滯進的，機詐的反猶太運動，否則這一切都將顯得怪誕可笑了。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目下我們正在與一種不可容忍的事物與壓迫奮鬥，如果我們失敗，我們便將受到更大的壓迫。

如果我們一面在國外和敵人周旋，一面在國內却容忍他們坐大，對於我們的戰鬥力，便將無限削弱。

我們國家並不僅由一個種族，一種信仰或一種文化遺傳所組成。這是一個約有三十多種民族的結合，他們各自有着不同的宗教觀念，哲學與歷史背景。他們因對於我們在獨立宣言中所宣示，而由憲法保證的民主機構所發生的信仰，爲着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子孫，而互相聯結起來。

我們各邦聯合的樞石是自由——各人有任意信仰宗教，任意工作，任意居住與教養子女的自由。自由，如果是爲一切人的自由，這必須由幾個基本的保護者加以衛護，而這些保護者必須能盡力求其普遍分佈；沒有一個人能希圖一些足以侵害他人權益的特權。不願我們那目前正在實行的有害的官僚政治，和我們那有時過於冒險的立法，以及——那可憐，但是幸而不多的例證——那該目的

舉衆法律，我們在美國，祇有一個半世紀多一點的經驗和調整，却已獲得了在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最合理的自由的表現。

我們這個國家所以成功，決不是由於我們建築了一些龐大的城市，和大規模的工廠，以及墾殖了廣大的土地，而是因爲我們會提創了這種以我們一切物質發展所憑藉的自由的根本保證，並能容忍着並且設法利用着我們的種族的分歧。

我們仍是一個比較新興的國家，在最近五十年前，我們鐵產的一半，以及全部三分之一以上的製造品，都是外來的移民所經營的。在我們若干主要的農業州裏，約有一半以上的農民都是外國血統。在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當國家正在建立的時期，約有一千五百萬的新客到達了我們的海岸，而在上次大戰爆發前二十四年間，陸續而來的爲數更多。換句話說，差不多有二百年的時間，我們有着不斷的移民的補充，這帶給我們新的血統，新的經驗，和新的觀念。這是一個少數人民集團的大集合，跟着進一步的溶合成爲一個國家。我們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因爲這些新來外客，在我們的統治方式之下，絕無歧視，或相互間繼續反對與鬥爭的事，而以合夥者的地位，從事普遍的建設與團結。在我認爲，我們之所以能達到我們的文化的高峯，決不祇是由於我們的集合的方式，我們的發明，或是我們任何偉大的人工的發展，而是由於一般有着不同信仰與不同種

族系統的人民以共同諒解，尊重與互助的態度，在美國融洽相處。

如果我們要看這種美國制度的反面，我們只須一看希特拉的軍事獨裁，和日本的專制政體，以及法西斯意大利那種逐漸衰微的獨裁政治。過去十年來德國的歷史乃是以一個僞稱和平的獨裁者，以對於種族與宗教的不能容忍，作為面具，向着民衆，施以引誘，最先是少數人的迫害，最後是引入戰爭。這種限制，給予德國以暫時的力量，達到充分的團結。事實上，它是破壞並削弱了社會結構，因此戰爭的潮流一旦有了轉捩，結果必會發生突然而澈底的崩潰。

在我始終認為，強者之護弱者，決非出於人道或正義的思想，或任何情感的作用，這纔然是爲了保障少數人的利益的一種普通常識。因爲這少數人乃是一個民主政體中的富饒資產，而這種資產實是一個極權政府所無法供應的。獨裁政府必須威脅與抑止他們。但在一個民主政體的範圍之內，少數人往往是一種觀念的永恆泉源，激發新的思想與行動，而是新的精力的永恆根源。

若是從事抑止這少數人的思想與少數人的意見，結果必致社會凍結，阻礙進步。因爲多數人本身乃是因少數人羣的存在而受着激發的。人類思想，必需有對照的表現，藉以磨練自己。

如今，我們必須緊記住一個事實，就是無論何時，我們若剝奪了我們所痛恨的人的自由時，我們便也使我們所愛者開始失去了他們的自由。

我們在美國共同生活的方式，乃是一件堅強而精緻的織品。這是從許多條線所織成。這是經數世紀來無數堅忍與犧牲的愛好自由的男女所織成。它可作為蔽護貧人與富人，黑人與白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外國人與本國人的一件大氅。

讓我們不要把它撕裂。因為一旦把它毀壞之後，誰也不能知道，人們將在何時何地，再會發現它的保護性的溫暖。

## 第十四章 四海一家

這僅僅是一個短時期以前——不到二十五年——同盟國會擊敗當時德意志帝國所領導的侵略與征服的軍隊，獲得了卓越的勝利。

然而在那一次戰爭之後，應該不絕的和平却是失敗了。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尙未確定可以共同依據的目的。因此，世界和平是決不可能。國際聯盟雖是圓滿地組織成功，可是一般人除去戰敗共同敵人之外，並無一致目的，祇是反復無常的爭辯。而且，國聯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祇是一個英美法各國的解決方式，用新的與空泛的名詞，來保存舊的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國聯對於遠東迫切的需要，採取不適當的措置，也沒有懇切地希望解決世界經濟問題。國際聯盟企圖解決有關世界的問題，主要目的，是政治的。但是祇偏重於政治的國際主義，而不會考慮到經濟的國際主義正像在沙土上所建的房屋一樣毫不健全。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可以單獨獲得充分的發展。

我相信我們自己的歷史，已經提供了我們的失敗的另一原因。在今天所進行的一切，我們的最顯明的弱點之一，是我們外交政策的缺乏連貫性。即使在比較很短的過去四十五年內，沒有一個大黨，可自稱會遵循一個固定和一致的國際合作計劃。每一政黨都會有過它自己對於世界看法的時期



，有時候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政綱，有時候，各黨都採取嚴正的孤立主義。依美國政治慣例，國會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在野黨，時常反對執政黨的任何計劃。

近幾年來，兩黨中多數人均已承認，若是和平，經濟繁榮和自由需要繼續存在於這個世界，則世界各國，必須要找出一個能使經濟穩定和共同努力合作的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威爾遜總統時代的那些願望曾經產生了一個國際合作的計劃，目的在保障未來一代人民得以安心工作，不致再發生戰爭與破壞的信心。我們所能想到的計劃的細節，乃是為求世界和平的正確的和積極的行爲，雖然我們不能具體說明美國在那時候，若能給以充分協助，支持並積極地參加這個計劃，究會產生多大的效果。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試驗了相反途徑，結果發現這種計劃根本一無實效。我們走進了一個與世界關係完全脫離的境界中。許多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政治領袖們，在全國各地宣稱：我們上次參加世界大戰乃是被騙參加的，我們叛背了我們的理想，我們永遠不能再允許我們為外界發生的事件所牽累，結果再發生另一次武裝的爭鬥。並且他們更堅持說，我們很倖運地有着天然的屏障，因此我們可不必牽涉在我們邊界以外的舊世界中一切複雜而無味的事情。

我們用過份的關稅壁壘，使我們和世界貿易隔離，我們並不關切歐洲大陸。對於德國重整軍備

後歐洲大陸的命運，也不感興趣。當歐洲各民主國家，以法國爲後盾，正在開始設法恢復使他們業已損失元氣的經濟衰落，而不穩定的外圍依舊阻礙着他們充分復原的時候，我們却暗中破壞了倫敦的經濟會議。正因爲我們這樣做了，結果便使我們失去了極大的機會從事加強並重振民主國家的地位，以爲他們充實他們對於當時正在集合中的侵略勢力的抵抗力。

我們所以這樣做，不能完全歸罪於任何一個政黨。因爲沒有一個多數黨，曾一貫確實地告訴美國民衆，它是一個贊成參與世界事務或嚴守孤立的政黨。如果我們說共和黨一九二〇年執政時，破壞了國際聯盟，我們也可以說在一九三三年民主黨領導下的政府使倫敦經濟會議破裂，以致毫無成就。

在我開始討論國聯計劃的細節之前，我願意指出當初美國所以造成國聯失敗的經過。因爲當時在美國所發生關於國聯問題的爭論，實是我們居於領導地位所必須設法避免的一種事態。如果我們認爲自己是一個確信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國家，我們便必須要實踐我們的責任。

威爾遜總統在凡爾賽交涉中對於和平的建議，以及國聯盟約的締結，事前並未向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徵詢意見，或商酌。他當時純以應付民主黨獨佔了這個問題。於是在策略上引起了許多共和黨人，甚至有國際頭腦的共和黨人，採取反對的態度。當他回國之後，把巴黎和約與國聯盟約提請

美國參議院批准。於是發生了美國歷史上最戲劇式的一幕插曲。關於美國拒絕擔任世界領導者地位的爭論的經過，在此我不能加以詳細的敘述，但是我們現在必須重提那次經過的大概是很重要的。

第一，首先講到參議院裏那一羣稱爲「敢死團」或「決不相容派」和「堅持到底派」們。另外還有一派是沒有政黨色彩的。民主黨領袖李特的地位，與共和黨的波拉相等。在另一方面，是不肯妥協的威爾遜總統。他堅決主張條約文句不能修改。在這兩極端中間，是不少與共和民主兩黨有關，而有着不同色彩與意見的保留份子。

我們至今尚不明白，或者將永遠不會明白，當時共和黨在參議院的領袖勞琪（他的名字與國聯失敗相連）究竟是否真心接受有保障保留條款的國聯，或者他祇是借這保留的名義來反對國聯。甚至他的最密切的知親好友，對此問題都有相反的報告。

但是我們知道，當這問題從參議院移到一九二〇年兩大政黨年會時，兩大政黨對於威爾遜總統所帶回的條約，並沒有表示完全贊同或完全反對。民主黨年會的黨綱中並不反對保留。共和黨的政綱中亦採用一妥協性的條目，相當的寬泛，足以包括共和黨內極力擁護國聯份子的意見。在這些政綱中，反對國聯的代表們亦有他們可以作反對的根據之處。

兩黨的政綱，都是含糊不明，他們對於美國和他國的合作，歷來一向沒有一致的立場。這種混亂的情形，因了共和黨候選人哈定的態度而加倍增強。他是一個和平愉快而無固定信仰的人。此外無疑的民主黨選舉考克斯票數的多少，正是擁護威爾遜的條約的表示。雖然民主黨政綱留下保留的可能性，使許多民主黨領袖堅決反對國聯。不過沒有人能斷言究竟哈定是誠心反對國聯，或者他希望先看一看選舉的結果，來擁護一個形式改良的國聯，所明顯的是他覺得他必須多少反對國聯，因為這是民主黨所提出的政治問題。在私人談話中，他給每一個問他的人所希望的答復。直等到他在選舉結果發表後，他方才嚴峻地說：「國聯現在已經死了一。」

或者我們諷刺的說，這次選舉中國聯問題之未能通過，是由於把美國與世界的合作的偉大宗旨，交給為地方勢力支配的選舉來試驗，這是兩黨的錯誤，民主黨及其領袖們很不聰明的獨佔當時美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共和黨同也很不聰明的讓它自己被推到策略上相反的方向去。現在時機已到，我們必須重行決定，究竟美國是否須繼續保持它在世界事務中所應佔的地位，我們必須不讓這種決心，再被少數黨的策略來左右。

我很滿意美國人民從未存心故意不理國際合作的計劃。很可能的，他們曾贊成凡爾賽條約予以修改，對於別的國家的努力並不完全漠視。美國人民是被那些沒有信心，祇知道爭取選舉票及改

黨利益的領袖們所誤的。

如果以為在上次大戰後，我們退出世界事務，是發生現在戰爭及過去廿年來經濟不穩的因素，看來這確是真的，那末我們在這次大戰後如再退出世界的問題和責任，一定會發生嚴重的災禍，即以我們在地埋上的相當孤立，也將不復存在了。

上次大戰終時，沒有一架飛機會飛過大西洋。目前大洋祇是一條綵帶。飛機按着班期來回飛越太平洋不過是空中海洋較寬的綵緞而已。歐洲與亞洲近在我們的門口。

這次戰爭結束後，美國必須在下列三種途徑中作一抉擇。第一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無可避免的，這就是表示我們喪失了最後的自由；其次是國際帝國主義，那就是用來犧牲若干其他國家的自由，第三是創造一個每一國家，每一民族都能享受機會均等的世界。我相信極大部份美國人民會選擇最後一條途徑。要使這種選擇有效，我們不僅要獲得戰爭的勝利，並且還要和平的勝利，而我們現在即須着手爭取。

我以為要獲得和平的勝利，有三件事情是必須的，第一，我們現在就計劃一個有世界基礎的和平；第二，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必須自由，然後和平才可存在；第三，為爭取並保持這自由，美國必須擔任一個重要職務。

我說和平必須建築於一個世界基礎上，我的意思是必須包括整個地球上的人。海洋和大陸，我從空中所見的，祇不過是地球的一部份。英國和美國都是地球一部份，蘇聯，中國，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也都是地球的一部份。不可避免的，除非和平的基礎在世界各地都已確定存在，否則世界上任何一處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這種普遍性的和平的成功，決不是祇靠我們領袖的宣言，如同在大西洋憲章中所包括的一樣。它的成功，主要是依賴全世界人民的一致接受。上次大戰後尋求國際諒解的失敗，給我們一些教訓；即使作戰的領袖們在戰時都已明顯地同意，共同確定了原則和口號，但等他們坐到和平會議席上，他們對於以前的宣言，就會有他們自己不同的解釋。因此除非在目前，戰爭尚在進行之中，美國，英國，蘇聯，中國，以及其他同盟國家的人民，對於他們的作戰目的，必須能根本一致同意，那些娓娓動聽的詞句，如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不過如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一樣，使我們自己欺騙自己而已。那四種自由，決不會因那些目前在朝掌權的人的一紙文告，而獲成功。祇有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奮鬥，自由與和平才能實現。

我說要獲得和平；世界必先獲得自由，我不過說一種偉大的工作已經開始，沒有人——決不是希特拉——可以制止。世界上所有的男女，用他們的身力智力和精神，正為這種工作在積極進行。

經過了幾世紀的無智或盲目的服從，東歐和亞洲數萬萬人民，業已開始了新的生命。以往的恐懼再也不能威脅他們，他們不再願意爲了西方人的利益，來做西方人的奴隸。他們開始知道世界各地人類的權利，是彼此切切相關的。他們已下了決心，也是我們所必須的，不再允許帝國主義在他們自己的社會存在，正如不允許在國際社會中存在一樣。築在山上的一座四週圍繞着茅屋的大房子，已經失去了它的驚人的誘惑。

我們的西方世界，和我們自己以爲在政治上的高超地位，都正在審判之中。我們的誇大，使亞洲人民對我們疏遠。蘇聯和中國的男女，對於他們自己潛伏着的實力都很清楚。他們逐漸知道，許多有關未來世界生活的決定權，操在他們手裏。他們希望這些決定權交給每一個國民，不使受另一個國家的霸佔，而達到本身經濟，社會，精神各方面的自由發展。

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同樣的重要。一個國家的人民，不僅須充分利用別一國家人民的生產品，同時也應把自己的生產品，設法達到世界各處的人民。除非我們找到了一個方法，使我們可以廢除阻礙貨物自由流暢的不必要的關稅壁壘。否則世界上決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真正的發展和經濟的穩定。自然，在戰後如突然地毫不妥協的立刻取消關稅壁壘，結果祇有發生災禍。同樣很明顯的，我們作戰目的之一，即是爭取貿易自由。我知道有許多人，尤其住在生活標準較高的美國的人，

對於未來情勢十分驚惶。他們相信這種改變，將會減低美國人的生活標準。其實這理由不能成立，它的反面却倒是真的。

美國經濟驚人的發達，有着許多原因。我們的原料的豐富，政治制度的自由，和人民的性格，無疑地都有貢獻。但在我的判斷中，最大的因素，是事實上美國得天獨厚，佔有世界上一片廣大區域，而在這區域之內，貨物和思想的自由交換，決沒有任何的障礙。

我願意向那些擔憂着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的人指出此次戰爭結束之後，我們所要負擔的天文學上數字的國家公債，和在一個因工業運輸發達而持續縮小的世界的觀點而論，即使我們目前在美國的生活標準，不能維持長久，除非整個世界上的貨物交換。能比從前格外自由流暢。毫不虛妄的說，如果要提高世界任何地方以及任何人民的生活標準，則必須耐緊的提議世界上每一方面，無一個人的生活標準。

最後，我說這世界要求一個有着自信力的美國完全參加合作。這祇是在傳遞東方人民給我們的請柬而已。他們喜歡美國和其他同盟國家在這偉大的冒險工作中做他們的夥伴。他們要求我們加入他們共同創造一個許多獨立國家合作的新社會，免除西方的經濟不公平和東方政治的惡行。如果我們是這新鮮的偉大工作的夥伴，那麼他們所要求於我們的，並不是過疑，無能，也不是恐懼害怕。



他們所希望的一個夥伴，是要能毫不猶疑而大胆地來說：我要糾正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公平。

我們東方的盟國，知道我們在这次戰爭之中，準備盡量拿出我們所有的資源。但是他們希望我們——並不是在戰後——現在就用我們所能給予的無限力量，來推進自由與正義。其他尚未參加作戰的人們，同樣渴望着我們接受這整個歷史中最富於挑戰性的機會——用這機會來幫助創造一個自由和獨立的新的社會，使世界上的男女，都可以生存和長大。

時代生活叢書

4. 二次世界大戰之教訓 威廉·齊夫著  
周新譯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迄今且已四年有餘，自義大利無條件投降，軸心機購，幾成解體，德日夥伴，雖猶圖作困戰之鬥，但強弩之末，最後崩潰，即在目前。但在着手最後決戰之前，猶當檢討過去作戰之經歷，以爲決取未來作戰計謀之張本。本書即在此以前，數年來歷次戰役所得之教訓，凡關心於此次大戰之戰局，尤其在第一期待於盟方最後之勝利者，不可不一讀此書焉。

5. 我轟炸東京 勞孫隊長著  
徐遲合譯  
錢能欣

6. 小 湟 麗 陀思妥夫斯基原著  
徐遲改編

7. 美 國 與 亞 洲 拉鐵摩爾著  
呂一民譯

8. 啼 笑 皆 非 林語堂原著  
陳封雄節譯

9. 太平洋戰爭  
前哨 美 日 非 正 式 談 話 紀 錄

美國官方報告 王家楫譯

10. 使 日 十 年 格魯著  
周錫如合譯  
唐錫梁

風 聲 鶴 唳 林語堂原著  
徐誠斌譯

上 海 內 幕 陳桑愉著

周 新 主 編 時 代 生 活 月 刊